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一

德语文学简史 (下)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第六章 二十世纪德国文学

第一节 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末期

十九世纪末，德国文坛上曾独领风骚的自然主义失去了活力，它只是机械地、照像式地去摹仿现实，既看不到也没有勇气去描绘正在诞生的新的事物，正在社会舞台上挥斥方遒的新力量。它所运用的手段和它所遵循的思想都无法适应发展着的时代。还在 1891 年著名的文艺批评家赫·巴尔在《自然主义的克服》一文中就要求用重新进入内心来代替对粗糙的现实的偶像崇拜。一些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也正突破了自然主义的束缚。不仅是豪普特曼，苏德曼，李里克隆这些人，就是连追求“彻底自然主义”的霍尔茨和施拉夫也动摇了。霍尔茨在 1896 年创作了《社会民主党人》，这是一部喜剧，讽刺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腐败和出卖理想的种种行径，施拉夫大体从 1895 年就脱离了自然主义，在他 1900 年完成的小说《第三帝国》中就有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了。

随着自然主义的日趋末落，代之是一些标榜现代派的各种文学流派的兴起，这在艺术和建筑的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给自己标上新浪漫派、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的名称。这一代人，他们要突破旧的，寻找新的，要求一种“青年风格”。斯·茨威格（1881—1942）正是在这个时期走上文坛的，他在自己的自传《昨天的世界》中这样描写了他同时代青年人的心态：“我们发现新的，因为我们要求新的，因为我们渴求属于我们的，而不是我们父辈的……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结束，革命已经到来，祇少是价值的一种重估。”

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

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它们都是做为自然主义的对立物相继出现的文学流派，都可以用“现代派”这个词来包容它们。正因此，一些作家早期是印象主义者，随之就又成为象征主义者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并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为一种力量，它们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美学上的要求和艺术上的特点。

印象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一些艺术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它始于法国，得名于法国画家马奈的一幅题为《印象》的绘画。这种首先表现在绘画艺术里的新潮很快在整个欧洲引起反响，也并不仅仅局限在美术这一领域里了。在德国文艺界，从 1900 年之后，印象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标志自然主义的结束和对一种新的思潮的接受。一批作家成为印象主义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如里·戴默尔·斯·格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等人。格奥尔格当时在一篇文章里对印象主义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不要去发现故事，而是去再现情绪，不是去观察，而是去描述，不是谈论而是印象。”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印象主义对客体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态度，藉助一种模棱两可的代名词、相互矛盾的词儿的组合（这称为矛盾修饰法：如聪明的傻瓜，亮得发暗等）和佯谬的语汇，通过行文上的安排，来表达出一种含混不清的印象；致力于在瞬间的印象里去寻找最有利的那一刹那，去发现表面现象和本质存在的重合。

象征主义同样也来自法国，波德莱尔（1821—1867）是这一流派的代表。

在德国文学中，象征主义表现为对物质性的摒弃，它把创作视为一种表现灵魂、精神经历的手段。象征主义者放弃对现实进行任何方式的描述和摹仿，使文学和艺术摆脱开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这是一个截然与自然主义相反的对立物。它主张运用物象来暗示内心和精神中的微妙状态，通过暗示、对比等手段赋予物质的东西以一种另外的、本身原不具有的意义。

在语言上，象征主义与印象主义一样，强调它的音乐性，但更注重的是语言的一种暗示力量。象征主义作家不理睬语言的逻辑性，而追求一种神秘性。这样就使语言有了一种唯灵主义的功用，能揭示出理性和反理性之间的那种奇妙的联系。

在创作实践上，艺术领域更适于印象主义，因为它便于捕捉瞬间的印象并把它表现出来。在文学的范畴里，诗歌和短小的抒情散文，还有独幕剧都便于运用印象主义的表现手法，至于在大型戏剧和长篇小说的体裁中却较难用印象主义的手段处理，因为它并不以表现瞬间中那最有利的一刹那为主，而是要展现一个事件的过程，需要时间的连续性。有一些作家，如李里克隆，格奥尔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诗歌，施尼茨勒的独幕剧都体现了印象主义的特点。

象征主义在创作上主要适于诗歌和戏剧，作家藉助象征，来传达他们作为艺术家的特殊的非一般的经历、感受，所表现的并不易为每个人理解，他们扮演着某种先知、预言者的角色。保持与读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达到最高艺术的一个前提。象格奥尔格的一些诗歌、豪普特曼的一些戏剧（如《沉钟》、《碧芭在跳舞》）就是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创作的作品。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在德国文学中相继涌现出了种种流派。这是前所没有过的，对它们的发展、兴衰做一个历史的有机的描述是很困难的，尤为困难的把部分从整体的联系中清楚地划分开来。这个整体称做是“现代派”，在一些文学史中称之为“颓废派”。无论是那个主义，它都是对僵化的传统的文学、美学，对各种规则、戒律的突破和反叛。这个整体像一条激流，时而流到这里，时而冲到那里。印象主义，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青年风格，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就是这个激流中的一个个流段。上面我们只是对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稍加叙述，以便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流派有一个粗略的印象。

工人文学

作为威廉帝国末期文坛上的另一支力量是工人文学，它的发展是与这一时期政坛上的一个重要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强大是密切相连的。1890年俾斯麦为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法”被迫取消了。这个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迅速地得到发展和壮大，到1914年它拥有四百多万选民，在国会中占有110个席位，有百万党员。这样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自己的文化阵地，有它自己的文学主张和自己的作家，以用来宣传和鼓吹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1896年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曾就自然主义进行过辩论。它的机关报《前进报》出版周刊《在闲暇时刻》，刊载社会题材和政治题材的小说。在党的领导机构的倡议下，出版诗集《自由之路》（1893）、《从底层起来》（1911）。它在各地建立工人剧院，成立工人合唱队。党的领导人，如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

等都就文艺和无产阶级问题撰写过文章、评论，特别是弗朗茨·梅林（1846—1919）是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文艺评论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许多论战性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一批工人出身和与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进步作家，其中著名的有诗人K·亨克尔（1864—1929）、H·肯普斯（1847—1912）等。亨克尔一度是个自然主义者，由于政治上激进转向社会民主党，除了诗歌创作，他编辑出版了工人诗歌集《自由之路》（1893）。肯普斯在矿井工作多年，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诗歌富有政治鼓动性和感召力，出版有诗集《新诗集》（1904）、《鲁尔向我歌唱》（1909）。小说家有R·施瓦歇尔（1821—1907）、明娜·考茨基（1837—1912），以及剧作家E·普莱斯昌（1870—1949）、E·罗森诺夫（1871—1902）等。值得重视的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工人传记，如《一个现代工厂工人的生活史》（1905），《一个德捷工人的生活道路》（1909），《一个农业工人的生活》（1911）以及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亲自作序的奥地利女工阿·波普写的自传《一个女工自己讲述的生活史》（1909）、续篇《我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回忆》（1915）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在工人运动文学上具有很大的意义，这表明工人不仅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而且也开始在文学领域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了。

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1900年几个作家出版了一份名为《乡土》的杂志，它要把一些既反对自然主义也反对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诗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把自然主义称之为产生于大城市和都市文明的“沥清文学”，把印象主义等现代派称之为使人民大众神经变得衰弱的“堕落文学”。他们要求用健康的外省来对抗大都市，要求用健壮的农夫来对抗知识分子，要求用一种源出于德意志传统的文学来对抗产生于欧洲的进步文学。反对大城市化，反对知识化，反对欧洲化和国际化，这是乡土文学的几个原则。乡土艺术的作家A·巴特尔斯1905年在一篇文章中清清楚楚地道出了乡土文学的目的：“乡土艺术应该在一种强有力的乡土情感上建立民族情感”，德意志人民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创立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使它的存在的根蕃殖、强壮，使它的生命美好、富庶和强大，提高它的民族抵抗力和扩张力。”。从此可以明显看出它的保守的政治倾向。乡土作家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恶德，一方面对宗法的封建的农村加以美化、做为遁逃都市文明及其种种社会矛盾的避难所。这一类的作品，固然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面，但其主要倾向却是落后的保守的，体现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它的恶性发展，到第三帝国时期成为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文学，成为一种反理性的对“血和土地”进行崇拜的文学。属于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主要的有G·弗伦森（他的代表作是《于伦·乌利》）（1901）、H·斯泰尔（他的代表作是《圣院》）（1918）等。

第二节 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文学

概述

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的时间，在1918年9月以德国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这次战争导致这个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的彻底崩溃。在这一年的11月，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1919年1月，在德国文化名城魏玛举行了第一次国民议会，成立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宣告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这就是史称为的魏玛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从1919年成立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共存在了十四个年头。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中，它从来就没有平静过，几乎没有一年没有危机，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就是在它相对稳定的1924—1929年也不是一个安定的时代，然而这一时期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却是一个繁荣时期，一种动摇中的繁荣。帝国的崩溃，共和国的建立，革命力量的发展，相对说来，有了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各种社会矛盾的暴露和冲突，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促进思想的活跃，这也为德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各种思潮相继兴起，各种流派竞相登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特点就在于，许多矛盾的力量并存和相互较量，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如此。从文学上看，这是一个百花筒的时代。

魏玛共和国分为三个阶段，危机时期和从1924年至1929年的相对稳定时期，1929年秋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个共和国随之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急和政治危急之中，最终导致法西斯1933年攫取政权，魏玛共和国完结。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与历史的发展完全同步。就魏玛共和国文学而言，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在这个共和国初期，表现主义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稳定时期的到来，成为社会批判和人道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时期，而1930至1933年，在这个共和国最后几年的充满政治风暴的岁月，德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成了决定德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一样，也是发端于造型艺术（法国的塞尚、荷兰的梵高，在德国是集聚在“兰色骑士”和“桥”周围的艺术家），不久就被移植进文学领域。还在战前，一批年青人以反对派的姿态登上文坛，他们不像印象主义那样疏远现实，满足于美学上的愉悦，也不去追求象征主义的神秘，而是怀着一种“新的激情”，去呼唤“新人”和一种“狂热的生活”，呼唤行动和共感。他们瞩目现实，介入社会。动荡的社会使表现主义带有一种浓烈的政治色彩。那个时代的著名评论家赫·巴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没有一个时代被这样的惊吓，被这样的死亡恐怖所震动。从没有一个世界如此坟墓般的寂静。人从没有变得这样渺小。他从没有这样的畏惧。和平从没有如此遥远，自由从没有如此的死亡。现在危急在呼喊：人在向自己的灵魂呼喊，整个时代成了唯一的呼救。艺术也在同声喊叫，直喊进阴沉的黑暗，它在呼喊救命，它在朝灵魂呼喊。这就是表现主义。”巴尔在这段话里阐释了表现主义和时代的关系。“表现主义主要是世界大战和革命高潮时期的文艺——启示录的幻景和兴奋的预言，噩梦和希望，‘毁灭和胜利’的文艺”。

表现主义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一种新的风格，是对理性主义的和实证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决定论的一种反拨，是朝向精神艺术方向发展

特引自马尔梯尼：《德国文学史》，第538页。

《德国近代文学史》，苏联科学院编，第1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决定性转折。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的创作，而不是一种经历或情绪的创作，不言而喻，它既是印象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然主义的对立物。

表现主义者多是一些幻想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浪漫主义者一样，要用诗人的幻想去重新塑造世界，去对人进行更新。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遁进中世纪，而是积极的入世的，要把自己的幻想变为现实去行动。这样介入政治介入社会，且多是表现为激进的，甚至怀有一种宗教狂热的。当然这仅是从表现主义的整体上而言，它也有拒绝革命，逃避现实，否定进步的另一翼。

这里顺便要介绍一下，随着表现主义的衰落而出现的另一种文学思潮：“新实际主义”。这种思潮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兴趣爱好上。针对表现主义作家的混乱的感觉和狂热的精神，新实际主义主张摒弃多愁善感的务实精神，坚持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提倡在应用价值中去发现时代的美。当时的一位新实际主义的理论家肯特就写道：“事实粉碎了一种虚假的感情作品，它的作用比诗人的全部想像都更为直接更为惊人”。新实际主义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埃凯斯特纳（1899—1974），他的作品有诗歌和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等，赫·克斯腾（1900—），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约瑟夫寻找自由》（1928），《一个放纵的人》（1929等）。

戈·贝恩

在表现主义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著名的有被称之为现代德国文学中的第一位女诗人拉斯克——许勒尔（1876—1945），愤世嫉俗不幸早逝的格·海姆（1887—1912）以及恩·斯塔特勒（1883—1914），雅·凡·霍蒂斯、阿·里希腾斯坦等均是名噪一时，而戈特弗里德·贝恩则是表现主义中最著名也最有影响的诗人、作家。

戈·贝恩（1886—1956）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早年在马尔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和语言学，后进医学院，毕业后在柏林行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军医。战前就与表现主义作家来往，参加表现主义团体的活动，并发表诗作。在他早期用表现主义手法写出的作品，如《陈尸所》（1912）、《儿子们》（1913）、《肉》（1917）、《瓦砾》（1919）等，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孤独和恐惧心理，表达了对世界的憎恶和一种绝望的悲观的情绪。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厌嫌，他把梦境和麻醉药当做遁逃所，他曾写了一些吸麻醉药的抒情诗，如《可卡因》，组诗《麻醉》（1925）。在表述这种人格的分裂和自我麻醉的心态时，他写道：“不管是节奏，不管是麻醉药丸，不管是现代的自生的训练，这都是人类的最古老的需求，以此去克服处于外界和内心，上帝和非上帝，我和现实之间变得无法忍受的紧张。”贝恩在诗歌创作上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完美，他把对新的形式的感情看做是最高的信仰，对语言怀有一种虔诚的爱，运用形式的完美，语言的力量，来表现急剧变化中的现代化社会中个人的感受。

1932年贝恩被选入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纳粹上台时，他表示支持，1933、1934年发表了几次广播讲话《新国家和知识分子》和《艺术和政权》，对法西斯政权大唱赞歌，认为第三帝国是一次真正的革新。但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采取了消极的避世态度。由于对纳粹统治的倒行逆施流露出不满和憎恶，1938年被开除出帝国写作组织。二次大战期间他以行医谋生。二次大

战后，他由于一度追随法西斯而为世人诟病，直到四十年代末才重新开始创作。除了诗歌他还写了自传体的作品《双重生活》，阐述了自己的生活观和艺术观，探讨了思想与行动，艺术与权力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些矛盾，使人的生活都成为一种双重生活。在这部作品里，他也为自己政治上的失足进行了辩解。

贝恩的影响在五十年代超过了表现主义时期，他的诗集《蒸馏》（1953）、《尾声》（1955）等拥有大量读者。他在诗歌中运用的蒙太奇技巧，奇特的语言和比喻，存在主义的思想，对战后的一代青年作家和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表现主义戏剧

表现主义在戏剧上比在诗歌上取得的成就更大，出现了一批蜚声当时德国剧坛的剧作家。谈起表现主义的戏剧，首先我们想到作为这一流派的先行者弗·魏德金德（1864—1918）。他虽然是在自然主义运动中步上文坛的，但他的戏剧却为表现主义开了先河。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春醒》（1891）和《卢卢》（上部为《地祇》1895，下部为《潘多拉的盒子》1902）。《春醒》处理的是几个中学生在青春期过程中的悲剧，批评了一个僵化和虚伪社会的双重道德，这部作品由于展现了青少年的性冲动和性心理，首演成功后遭到禁演，二十年后才解禁。《卢卢》是一部以妓女为主题的作品，上部写美丽的卢卢玩弄男人，下部写男人们玩弄卢卢的故事，最后以悲剧收场。作者以一个不道德的题材，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道德要求。

恩·巴尔拉赫（1870—1938）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剧作家，也是版画家和雕刻家。从1912年起，他几乎每两年都有一部剧作。《死日》（1912）是他的第一个剧本，故事是：儿子力图摆脱开家庭，母亲竭力不让儿子离开。一匹神马作为儿子的愿望得到实现的象征出现，但母亲在夜里杀死了它。当新的一天到来时，这是一个死亡的日子。作者借助表现主义的通常主题：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在儿子这个形象上表现了人的本性的分裂，精神和肉体，依附大地的愿望和向往天际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儿子（人）在大（母亲）和神（父亲）之间摇摆，母亲的利己心理要把儿子桎梏在小天地，依附于自己，而他身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却不断使他醒悟，去追求一种真实的生活。

《穷表兄》（1918）处理的是类似的题材，表现了现实生活的俗不可耐和摆脱这种生活的不可克制的要求。《弃儿》（1922）被看做是最富有表现主义特征的作品，它写了一个丑陋、残疾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英俊、容光焕发的人的故事。在神秘剧《洪水》（1924）中他探索恶的起因问题。此外他还写有《兰色的博尔》（1926）、《美好的时代》（1930）等。

巴尔拉赫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受到迫害，他的雕塑作品被扔出美术陈列馆，他的戏剧作品被扣上“文化布尔什维克”的帽子被禁止。生活极为贫困，但他仍一直偷偷写他的长篇小说《被窃的月亮》（没有完成，1948年出版）。

卡尔·斯台恩海姆（1878—1942）出身银行家家庭，熟悉上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这十分有益于他的创作。他主要的成就是戏剧，写有一组系列喜剧《资产阶级英雄生活中的场景》（1908—1923），对威廉帝国末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他视自己是所处时代的一个医生，立意要成为时代的莫里哀，展示时代的种种痼疾，裸呈各种阶层人物的病态。他的系列剧中的每一部都是一幅讽刺画，其中著名的有《裤子》、《钱箱》、《市民施佩尔》、

《势利小人》，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对资产者的贪婪，对官僚的昏愤，对小市民的虚荣无不加以嘲讽和鞭挞。除了戏剧，斯台恩海姆写有短篇小说，利用短小精悍的形式和犀利的语言，对资产阶级社会极尽喜笑怒骂之事，他还写有中篇《二十世纪开始时期纪事》（1918—1928）和长篇《欧罗巴》（1919），但均不及短篇。

格奥尔格·凯泽（1878—1945）是表现主义戏剧家最杰出的一个，他的创作被看做是二十世纪德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本人成了欧洲激进一代青年人思想上的导师，他的剧作在欧洲各国首都的舞台上风靡一时。

凯泽生于马格德堡一个商人之家，没有进过大学，自学成才。他自1905年发表讽刺喜剧《克莱斯特校长》直到晚年流亡瑞士写的《士兵田中》（1940）共创作六十多部戏剧。他早期创作的多系性爱剧，或如有的批评家称为的情欲剧，如《犹太寡妇》（1911）、《戴绿头巾的国王》（1913）等，这些作品明显地表明了尼采的否定任何道德标准思想和魏德金德视情欲为一种主宰力量的双重影响。1914年凯泽用叙事诗形式创作了《加莱的市民》，这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服务于表现主义的人的更新的原则。故事取材英法百年战争。英王爱德华三世长期围困加莱城，下了最后通牒：或是加莱城和它的全部居民毁灭，或是由六名最有声望的市民手捧城市的钥匙，身穿粗布衣服，头带绳索来接受战胜者的惩罚。为了拯救城市，老人埃斯塔什·德·皮埃尔建议接受通牒，并第一个报名。随后又有六个人报名。多了一个，决定抽签，可结果七个都抽中，原来皮埃尔做了七个同样的签。他又建议，明晨在钟声响时同来广场，只有最后到广场的人方可活命。翌日，六人都到广场，唯独不见皮埃尔，人们议论纷纷，这时人们抬着皮埃尔的尸体来了，原来他夜里服毒自杀。他以自己的死，使六个准备献身的人更高尚地、更心地纯洁地去履行自己的道德准则，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正当这六个人准备前去就义时，英王由于喜得一子而赦免了加莱城。皮埃尔的失明的父亲在儿子的灵柩前庄重地说道：“我看见一位新人，他已在今天夜里诞生了。”

《从清晨到午夜》发表于1916年，但第一稿写于1912年。这部作品并没有从正面写新人的诞生，而是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和巧妙的构思，描写了私有制社会中金钱的罪恶，它摧毁了人的精神，腐蚀了人的本性，使人堕落。这也正从反面表现了新人的诞生的必要和必需。在随后的几年，凯泽相继完成了三部曲《珊瑚》（1917）、《瓦斯》（1918）、《瓦斯》（1920），以及宗教神秘剧三部曲：《地狱——道路——尘世》（1919）。在这些作品里，它们从不同角度探索新人的主题，表达了作者的绝望情绪。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人堕落，不容新人存在。《瓦斯》中的结局：作为新人的形象的主人公打破盛有红色毒气的瓦斯的烧瓶，消灭了一切生命，一堆堆钢铁、玻璃和人的尸体堆满了舞台。这是凯泽的，也是表现主义左翼作家的，是整个魏玛共和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新人理想破灭的象征。

自《瓦斯》之后，凯泽转向消闲作品的创作，发表了《低级趣味小报》（1924）、《出奔威尼斯》（1923）等。这种转向在当时一些激进表现主义作家当中是较为普遍的，这表明他们理想的幻灭和对魏玛民主制度的失望。

希特勒上台后，他受到迫害，秘密逃往瑞士，过清苦的生活，动辄都有被驱逐的危险。然而，正是这种生活上的不幸却成了他创作上之大幸。他坚持写作，在此期间的戏剧和诗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代

代表性作品有《士兵田中》（1940）以及诗集《劳动·诗集》等。

恩斯特·托勒（1893—1939）出身一个富裕家庭，曾在法国的一所大学学习，大战爆发后，他回国进入军队当了志愿兵。仅仅十三个月的前线生活，使他从一个“爱国者”变成一个战争的激烈反对者。从前线回到学校，成立了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德国青年文化政治同盟》，要消灭贫穷，解决各国间的纷争。他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1918年参加慕尼黑工人罢工，被捕入狱。就是在狱中，他完成了剧作《转变·一个人的搏斗》（1919）。这个作品带有自传的性质，它描述了一个“爱国者”在战争中的转变，目睹战争的罪恶，主人公成为新人，在结尾中号召受蒙骗的人起来革命。

1919年托勒成为巴伐利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统率一支刚建立的红军。失败后被判徒刑，在狱中度过了五个年头。在狱中他先后创作了他的代表性剧作；《群众和人》（1921）、《机器破坏者》（1922）、《跛子》（1924）和诗集《燕之书》（1924）。在这几部作品中，托勒对自己在革命活动中的困扰的问题，诸如革命和暴力，个人和群众，自由和专制以及对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索。它们是思想剧，具有一种政论性，和表现主义戏剧的抽象性。托勒的表现主义戏剧的力量在于直接地表现感情、思想和观点，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弱点，缺少生活气息和艺术上的苍白。

出狱之后，托勒又相继创作了《瞧，我们活着！》（1927）、讽刺剧《解放了的沃坦》（1929）、《熄灭炉火》（1930）、《双目失明的女神》（1932）等。《瞧，我们活着》是从伦理的角度探索革命和暴力的问题，有着浓重的悲剧主义色彩，《解放了的沃坦》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揭露。

希特勒上台后，托勒流亡美国，在完成了《不要和平》（1937）和《哈尔牧师》（1939）之后，出于悲观和绝望而自杀。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还有弗·冯·翁鲁（1885—1970）、瓦·哈森克莱维尔（1890—1940）、R·格林等人也都写了一些表现主义的剧作。

阿·德布林

比起诗歌和戏剧，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更难于体现表现主义的风格，虽说如此，一些作家做了有益的探索，用表现主义的方法去创作了一些作品，如卡·埃德斯米特（1890—1966）在短篇小说上取得的成就，克拉邦特（1890—1928）、莱·弗朗克（1882—1961）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收获，此外还有一些作家，然而贡献最大的首推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8—1957）。

德布林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出身犹太家庭，大学时攻读医学，毕业后一直在柏林工人居住区行医。在这期间他开始写作，并参与表现主义杂志《风暴》的编辑工作。1918到1920年他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又加入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撰写了不少政论，批判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和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上台后，他先是逃亡法国，后逃亡美国。战后返回德国从事文化工作，编辑杂志，参与创办美因兹科学院。1951年移居法国，晚年疾病缠身，死于弗赖堡。

不能用表现主义来概括德布林的全部创作，但他的早期几部作品却是代表了表现主义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最高成就。1915年他发表了以中国清朝为背景的长篇《王龙的三跳》。王龙是一渔夫的儿子，以偷窃为生，他为穷人报仇杀死贪官，被迫上山为盗；在山上他原本主张道家的“无为”，可由于同白莲教为伍，又被拥为首领，在官军的进剿下，被迫反抗，失败后他又返回“无为”的道家立场。这就是他的三次跳跃。德布林用老子《道德经》中的

一段话做为这部作品的主旨：“将欲取天下而为之，我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藉助王龙这个人物，形象地表达这个思想。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是给作者带来世界声誉的一部长篇。它讲述了主人公弗朗茨·比贝尔科普夫的故事：运输工人弗朗茨失手将情人打死，在狱中关了四年，出狱后想安份守己重做新人，但他一再被搅进各种事件中去。世界的丑恶，生活的龌龊，人性的卑劣，使他一再改旧图新而不可得，竟成了盗窃团伙中的骨干，最后由于杀人嫌疑罪被捕入狱。经过多次打击，弗朗茨精神崩溃神志不清，被关进精神病院。然而，他终于又站立起来，做了工厂的看门员，成为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个。

在这部作品中，德布林大量采用了蒙太奇技巧，意识流的手法，来表达人物的心态。在语言的运用上刻意求工，把方言、俚语、黑话、报章术语、广告用语、官方布告等交织起来，制造出一种时代氛围和地方特色。这部长篇为揭示大都市下层社会人物的精神状态创造了新的表现形式，这对德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流亡时期，德布林创作了长篇小说《不予宽恕》（1935），揭露殖民地罪恶的《亚马逊》三部曲（1935—1948）和反映德国1918年革命的三部曲《1918年11月，一场德国革命》：《被出卖的人民》、《前线部队归来》和《卡尔和罗莎。一个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故事》。它描写了战后德国政局的动荡，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十一月革命的爆发，魏玛共和国建立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遇害等历史事件。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哈姆雷特或漫漫长夜有尽头》（1956）是对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一次清算，探讨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

德布林始终是位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作家，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持批判的态度；试图把东方的佛教、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救世说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以此去改变世界。

批判现实主义

德国现实主义中社会批判倾向在上一个世纪末的一些作家身上已有所发展，特别表现在冯塔纳晚年的作品中。这一条现实主义的路线在二十年代里明显地加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随之的革命时期，战后的悲惨境况，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年代，工人失业，党派斗争，这些时代的和社会的课题为现实主义增加了批判的内容。包括自然主义在内的各种流派：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实际主义等，它们承受不了这么多这么沉重的任务，从本质上去反映去把握这个时代，尽管它们分别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只有批判现实主义才能承担这一历史的责任，一些自然主义作家、现代派作家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也证明这点。

魏玛共和国这一特定的环境规定了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性质和特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不断动荡，经济危机频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他们必须确定自己对时代所应采取的立场并对此做出解释。这样理性小说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作品的政论性和哲理性成了重心，而情节的发展和事件的叙述成为次要的了。从许多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们总是一再藉助人物形象进行抽象的论断和概括。“这样一来，往往会使情节具有哲学讽喻性质，而人物形象也作为一定政治及文化历史的思想 and 观念

的体现，具有了第二艺术生命。情节的哲学内容往往通过与一定的历史事件，与神话和过去文学中的传统情节的相互比较，获得充分的表现……寓意性、讽喻性、双重性、象征性成为现实主义方法中风格构成上的重要因素。”我们常说，德国小说中的哲理性强的原因也在于此。

在二十年代有一大批作家活跃在文坛上，他们有的虽然与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新实际主义等流派有着渊源，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些流派的色彩，但从其发展的倾向，从整体上看，应归入批判现实主义之列的。他们大都生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里列出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家的名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贝·凯勒曼、库·图霍尔斯基、汉·法拉达、卡·楚克迈耶尔、埃·马·雷马克、阿·茨威格、列·福伊希特万格、莱·弗朗克、阿·诺曼、瓦·冯·莫洛以及一些奥地利作家。对这些作家，不可能全都加以介绍，有些作家我们放在以后的章节，这里只选择少数几个稍加叙述。

贝·凯勒曼（1879—1951）的创作生涯从他 1904 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耶斯特尔和李》到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死之舞》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他的早期作品有着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色彩，如《茵格波尔》（1905）、《傻子》（1909）、《海》（1910）。进入二十年代，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现实问题，作品有了社会批判内容。1913 年发表的幻想小说《隧道》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在欧洲和美洲开凿一条水下隧道的故事，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与残酷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部小说是作家本人创作生活的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最早把哲学问题引进文学中的长篇之一。1920 年发表的长篇《十一月九日》是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作家用这部小说表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态度，鞭挞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以极大的热情去表现群众和革命行动。

法西斯上台，凯勒曼受到迫害，他的书被焚烧。他虽然没有离开德国，但他以自己的创作表明，他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对这个野蛮政权的异议。在这段“内心流亡”期间，他完成了三部长篇：《友谊之歌》（1935）、《兰绶带》（1938）、《格奥尔格·文德兰特的转变》（1941）。

战后他发表的《死之舞》是对纳粹主义罪恶的揭露，是对法西斯思想的清算，它描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发迹和毁灭。

莱·弗朗克（1882—1961）早期是个表现主义者，年到 1913 年他发表的几个短篇都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风格。《强盗帮》（1914）是他的成名作品，他以故乡维尔茨堡为背景，描写一群年青人的遭际：他们对现实不满，有着叛逆的性格，向往自由，有上进心。然而社会和环境却逼使他们一个个遭到了毁灭。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作用进行了批判。这一主题在他 1915 年发表的中篇《原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次大战时，弗朗克持反战观点，创作了一些短篇，它们是“在战争期间写的反战作品，而不是在战后写的反战作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创作的作品有长篇《市民》（1924）、《奥克森富特男声四重唱》（1927）、《卡尔和安娜》（1928）、《三百万中的三个》（1932）等。他自称《奥克森富特男声

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德国近代文学史》上，第 17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此系约翰内斯·贝歇尔的话，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编《德国近代文学史》，第 28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重唱》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批评界公认他这时期的佳作是短篇《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和中篇《卡尔和安娜》。前者描写一节冲向深渊的车厢里的各种不同乘客的心态，后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由于爱情魔力使看来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而且真的发生了的奇异故事。”

希特勒上台后，弗朗克被迫流亡，这期间完成了长篇《梦的伴侣》（1935）和创作长篇《玛特希尔德》（1948年完成）。战后他主要作品有《德国故事》、《米歇尔归来》和自传体长篇《心在左边》等。

汉斯·法拉达（1893—1947）是二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他的头两部长篇《少年格德沙尔》（1920）、《安东与海尔达》（1923）是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写成的。1932年发表的《小人物，怎么办？》是他的重要作品。在此后的一些作品，他都把“小人物”做为题材，对他说来，小人物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代表者，赋予小人物的悲剧以一种社会性质。法西斯上台之后，法拉达没有离开德国，他深居简出，想超脱现实。然而，这无法不影响他的思想、他的创作。他发表一些摒弃现实问题、追求肤浅趣味性的东西。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规避一个作家的责任。对法西斯的憎恶，使他鼓起了勇气，完成了他的重要的代表性作品《狼群中的狼》（1937）、《铁汉子古斯塔夫》（1938）。在这两部作品里，法拉达以德国二十年代为背景，揭露了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纳粹势力的崛起和罪恶。在希特勒统治最后年代，他被当做“文化布尔什维克”，受到监视，被投入精神病院。战后他参加了政治活动，担任了菲尔德贝格市长。写了多篇文章、评论，并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各人单独死去》（1947），这是作者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也是战后最早描写国内抵抗运动的作品之一。

楚克迈耶尔（1896—1977）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戏剧家，他在表现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成为新实际主义的代表，从三十年代初转向批判现实主义。早期的代表作有喜剧《快乐的葡萄园》（1925），这部作品缺乏社会深度，表达了生活的快乐。1927发表的《欣顿汉纳斯》是一部以反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悲剧，歌颂了一个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的爱国主义事迹。《科伯尼克上尉》（1931）是楚克迈耶尔的代表作，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一个出狱的囚犯穿上一套上尉制服到处招摇撞骗，所到之处，通行无阻。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得到一张身份证，去老实地做人。当事情闹大了，他去自首，并希望在他再次出狱时给他一张身份证。作者藉助这样一个啼笑皆非的喜剧，对威廉帝国的军国主义精神和小人物的心态做了入木三分的讽刺。托马斯·曼称这是自果戈理《钦差大臣》以来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喜剧。

纳粹上台后，他先是逃亡奥地利，随后流亡瑞士、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为好莱坞编写剧本。战后返回德国，1966年加入瑞士国籍，先后创作了一批剧本，其中《魔鬼的将军》（1946）为战后德国剧坛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代表作之一。此外尚有《巴尔巴拉·布洛姆贝格》（1949）、《冷光》（1955）、《捕鼠人》（1975）等。除了戏剧之外，楚克迈耶尔还创作有小说、诗歌，重要的有长篇《掌握生杀大权的人》，诗集《树》等。

埃·马·雷马克（1898—19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服役，去西线作战，五次负伤。战场上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他有可能在1929年写出了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小说《西线无战事》。这部作品带有自传的色彩，它以白描的手法，冷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班八个士兵在前线战壕的经历和悲惨的结局。作者淋漓尽致地对战争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另一方面又深沉

的描写了士兵之间的友谊、人性之爱，这更激起了对战争的憎恨和对这群年青士兵的同情。继《西线无战事》，雷马克又写了续篇《归来》（1931），描写了肉体上活过了战争，但精神却已被战争戕害的士兵回到后方的种种感受。

希特勒上台后，雷马克的书被焚。他一直流亡国外，1939年前往美国，后加入美国籍。此后他的创作的主题就由战争转为对法西斯罪恶统治的揭露。四十年代他发表了长篇《流亡曲》（1941）和《凯旋门》（1946），描写了流亡者在法西斯追捕下的险遇；五十年代出版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生命的火花》（1952）、描写法西斯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生死存亡的年代》（1954）。《里斯本之夜》（1962）和《天堂里的阴影》（1971年发表）是他晚年的两部长篇，它们仍以逃亡为主题，题材与《流亡曲》、《凯旋门》雷同，虽然作品的视角不尽相同，但在艺术上都没有超过《凯旋门》所达到的水平。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在魏玛共和国一度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它在德国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作家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并且日益壮大。在这支队伍中不仅有像汉斯·马尔希维察、维利·布莱德尔、路·图雷克、卡·格林贝格、埃·京克尔、汉·洛贝尔这样一些出身工人的作家、诗人，而且还有一些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的知名作家，他们把自己的创作同工人阶级的命运和斗争联系在一起，如约·罗·贝歇尔、埃里希·魏纳特、安娜·西格斯、路·雷恩、布莱希特、弗·沃尔夫、贝·拉斯克、卡·魏斯科普夫等。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的建立和日益壮大，这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号召全世界的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作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创建工人阶级文学的斗争中联合起来。1927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代表德国参加会议的是贝·拉斯克、约·罗·贝歇尔、卡·魏斯科普夫等。1928年春，在柏林举办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首次公开讲演会，在这一年的十月，联盟正式成立，约·罗·贝歇尔是联盟的领导人。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出现，它不仅把自己与资产阶级文学区分开来，也与左派自由主义作家划清了界线。

1929年秋，联盟的机关刊物《左翼路线》开始发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了自己的组织，也有了自己的阵地，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明确的路线，这就是团结工人出身的作家和从资产阶级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作家。联盟把他们与德国共产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它竭力使文学事业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

随着联盟的成立，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第一批大型作品，这些作品为当时的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主题，新的形象和新的内容。它们描述了德国工人为争取本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反映了资产阶级优秀作家与本阶级的决裂和世界观转变的艰难历程。《燃烧的鲁尔》（1928）是工人作家卡尔·格林贝格的一部大型作品，它反映战后革命危机时期鲁尔

参见《行动·宣言·展望——关于在魏玛共和国争取文学创作自由的斗争报告和文献》，1966年，柏林和魏玛。

区工人的斗争；汉斯·马尔希维察的《埃森风暴》（1930）反映的是同样的题材。路·雷恩的《战后》（1930）、路·图雷克的《一个无产者的自述》（1930）、卡·魏科列普夫的长篇小说《斯拉夫之歌》、汉·洛贝尔的长篇《一个受殴打的人》（1930）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这里我们要对埃里希·魏纳特和汉·马尔希维察这两位作家稍加叙述，至于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如贝歇尔、安娜·西格斯等人留到下面几章予以介绍。

埃·魏纳特（1890—1953）出身于一个工程师家庭，父亲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青年时期他曾在工厂做学徒，后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担任绘画教师，并开始文学创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战场上的经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他有强烈的影响，开始创作一些政治讽刺诗，并在酒吧间朗诵，与左派和共产党接触。他在左派杂志上发表诗歌；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有二千多次，成为受群众欢迎的“工人诗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立的发起人之一，1929年加入共产党。

魏纳特是一个政治诗人，他一生从未发表过一首抒发个人情绪或者耽于哲理的诗歌，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理解，他的文集被称做是一部独特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诗歌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工会的官僚政治，抨击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种种恶行，讽刺苟且偷安、因循守归的小平民。在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时，他把笔锋直指希特勒及其帮凶，提醒人民不要受骗。

这位政治诗人一直受到魏玛反动政府的迫害，他曾因所谓的侮辱德国海军荣誉而受到审讯；发出了不许他登台朗诵诗歌的命令；而法西斯上台，他被迫流亡，西班牙内战时，他参加了国际纵队，他不仅是国际纵队的一位指挥官，而且还创作了不少诗歌和通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参加对德广播工作，1943年被选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主席。战后返回祖国，担任民主德国国民教育总局副局长，主管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工作。

魏纳特的诗歌继承了海涅、维尔特的政治讽刺诗传统，强烈的政治激情，火一样的讽刺，题材的尖锐性和现实性，语言的形象性，以及可朗诵性，使他的诗作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他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的著名诗人。

魏纳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诗作主要收集在《埃里希·魏纳特发言》（1930），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作品收入《同志们》一书，1933—1945年流亡期间的诗歌收入《向黑夜呼唤》（1947），此外，尚有文学日记《斯大林格勒回忆录》（1951）等。

汉斯·马尔希维察（1890—1965）是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生于一个矿工家庭，十四岁时即下井拖煤。1910年因参加罢工被开除，一次大战时被征入伍，1919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德国共产党。他从1924年起从事文学创作，1929年加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纳粹上台后他被迫流亡，1936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逃亡美国。战后返回德国，后任民主德国驻捷克大使等职。

马尔希维察的成名作报告文学《埃森风暴》（1930）记述了1920年鲁尔地区工人起义的斗争；长篇小说《煤矿上的战役》（1931）、《轧钢厂》（1932）也均是描写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是三部曲：《库

米阿克一家》(1934)、《库米阿克一家的归来》(1952)、《库米阿克一家及其孩子们》(1959),这是一部描写工人阶级的史诗性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一个从农民成长为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的过程,它写的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历史,而这一家庭代表的是整个德国工人阶级。此外,马尔希察还写有诗集、短篇小说等。

第三节 1933—1945 年的德国文学

概述

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的头子希特勒(1889—1945)被总统兴登堡(1847—1934)任命为德国内阁总理,魏玛共和国消亡,开始了德国历史上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年代。1934年8月2日,兴登堡病死,希特勒便兼任总统,自封为国家“元首”。德国法西斯主义是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出现的,而实际上,这名称不过是用来欺骗群众的幌子。法西斯德国的真正统治者仍然是垄断资产阶级、容克大地主和军国主义分子,再加上法西斯头子。更有甚者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们的权力之大达到了资本主义德国从未有过的程度。此外,法西斯政权也受到那些怀有强烈的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人的支持。

希特勒执政后,立即实行空前规模的法西斯统治。2月27日,戈林策划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嫁祸德国共产党,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包括德共领袖台尔曼(1886—1944)——被捕。4月,希特勒建立秘密警察组织,专门用来对付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接着又取消了除纳粹党以外的其他一切政党。5月10日,在柏林歌剧院广场及一些大学城里,根据德国报纸公布的“黑名单”(第一批有44名作家),焚烧进步作家和所谓“非德意志人”著作,其中有亨利希·曼、布莱希特、德布林、雷马克、卡夫卡等的作品;到1934年底,遭禁图书达4000种以上。与此同时,纳粹党煽动了空前规模的反犹太主义,迫害犹太人。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被迫流亡国外。

由于政治和种族原因,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作家流亡。因此,流亡文学成了这个时期德语文学的主流。流亡文学在文学史上也称为反法西斯文学。法西斯夺取政权、国会纵火案、焚烧图书、追捕犹太人、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第二次大战爆发,每个时期都造成作家流亡的浪潮。据统计,先后流亡的德语作家约有一千名,其中著名的德国作家有贝歇尔(1891—1958)、本亚明(1892—1940)、布莱希特(1898—1956)、布莱德尔、德布林、福伊希特万格、拉斯克—许勒、凯泽、亨利希·曼(1871—1950)、克劳斯·曼(1906—1949)、托马斯·曼(1874—1955)、马尔希维察、雷马克、雷恩(1889—1979)、内莉·萨克斯(1891—1970)、西格斯(1900—1983)、托勒、图霍尔斯基(1890—1935)、魏纳特、韦尔弗(1890—1945)、弗·沃尔夫(1888—1953)、楚克迈耶尔、阿·茨威格(1887—1968)等。黑塞(1877—1962)则早在1923年就加入瑞士国籍。这一大批作家中,后来有一部分人由于对前途失去信心,看不到出路而自杀,如图霍尔斯基、本亚明等。有一部分人在贫病交迫或精力耗尽后离开人世,如凯泽、拉斯克—许勒等。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居留国的国籍,如德布林、楚克迈耶尔、雷马克、克劳斯·曼等。只有一部分人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德国。不过,无论如何,德国流亡文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

震撼了当时世界文坛。

此外，在德国国内还有一批被称做“内心流亡”的作家，他们作为消极反对派而留在国内。他们的大部分著作，描绘的不是政治冲突，也不是社会冲突，而是心理、道德的冲突。这些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人敌视或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如贝根格律恩（1892—1964）、施奈德（1903—1958）、维歇特（1887—1950）、施罗德（1878—1962）等。另一部分人敌视或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民主准则的信仰，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否定，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如豪普特曼、胡赫（1864—1947）、凯勒曼、法拉达、凯斯特纳、巴尔拉赫、魏森博恩（1902—1969）等。

流亡文学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3年至1938年，此时，国外局势比较平静，流亡去向主要是法国、瑞士、捷克、荷兰、英国、苏联。第二阶段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时期战云密布，局势动荡，流亡的去向主要是苏联、美国和拉丁美洲。流亡文学没有造成文学史上的分裂，流亡在各个地区的反法西斯作家在作品中都反映了同样的发展路线。但是，德国流亡文学是由各种政治信仰和美学观点的作家组成的，他们中既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也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既有现代派作家，也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由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等原因，往往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和流派，有时还对某一方面的作品进行贬低。德国流亡文学的共同特点是强有力的政治性，流亡作家都对法西斯怀有强烈的仇恨，对祖国怀着深沉的思念和热爱。他们都反对希特勒、反对战争。他们都从个人的立场出发，提出警告和谴责，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辩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有了彻底的变化，原来的精神基础突然丧失，而受到居留国的影响却愈来愈多。他们的艺术意图不仅要考虑德语读者，而且还要考虑居留国的读者。

德国流亡文学中的反法西斯文化统一战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35年组成了以亨利希·曼和贝歇尔为首的德国流亡作家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会后，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德国反法西斯作家共同出版了《流亡中的德国作家》一书，这是德国流亡作家团结合作的一个表现。1936年夏，德、意法西斯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有二十多位知名的德国作家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如魏纳特、雷恩、马尔希维察、布莱德尔等，和西班牙人民一起同佛朗哥分子作战，并有一些作家献出了生命。

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侵占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反法西斯文学从这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久，德军占领了欧洲许多国家，大批流亡作家离开法国、瑞士等国去苏联、美国和拉丁美洲。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德苏战争。诗人贝歇尔、魏纳特等积极参加对德宣传工作，号召德国人民不要支持希特勒，德国士兵和军官不为法西斯充当炮灰。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彻底胜利而结束，成为二次大战的转折点。从此，德国法西斯军队节节败退。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法西斯德国覆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件，在这个时期的德语文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流亡文学中的各派作家先后创办了一些德语文学刊物，著名的有在阿姆

斯特丹出版的《文丛》（1933—1935），在布拉格出版的《新德意志之页》（1933—1935），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德文版》（1931—1945）和《言论》（1936—1939），在苏黎世出版的《标准和价值》（1937—1940），在墨西哥出版的《自由德国》（1941—1946）等，并在国外建立了一些出版社，如克维里多出版社，阿勒特·德·兰格出版社，贝尔曼——菲舍尔出版社。这些刊物和出版社对推动反法西斯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德国流亡文学表现了题材、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体裁上也是丰富多采，既有结构宏伟的长篇小说，也有短小的政治抒情诗，既有内容深刻的戏剧作品，也有尖锐的反法西斯报告文学。在反法西斯流亡文学中，涌现了大批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品，其中突出的是：亨利希·曼的《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1933—1943）和《浮士德博士》（1947），黑塞的《玻璃珠游戏》（1943），福伊希特万格的《假尼禄》（1936）和《流亡》（1940），阿·茨威格的《凡尔登的教训》（1935），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1942），雷马克的《凯旋门》（1946），克劳斯·曼的《梅菲斯特》（1936），布莱德尔的《考验》（1935）和《父亲们》（1941）。剧作家弗·沃尔夫的《马门教授》（1934）和《博马舍》（1941），托勒的《哈尔牧师》（1939），楚克迈耶尔的《魔鬼的将军》（1945），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四川好人》（1939/1941）和《伽利略传》（1938/1945—1947）。诗人拉斯克—许勒、内莉·萨克斯、贝歇尔、布莱希特、魏纳特等的诗歌作品。在文学理论上建树的是本亚明。

“内心流亡”的作家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不是说完全没有创作），如胡赫、卡罗萨、凯勒曼、凯斯特纳等。也有一些作家虽继续进行创作，但只写一些不涉及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纯属过去历史或个人生活的作品，如法拉达写了《狼群中的狼》（1937）、《铁汉子古斯塔夫》（1938）等长篇小说。另一小说家贝根格律恩写了长篇小说《大暴君和审判》（1935）和《天上人间》（1940）但出版后因引起反法西斯的政治共鸣，仍遭查禁。小说家维歇特因对纳粹统治表示不满，于1938年被关入集中营两个月，释放后被禁止写作，后来他以自己在集中营中的亲身经历写成《死人之林》（1945），控诉了纳粹暴行，歌颂了集中营里的反法西斯斗争。“内心流亡者”的反对派文学，尤其是当时流传的诗传单和以隐蔽手段公开出版的作品，在希特勒统治的年代确实进入了德国读者的精神生活中间，产生了谴责纳粹暴行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作用。

有极少数作家在法西斯恐怖的形势下，进行文学创作，写下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作品。如彼得森（1906—1969）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留在国内，1935年他化装逃出德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他作为德国地下文学的代表，给大会带来了多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纪实小说《我们的街道》（1936），记叙了柏林一条街道的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在发言中说：“无论怎样，在德国存在着地下文学”。有些作家正是因为从事地下写作或表示对纳粹统治的不满而惨死在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如米萨姆（1878—1934）、赫尔曼（1871—1943）、库克霍夫（1887—1943）、奥西埃茨基（1889—1938）等。

第三帝国统治下，对文化生活的控制特别严密。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下

专门设有“帝国文化总局”，下设新闻、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分支机构。凡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院”成员，第一必须是纯血统的亚利安人，第二必须完全符合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人，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创作了颂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作品，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写下了歌颂希特勒、歌颂法西斯主义、歌颂侵略战争的作品。如博伊梅尔堡（1899—1963）、德温格尔（1898—？）、布隆克（1888—1961）、约斯特（1890—1978）、科尔本海伊尔（1878—1962）等。第三帝国的法西斯文学，在艺术上没有多少价值，只是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堕落。诗人贝恩（1886—1956）在纳粹党刚上台时曾发表广播讲话表示支持，但不久即发现自己的错误，从1935年起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1933—1945年间的法西斯统治时期，是德国历史上黑暗野蛮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由于政治、战争等因素情况特别复杂，但是不容置疑，流亡文学是这个时期德国文学的主流，取得了累累硕果，在德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坛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1875—1955），二十世纪德国杰出的小说家。1875年6月6日出生于吕贝克一个大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尼德兰王家参议，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891年去世之后，商号倒闭，家道中落。母亲于1892年带着三个妹妹迁居慕尼黑，他留在吕贝克读完中学。服一年自愿兵役，但未到期即被革除。1894年托马斯·曼也来到慕尼黑，在火灾保险公司当见习生，次年参加讽刺性杂志《西木卜里其西木斯》的编辑工作。1894年在自然主义杂志《社会》上发表中篇小说《堕落》，获得好评，决定专攻文学，并在大学旁听历史、经济和文学艺术课程。1895年至1897年间，和哥哥利希·曼两度旅居意大利，开始职业创作生涯。1898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矮个先生弗里德曼》。1901年发表长篇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给他带来很大声誉，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托马斯·曼早期创作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的影响。这个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1902）、《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在威尼斯之死》（1912），短篇小说《神童》（1903）、《沉重的时刻》（1905）等，描写了艺术家孤独、彷徨、苦闷的情绪和某种病态心理，在一程度上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艺术家的时代特征。1905年托马斯·曼与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女儿卡蒂亚·普林斯海姆结婚，生有三子三女，其中大儿子克劳斯·曼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二儿子戈罗·曼是一位历史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马斯·曼认不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曾针对亨利希·曼批评德国战争政策的政论《左拉论》，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与哥哥论争。战后，他继续写作因战争而中断的长篇小说《魔山》，该书于1924年发表，又一次受到文坛的重视。1929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1930），预示了法西斯主义垮台的必然性。

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托马斯·曼的政治认识有了提高。他被迫流亡国外，在瑞士参加反法西斯阵线，1938年到美国，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他在流亡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收在《注意，欧洲！》（1938）、《民主即将胜利》（1938）、《德国听众们！》（1945）等文集里。1933—1943年间，托马斯·曼陆续出版了卷帙浩繁长篇小说《约

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第一部《雅各的故事》（1933），第二部《年青的约瑟》（1934），第三部《约瑟在埃及》（1936），第四部《赡养者约瑟》（1943）。这一组著作取材于《圣经·旧约》中关于约瑟的传说，描写了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借以驳斥希特勒种族主义者妄图灭绝犹太人的种种谬论，全书充满人道主义思想。作者在法西斯分子迫害犹太人的高潮中，写出这样一组作品，用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1939年，托马斯·曼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绿蒂在魏玛》，写老年歌德于1816年和他青年时代曾热恋过的情人绿蒂在魏玛会面的故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歌德的伟大形象，同时也写出了他渺小的一面。但是，在描写歌德的心理状态时，又采用了现代派意识流手法，通过歌德大段的内心独白，再现了歌德生活的时代、矛盾的性格和卓越的思想。这部作品以及作者在此之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歌德和托尔斯泰》（1923）、《歌德——资产阶级时代的代表》（1932）、《叔本华》（1938）等，可以说是托马斯·曼对他青年时代把叔本华、尼采、瓦格纳奉为引路的“三颗明星”的清算，同时也是转向歌德和转向德国古典文化的标志。后来，托马斯·曼发表的政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1946），是一篇表明世界观进一步转变的代表作。

托马斯·曼后期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它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灾难，是一部“痛苦之书”。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被挑选者》（1951）、《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自白》（1954），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1953）等。

托马斯·曼一生维护人道主义传统，在艺术创作上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他的小说结构严谨，独具匠心。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虽于1944年获得了美国国籍，但对五十年代初美国推行麦卡锡主义、迫害进步人士极为不满，愤而离开美国。他希望德国民族得到统一，在没有统一前，他于1952年选择瑞士作为定居地。1949年，纪念歌德诞生二百周年时，他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和东德的魏玛各发表一次演说；1955年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时，他又在西德的斯图加特和东德的魏玛各发表一次演说。这两项活动引起了巨大反响。托马斯·曼曾获多项文学奖，并被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包括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在世界各地庆贺他八十寿辰后不久在苏黎世逝世。他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发表于1901年，这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证书上特别提到“这部作品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有个副标题：《一个家庭的没落》。托马斯·曼在这部小说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一个旧式资产阶级家庭在精神道德和经济上的没落，刻划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揭示了弱肉强食的资产阶级法则。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

故事发生在商业城市吕贝克，着重反映的是1835至1876年间的历史，这正是德国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小说开始，靠拿破仑战争起家的大粮食商约翰·布登勃洛克刚买进一座大宅，亲友们都来庆贺。这个家庭有经济

实力有社会地位。到第二代小约翰继承家业后，他有了一个竞争者：暴发户哈根施特罗姆。小约翰怂恿和胁迫女儿安冬妮放弃与医科大学生莫尔顿的爱情，嫁给汉堡“富商”格仑利希。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买空卖空的投机商，安冬妮在丈夫身败名裂后同他离婚，回到娘家。这时，小约翰因商业上竞争激烈，加之时局动荡，女儿婚事上又失算，处境非常困难，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而继续恪守传家箴言：“白日精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家业时，两个家族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程度。由于战争、投机失败等天灾人祸，托马斯连遭打击，败落下来。托马斯死后，儿子汉诺体弱多病，胆小怕事，更无法适应这个社会，不久早夭。这一显赫一时的家族终于没落。

托马斯·曼在这部五十余万言的小说中，以他家族亲友为原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巨大的德国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两个重大阶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通过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写，包括婚丧嫁娶、圣诞节等活动，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揭示历史时代的更迭。结构严密，语言精练，对话生动，有幽默感和吸引力。这是托马斯·曼早期最重要的小说。

发表于1924年的《魔山》，可以说是他中期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中达沃斯一所肺病疗养院里的故事。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刚从大学毕业，从汉堡到疗养院来探望表兄约阿希姆·齐姆森。他打算只在山上逗留三星期，但医生诊断，说他患有肺病，于是就住了下来，从1907年呆到1914年。疗养院的病人来自欧洲许多国家，都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个圈子和外界社会完全隔绝。汉斯住在这里，忘却了自己的事业计划，疗养院成了一座“魔山”。他与意大利作家泽特姆布里尼交往，深受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又迷恋于俄国女人克拉美迪娅的美貌；接着又受耶稣会教士纳夫塔的强权暴力观点的影响。小说通过汉斯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国际资产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朽，他们靠股息和年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是一部德国传统的教育小说，后来主人公汉斯终于领悟到“人为了善和爱就不应该让死亡统治自己。”最后他摆脱了等待死亡的思想，离开疗养院。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已经打响。汉斯和其他青年一起，被驱赶上硝烟弥漫的战场。

托马斯·曼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病态社会和疗养院的病态环境，以及住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病态心理，谁要是落进这个世界，就会被病魔所袭，很难摆脱。疗养院病人在茶余饭后进行的范围广泛的辩论，反映了托马斯·曼对一次大战前后时代的分析，因此它也是一部“时代小说”。

托马斯·曼后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它有一个副标题：《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一生》。这部作品写于1943—1946年间，1947年出版。小说通过哲学博士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为他死去的同学和挚友、音乐家阿德里安·莱弗金写传，描述了莱弗金1885至1940年的一生经历。莱弗金出身农村，从小有音乐天赋，但性格孤僻。上中学时，受教堂风琴师克莱契玛尔的教育，研习乐器和音乐知识。中学毕业后，先在哈勒大学学习神学，后转到莱比锡学习作曲。在学生时代，他就创作了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不过也染上了缠绵终生的疾病。旅行意大利时，他偏头痛发作，在幻觉中受魔鬼引诱，订立契约：魔鬼答应在二十四年内不断

给予灵感，使他创造出最美的音乐作品，他必须为此舍弃一切人间的爱，二十四年后灵魂归魔鬼所有。莱弗金回国后，定居慕尼黑乡间，埋头创作，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音乐作品。最后他致力于大型清唱剧《浮士德博士的悲歌》的创作，1930年完成后，他邀集了约三十位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到他居住的乡间，准备介绍这部作品。演奏前，他作了一个奇特的自白，自述与魔鬼订约的事。客人非常震惊。当他坐在钢琴前准备演奏时，突然晕倒在地，后来虽然醒了过来，但已失去理智变成痴呆。他又生活了十年，于1940年8月正当纳粹德国沉醉于征服世界的迷梦中时死去。而当蔡特布洛姆快写完这部传记时，已是1945年4月下旬，希特勒德国即将灭亡。但作者对德国人民和德国的前途没有失去信心：“愿上帝保佑你们可怜的灵魂，我的朋友，我的祖国。”

这是托马斯·曼的精心之作，内涵非常丰富。作者通过语言的不断变化和对音乐的阐述建构了这部鸿篇钜制。莱弗金梦幻中出现的魔鬼代表了二十世纪的非理性主义，与魔鬼订约意味着莱弗金把灵魂出卖给了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托马斯·曼认为，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莱弗金是一个有音乐天才的人，因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才去与非理性主义（魔鬼）结合；德意志民族是有才能的民族，也因一时迷失方向，才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所奴役，所以作者让现代浮士德——莱弗金在1930至1940年这十年中痴呆不清醒。音乐是德意志的象征形象。评论家认为，托马斯·曼通过莱弗金这个艺术形象以及他的一生经历，描绘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和过错，同时也清算了作家自己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无怪乎作者称这部小说为“痛苦之书”，它不光是“一部音乐小说”，首先想到的是“一部文化和时代小说”。作品中莱弗金的思想、气质、经历以及他变成痴呆等细节取材于尼采的实事。

亨利希·曼和黑塞

亨利希·曼（1871—1950），是托马斯·曼的哥哥，也生于商业城市吕贝克。他青年时代在书店和出版社工作，后来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大学学习。1894年开始发表小说，早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懒人乐园里》（1900），通过对交易所经纪人、投机商人、银行家和暴发户的描写，辛辣地讽刺了柏林新闻界和交易所。长篇小说《垃圾教授》（1905），描写了中学教师拉特的两面性，借以抨击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揭露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堕落；这部小说后由剧作家楚克迈耶改编成电影，名为《兰天使》（1930），放映后引起轰动。另一长篇小说《小城》（1909）以意大利为背景，通过一个剧团在小城的演出，描写了一次大战前意大利的社会生活，是对民主制度的一曲颂歌。

亨利希·曼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臣仆》（1918），这部作品完成于1914年。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未能出版。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他还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一些剧作。一次大战前后，他写了大量政论，抨击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号召进步作家投入反战运动，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由衷的拥护。政论中最著名的是《左拉论》（1915），它以拿破仑三世——威廉二世、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左拉——亨利希·曼三重伪装，借十九世纪下半叶时的法国含沙射影地攻击正在进行战争的德意志帝国。重要政论集有《权力和人》（1919）、《理性的独裁》（1923）、《七年》（1929）和《精神与事业》（1931）。

1933年法西斯上台，亨利希·曼流亡法国，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一起反对希特勒暴政和侵略政策。在此期间，完成了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1940年法国沦陷前夕，他流亡到美国。在那里完成了自传《观察一个时代》（1944）和长篇小说《呼吸》（1949）。二战结束正当他准备回德国时，不幸病逝。后遵照遗愿，骨灰运回柏林安葬。

长篇小说《臣仆》是亨利·曼最重要的小说，它是《帝国》三部曲中最成功的一部，另两部为《穷人》（1917）和《首脑》（1925）。《臣仆》创作于1912—1914年间，完成后于1914年7月先在慕尼黑著名杂志《时代画报》上连载，但因一次大战爆发，于1914年8月13日遭到禁止，中断登载。1918年才让出版，大受欢迎，六星期内销售十万册，创当时的新记录。

《臣仆》可以说是威廉二世时代的真实记录，它不仅揭露批判了德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整个德意志帝国也作了全面的揭露批判。小说通过主人公狄德利希·赫斯林的一言一行，塑造了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谄媚君主的忠顺臣仆的典型形象。赫斯林的父亲是旧普鲁士军官，战争中发了财开了造纸厂，母亲是一个懦弱的人。赫斯林自小性格就非常复杂。在家里在学校里，他都欺软怕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继承父业。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最后无耻地投向保皇党。贯穿他一生的是又胆小又残忍，害怕权势又崇拜权势，在强者面前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是暴君，这样一个体现了当时德国一切忠诚臣仆各种特点的典型。无限忠于德皇的奴隶劣根性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亨利希·曼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使《臣仆》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小说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讽刺的笔调刻画人物形象，然后用这些形象进行深刻的揭露，其次是广泛使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彻底暴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外形特征。看完全书，对赫斯林无不感到可憎，都会有“赫斯林——丑恶”（德文原义）的感觉。小说第六章中，赫斯林在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讲和表现，一方面反映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另一方面也显露了赫斯林之流色厉内荏的本质。当他正大言不惭地讲述德意志帝国的光荣历史时，一阵暴风雨袭来，他吓得赶忙躲在桌子底下的丑态，使人忍俊不禁。全书语言幽默生动，形象鲜明，讽刺性很强。

历史小说《亨利四世》，是他另一部重要小说。该书分上下两部：《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这部作品取材于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代表封建势力的天主教集团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胡格诺教派，前后进行了三十多年战争。当时法国南边的纳瓦拉公国的王后珍妮是一个胡格诺教徒，她常用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和影响她的儿子亨利。亨利属波旁家族，这波旁家族又是十六世纪在朝的法国统治王族瓦罗亚的近亲旁支。后来珍妮成了南方新教胡格诺派的首领。不久，珍妮去世后，亨利成为新教首领。1572年，十九岁的亨利带领大批新教贵族前往巴黎和玛果公主结婚。但天主教集团首领洛林公爵吉士和太后卡塔林娜乘机策划了屠杀胡格诺教徒的“圣巴托洛美惨案”。亨利带去的贵族、将士大部被杀，他自己遭软禁，被迫改信天主教。卡塔林娜所以不杀亨利，主要是用亨利来牵制觊觎王位的洛林公爵吉士。亨利最后终于逃出巴黎，返回南方，与胡格诺派一起继续进行斗争。他以南方为基础，进行经济改革，争取到新

的支持者。查理九世死后，继位的亨利三世软弱无能，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由于瓦罗亚家族没有后裔，便立波旁家族的亨利为王位继承人。不久亨利三世被天主教联盟谋杀。亨利依法成为法国国王，是为亨利四世。1590年他出兵击败了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为了争取巴黎的天主教徒，不使国家动荡，他以国事为重，本着人文主义的宽容原则，违反他的胡格诺朋友们的意愿，再度改信天主教。对于北方的其他城市，亨利也一一用外交、经济手段加以占领，使国家得到统一。亨利四世为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强大，采取了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措施，并努力改善连年遭受战争灾难的农民的生活，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1598年亨利在南特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胡格诺新教徒也享有一切平等权利。这一民主政策结束了宗教对立和宗教战争，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亨利对发展经济和欧洲和平事业的努力，特别是他代表新兴市民利益的内外政策，激起了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多次派刺客暗杀他，终于在1610年5月13日被刺死，法国人民十分悲痛，为他守灵三周。亨利四世为法国统一，为建立法兰西民族国家，为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功绩。

亨利希·曼在这部历史小说中，借古喻今，以一个博得人民爱戴、代表民族利益的开明君主，影射抨击残酷迫害人民、制造民族灾难的希特勒独裁统治。亨利的一生始终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他几次改宗天主教，完全是为了顺应发展、顺乎民心，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作者塑造这样一位领袖形象，这和法西斯匪徒把希特勒吹捧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这虽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却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出生于符腾堡地区的卡尔夫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是与曼氏兄弟同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1891年迫于父命进毛尔布龙神学校学习，但他不堪忍受摧残身心的经院教育，半年后就逃离该校。1892年至1899年，当过学徒工、书店店员等，靠自修研攻文学。189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和散文集《午夜后一小时》，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后来陆续出版中、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1904）、《在轮下》（1906）、《盖尔特鲁德》（1910）、《罗斯哈尔德》（1914）和《克努尔普》（1915）等，这些作品描写了艺术家的孤独心境和城镇日常生活，显示了作者对自然和社会观察细微，语言文字优美的特点。

黑塞热爱东方文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哲人老庄的学说。1911年曾到印度旅行，1912年迁居瑞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投入反战运动，发表反战文章，并与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中篇小说《席德哈尔塔》（1922）是献给罗兰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时，他站在革命一边；但革命失败，他对德国失去信心，1923年加入瑞士国籍，住在乡间，基本上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这个时期，他发表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德米安》（1919）、《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德》（1930）和《东方之行》（193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慨，对现代文明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怀疑，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策，便只能从精神上寻求寄托和探索答案。1943年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人道主义理想。

黑塞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诗歌创作，1937年和1942年两次出版《诗集》。他还写了不少散文，其中部分是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写的散

文和童话。他的重要散文集有《早期散文》（1949）、《晚期散文》（1951）和《回忆之页》（1937初版，1959再版扩充）。

黑塞的作品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学结合在一起，熔传统的欧洲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于一炉。他侧重从精神和心理领域来描写和分析现实社会，洞察力强，语言优美，文笔流畅，生动幽默，具有浓郁的抒情味和深刻的哲理性。1946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证书上写道：“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一个范例。”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不少人因为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文明”，厌恶战争，从黑塞的作品中寻得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此掀起了持续的“黑塞热”。

长篇小说《在轮下》是黑塞的早期代表作，发表于1906年。小说主要描写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摧残，猛烈地抨击了德国的教育制度。主人公汉斯·吉本拉特是一个勤奋聪明的学生，母亲早死，父亲是一个胸襟狭隘的代理商。汉斯的聪明好学，是他父亲、牧师和教员的骄傲。但为了通过“邦试”进神学校学习，他被迫放弃了一切娱乐，身心受到很大影响。进了神学校后，整天和经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打交道，死记硬背，一点空闲都没有，继续受到摧残，身体愈来愈差。他与同学赫尔曼成了密友。赫尔曼生性倔强，蔑视功名，为学校所不容，曾受到处分。校长迫使汉斯与赫尔曼断绝来往。汉斯觉得只有赫尔曼才是自己的好朋友。汉斯用功过度，身体更加衰弱，学业成绩倒退。学校把这些归罪于赫尔曼。赫尔曼被开除后，汉斯更感孤独，并不断受教师的训斥和同学的耻笑。最后神经衰弱症使他不得不休学回家。他回家乡后做钳工为生。社会的歧视和个人生活的失意，使他感到自己仿佛掉进了庞大无情的“车轮下”。他的性格变得懦弱、胆怯，最后掉入河中淹死。

这部小说的部分情节是根据黑塞和他弟弟（名叫汉斯，被经院教育折磨致死）的经历写成的，控诉了德意志帝国时代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语言简洁，生动幽默。

黑塞从二十年代开始，试图从宗教和哲学两方面探索人类精神解放的途径，1927年完成中期代表作、长篇小说《荒原狼》。托马斯·曼认为《荒原狼》在试验的大胆方面并不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逊色。

荒原狼是一种比喻，黑塞想借此表达的是在思想破灭之后，人们变得无家可归，陷入恐惧和迷惘，恰如一条被人赶出荒原的狼，迷茫又恐慌。小说主人公哈里·哈勒尔自称荒原狼。他年轻时曾想有所作为，做一番有价值的事业；他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思想；他是一名中年作家，反对战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却招来诽谤和谩骂；他到处看到庸俗鄙陋之辈，追名逐利之徒，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孤独、彷徨、痛苦，烦躁不安，无家可归。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精神病态和危机，曲折地反映了德国社会现实以及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小说的结构新颖、巧妙、严谨，分为三个部分：（1）出版者序。这实际是小说的引子。（2）哈里·哈勒尔札记——为狂人而作。这是真正的故事主体。（3）所谓的魔幻剧院。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主人公的精神痛苦和危机并不是通过描写他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而是通过自我解剖、通过灵魂的剖析而呈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心理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中幻想和现实的交织，形成费解的、多层次的结构。小说中的自我剖析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黑塞对自己的剖析。主人公哈里·哈勒尔和赫尔曼·黑塞这两个名字的开头两个字母都是H，这是一个明证。但由于这部小说主要是心理分析，故事情节不多，因此不太容易理解。

《玻璃珠游戏》是黑塞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后期代表作，始写于1931年，1943年出版。故事发生在2200年左右的未来世界，二十三世纪的编年史家描写玻璃珠游戏的发展过程。小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子，叙述玻璃珠游戏的历史和意义。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是音乐和数学演变而成的符号系统，集科学和艺术、思想和感情于一体。第二部分为玻璃珠游戏大师约瑟夫·克内希特传。在与世隔绝的卡斯塔利亚有一个宗教团体，其宗旨是通过玻璃珠游戏为全国培养精神人才。孤儿克内希特聪明、刻苦，有音乐天赋，十二岁时被吸收去卡斯塔利亚学习，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因潜心研究《易经》、《吕氏春秋》等中国古代著作，精通玻璃珠游戏的规则，成为出色的人才；后被教团委派去本笃会修道院传授《易经》和玻璃珠游戏。后来前任玻璃珠游戏大师托马斯去世，克内希特被选为大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他内心产生矛盾，逐渐不满足于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的生活，怀疑卡斯塔利亚存在的价值。他决心回到现实世界去过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用教育来改善整个世界。他认为从教育入手世界就能由乱而治，精神与自然就能和谐一致。然而他事业未竟就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第三部分收集了克内希特的遗著，包括十三首诗和三篇传记。

这部小说以东、西方的宗教、哲学揉合而成，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它是黑塞的理想世界，但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作品具有乌托邦的教育小说性质，反映作者对未来和谐社会的向往。小说中许多地方赞美了中国的古代哲学，表明黑塞对东方文化的热爱。

福伊希特万格和阿·茨威格

列翁·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德国作家。1884年7月7日出生于慕尼黑一个犹太工厂主家庭。1903—1907年在慕尼黑和柏林攻读哲学、语文学、人类学和梵文。1908年创办文学月刊《明镜》，后在《舞台周报》担任剧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突尼斯旅行被法国当局拘押，后逃回德国，接着服军役半年，以后全力从事文学创作。他作为目击者经历了1918年的革命，并从这时开始与布莱希特建立深厚的友谊。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正在美国作讲演旅行。他被取消德国国籍和剥夺博士学位，作品也被焚毁。1933—1940年在法国流亡，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其间曾去苏联访问，和布莱希特等一起创办文学杂志《言论》。1941年经葡萄牙流亡美国，以后就一直住在那里。1958年12月2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逝世。

福伊希特万格最初创作以戏剧为主，后来转向长篇小说，尤其擅长写历史小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重要的长篇历史小说有《丑陋的女公爵玛格雷特·毛尔塔施》（1923）、《犹太人徐斯》（1925）、《假尼禄》（1936）、《约瑟夫斯》三部曲（1932—1942）以及关于西班牙画家戈雅的《戈雅》（1951）、关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愚人的智慧》（1952）等。这些历史小说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以历史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借古喻今，分析和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和本质；二是叙述犹太人的命运，塑造其中的典型人物；三是从一个侧面宣传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

他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是著名的《候车室》三部曲，包括《成功》（1930）、《奥培曼一家》（1933）和《流亡》（1940），描写了德国法西

斯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它的残暴统治，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福伊希特万格一生写有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多部戏剧作品，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重要的作家。曾获原民主德国国家奖、慕尼黑市文学奖等。

福伊希特万格的长篇小说《假尼禄》（一译《伪皇尼禄》）写于1936年。这时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已横行一时，气焰嚣张，自以为稳住了政权，正积极准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假尼禄》的发表，无疑是对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党徒的一个沉重打击。

明眼人一看便知，“假尼禄”即是希特勒。在古罗马帝国历史上，尼禄皇帝（公元54—68年在位）是一位残酷无道的暴君。据史料记载，他死后，曾三次有人冒充他。福伊希特万格根据这些史实，虚构了这部历史小说，借古喻今，影射希特勒及其一伙的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揭露法西斯的残暴本质，并预言了他们必将遭到的可耻下场。《假尼禄》写尼禄在位时的宠臣、元老瓦罗有一奴隶名叫特伦茨酷肖尼禄。瓦罗多次把他带进宫去，扮作皇帝，供真尼禄嬉耍取乐。尼禄死后，瓦罗遭贬，流落罗马东方属地（今叙利亚一带）。瓦罗为继续推行尼禄使东方罗马化的政策，便让特伦茨冒充尼禄，利用罗马与东方强国巴息之间的矛盾，在东方属地建立政权。假尼禄特伦茨、投降的罗马军官特莱波恩上尉、特伦茨的奴隶克诺普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最终逃不脱覆灭的命运。这三个人物也就是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写照。

《假尼禄》共分四部：第一部《发迹》，第二部《顶峰》，第三部《下坡》，第四部《垮台》。全书富有戏剧性，作者善于把历史情趣和现代心理融合起来，预言了德国纳粹政权垮台的必然性；作品的语言幽默、生动、精练、规范。

福伊希特万格的长篇小说《候车室》三部曲，特别是它的第一部《成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故事发生在1921—1924年的巴伐利亚。书中主人公马丁·克吕格尔是一个艺术史家、慕尼黑市国家美术馆馆长。他因信仰和艺术观，得罪了巴伐利亚统治集团。代表金融、工业寡头利益的官方终于成功地制造了一起假案，将克吕格尔逮捕入狱。他的女友约翰娜·克莱因四处奔走营救，得到了进步作家蒂弗林、共产党人工程师普勒克尔等的支持和声援。围绕这一事件，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各种人物——部长、法院院长、检察官、工业家、艺术家、作家、工人、冒险家、罪犯、等等，一一呈现出来，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这中间，特别描述了大资产阶级如何变换国家的形式，如何利用通货膨胀和战后经济衰退造成的民众不满情绪，纵容法西斯分子库茨纳为首的“真正德意志人”大搞恐怖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希特勒一伙崛起的缩影。这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德国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演变为法西斯极权主义国家的初期阶段的情况。

《候车室》第二部《奥培曼一家》，写法西斯上台前后的几周内柏林一个犹太家庭所遭到的命运。犹太作家古斯塔夫·奥培曼五十寿辰之际，他的家族团聚庆贺。这个家庭成员中有作家、有工业家、有商人、有教师，他们为国内日益加剧的法西斯化而担忧，希望这只是暂时现象。但法西斯上台后，他们中有人被关进集中营，有人被迫自杀，有人流亡国外。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惨命运，既揭露了法西斯专政的残暴，也适当地批判了那种所谓不问政治的人的后果。第三部《流亡》写一个流亡到巴黎的德国作曲家塞普·特劳特魏恩的经历。他为了拯救当报纸编辑的朋友，同法西斯展开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最后，他成功地创作了《候车室交响曲》，坚信“长久等待的列车终久会到达的”。

阿诺尔德·茨威格（1887—1968），生于西里西亚的格罗斯——格洛高城一个犹太制鞍匠家庭。1907年起先后在布雷斯劳、慕尼黑、柏林、格廷根等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艺术史和国民经济等。1915至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亲身体验到帝国主义战争的虚伪性和残酷性，后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表达了他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他于1923年迁居柏林，任《犹太评论》报编辑。1926年加入国际笔会俱乐部，1929年当选为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主席。

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阿·茨威格被迫流亡捷克、瑞士和法国，最后在巴勒斯坦居留十四年，创作了不少作品。在流亡期间，他始终和德国反法西斯战士保持密切联系，并为国外出版的《言论》、《国际文学》（德文版）和《德意志人民报》等撰稿。1942—1943年参与主编《东方》杂志。1948年回到柏林，继续从事创作。1950—1953年任德国艺术科学院主席，并任国际笔会民主德国中心主席。

茨威格在大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早期比较著名的有中篇小说《克洛普夫家记事》（1911）、中篇小说集《克莱迪娅的故事》（1912），都是描写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剧本《匈牙利的杀人祭神》（1914）是一出写排犹问题的五幕悲剧，1915获克莱斯特奖。以后发表的作品如剧本《关于格里沙中士的戏》（1921）、中篇小说《庞特和安娜》（1928），散文集《莱辛、克莱斯特、毕希纳》（1925）、《对德国犹太人的清算》（1933）等，继续探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的特性和民族问题。

茨威格创作中突出的成就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白种人大战》，它反映了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程，按照内容先后次序如下：第一部《时机成熟》（1957），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第二部《1914年青年妇女》（1931），写一个资产阶级女青年为了追求幸福而与家庭、传统作斗争，后来成了战争的反对者。第三部《凡尔登的教训》（1935），以德国军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的凡尔登战役为背景，通过德军内部的一起贪污与谋杀案，写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见闻和痛苦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战争性质的怀疑。第四部《格里沙中士案件》（1927），描写被德军关押的俄国战俘格里沙越狱逃跑，中途被抓回枪杀，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和根源，在这组小说中这是最著名的一部。第五部《停火》（1954），写德国统治集团反对苏联和平倡议。第六部《国王登位》（1937），写德国失败前夕统治集团中为争夺立陶宛王位而进行的斗争。贯串这一组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贝尔廷。他在战争中思想上的转变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发展——对和平的渴望与对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全书心理刻画细腻，环境描写真实，语言明快，富有感染力。

茨威格在流亡期间还完成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万兹贝克的斧头》（1943）。这部作品描写纳粹统治时期，汉堡一个善良的屠夫变成屠杀反法西斯战士的刽子手的故事，后来这个屠夫受到良心的谴责，同妻子一起自杀。

茨威格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梦是珍贵的》发表于1962年，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著名神经科医生卡特豪斯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起初对希特勒的本质认识不清，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他不得不流亡；以后他志愿去英

军的野战医院工作，又竭尽全力帮助希腊人克法里德斯中士，为这名希腊人的无辜冤屈平反。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曲折经历，表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幻想是个珍贵的梦，虽历尽艰辛，还是不断追求。这也是作者本人的追求目标。

阿·茨威格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众多的作品，体裁十分广泛，除小说、戏剧外，还有诗歌、文学评论和政治论文。他早期的作品具有印象主义色彩，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成分增强。他擅长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复杂的性格和内心活动。他对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揭露是冷静而严酷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描述则带着轻微的冷嘲和同情。

弗·沃尔夫和安·西格斯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1888—1953），出生于莱茵河畔诺伊维特—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入伍服役一年，当过轮船司炉。后来在慕尼黑学习造型艺术，不久去柏林和波恩学医。191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3年在轮船上当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前线任军医，目睹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思想认识逐步提高。1918年他参加了德国十一月革命，被选为德累斯顿工人士兵委员会成员。1920年在鲁尔区参加工人反对“卡普暴乱”的斗争。1922年在符腾堡地区当医生。192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3—1945年流亡瑞士、法国、苏联，其间曾去美国和北欧作演讲旅行。1945年作为苏军医生回到德国。1949—1951年任民主德国首任驻波兰大使。

弗·沃尔夫曾参加表现主义文学运动，早年的剧本如《穆罕默德》（1917）、《这就是你》（1919）、《黑色的太阳》（1921）等，都具有表现主义特色。后来他逐渐离开表现主义，密切结合现实革命斗争，创作了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剧《贫穷的康拉德》（1923）、社会剧《氰化钾》（1929）和反映奥地利水兵起义的《卡塔罗的水兵》（1930）。《泰扬觉醒了》（1931）则是描写中国青年工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剧本。他在流亡期间，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剧本，著名的有《马门教授》（1934）、《特洛伊木马计》（1937）和《博马舍》（1941）等。战后他的主要剧作有《女村长安娜》（1950）和《托马斯·闵采尔》（1953），前者反映民主德国的现实生活，后者写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的英雄事迹。

弗·沃尔夫一生写了二十五部剧本。除剧本创作外，他还写了不少小说、诗歌、论文、随笔、童话，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两人在边境》（1938）、《儿子们归来》（1944）和《飞碟》（1951）。

剧本《马门教授》是弗·沃尔夫的代表作，写于1933年，1934年首演，1935年正式出版，加了个副标题；《西方民主的悲剧》；1938年被拍成电影，在反希特勒法西斯斗争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门教授》体现了作者的戏剧创作风格，他一贯主张“艺术就是武器”。这个剧本以犹太人受迫害为主题，揭露了法西斯掌权初期的种种罪行。主人公马门教授是一位犹太医生。他一手创办了一家外科医院，勤恳工作，医术高明，为人正直，不问政治。他深信科学和政治无关。国会纵火案前后，德国法西斯势力煽动并蛊惑群众反对共产党、迫害犹太人，他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病人也卷入这场斗争。这与马门教授“纯科学、超政治”观点发生了矛盾。尤其是在家里，他儿子罗尔夫是共产党员，正积极参加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反对纳粹党的反动行径。于是父子俩发生尖锐冲突，最后父子决裂，

罗尔夫出走。马门教授尽管想避开政治，但由于他是犹太人，受侮辱、受迫害的事件不断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头上，他最终还是成了纳粹种族理论的牺牲品，在激愤和痛苦中举枪自杀。死前他认识到罗尔夫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向儿子致以最后的问候。

这个剧本共四幕，作者针对当时不少人对纳粹政权的认识尚非常模糊的时候，写出这样一部时代性很强的戏剧，一幕幕揭露和剖析，确实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剧本语言尖锐、生动，各种人物的个性十分鲜明。

弗·沃尔夫的长篇小说《两人在边境》，发表于1938年，也是一部反法西斯的作品。描写共产党人汉斯受德国共产党派遣，来到德捷边境捷克苏台德农村，负责与国内外反法西斯战士的联络工作。汉斯在越过边境时不幸受伤，他住在老农妇玛丽家中，受到她女儿、纺织厂女工露妮的照料。后来两人渐渐产生感情，由相爱而结婚。汉斯与工厂木工尼尔接上了关系，把反法西斯传单秘密运回德国，又把德国工人援助西班牙人民的捐款转送到马德里。不久纺织厂也发现传单，厂方十分恐慌，有意制造了一些事故，甚至把尼尔投入监狱。工人非常愤怒，举行全厂大罢工。汉斯因不能暴露身份，拒绝站岗，默默承受着工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指责。他妻子露妮理解丈夫，鼓励他不要因为被工人误解而泄气。在为受害的罢工领导人弗兰茨举行葬礼时，工人们团结战斗，拉响了各家工厂、轮船和火车的汽笛，获得成功，使敌人十分惊恐。这时，汉斯必须回德国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而妻子快要临产。汉斯和露妮为了反法西斯事业，两人在边境镇静和理智地告别。这部小说歌颂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及其妻子在边境开展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的光辉事业，在三十年代具有典型意义。

安娜·西格斯（1900—1983），原名内蒂·赖林，出生于美因兹市一古玩商和艺术鉴赏家家庭。中学毕业后入科隆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艺术史和汉学，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去一些国家考察社会问题，加深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192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同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圣巴巴拉的渔民起义》，获得好评。193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去美国大使馆的路上》，展示了1927年国际无产阶级抗议美国司法机构非法判处美国工人死刑的斗争。长篇小说《战友们》（1932）描写1919—1929年间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意大利和中国革命者的斗争事迹。

1933年希特勒上台，她流亡国外，先在布拉格、巴黎从事反法西斯工作，1940年流亡墨西哥，参与编辑《自由德国》杂志，并任“海涅俱乐部”主任，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她还出席过第一、二、三次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在流亡期间，她完成的长篇小说《人头悬赏》（1933）、《二月之路》（1935）、《拯救》（1937）、《过境》（1944）和中篇小说《已故少女们的郊游》（1946）都较有名。长篇杰作《第七个十字架》（1942）使她获得国际声誉。1947年，她回到柏林，参与创建德国艺术学院，并长期担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1978年起改任名誉主席）。这个时期发表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死者青春长在》（1949）、《抉择》（1959）、《信任》（1968），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步》（1952）、《蜂房》（1953）、《加勒比海故事集》（1962）、《弱者的力量》（1965）、《渡航》（1971）和《石器时代——奇遇》（1977）等。西格斯关心中国的革命斗争，并写过一些这方面的小说和随笔，如《战友们》（1932）、《计秒表》、《驾驶执照》等。

1951年曾来中国访问，回去后发表游记《在新中国》。

《第七个十字架》是西格斯的长篇名著，小说描写了1937年10月的一天，有七个被囚在威斯特霍芬集中营里的人逃了出来，集中营司令官下令把营房前七棵法国梧桐修剪成七个十字架，并发誓七天之内一定要抓回全部逃犯，处死在这七个十字架上。法西斯分子动用了警察、军队、报纸、电台等一切手段，在全国布下天罗地网，试图抓回这七个逃犯。不到一小时，第一个逃亡者鲍特勒被抓了回来。六小时后，第二个逃亡者佩尔兹也被抓住。第三个逃亡者是杂技演员贝罗尼，他得到同事母亲的掩护，躲过了第一天，可是第二天住房被包围，他在穿越屋顶时不幸中弹，后来死于医院中。第四个逃亡者、老共产党员瓦劳曾参加过多次战斗，但被人出卖，在第二天晚上被逮回集中营。经过严刑拷打，英勇不屈而死。法西斯分子在两天内逮住了四个逃犯，决定悬赏缉拿另外三名。第五个逃亡者费尔格拉贝在警察特务森严密布的罗网下，第四天上午去自首了。第六个逃亡者阿丁格尔是一个农民，他因为家庭宿怨被邻村村长告发而被关进集中营，这次逃亡出来后，因疲劳紧张过度，死于回家途中。只有第七个逃亡者，青年工人、共产党员海斯勒永远没有被抓回。他在集中营里时曾受到瓦劳的教育和帮助。他生性倔强、勇敢，从集中营逃出来后，骗过摩托巡逻兵的盘查，来到城市混进教堂宿了一夜；又在女裁缝那里换了衣服。他依靠同志、朋友和工人们的掩护和帮助，历经艰险，最后得到一位荷兰船长的侄子的身份证、护照和过境许可证，于第八天早晨成功地逃出了德国。追捕期限已过，集中营里第七个十字架始终空着。新来的集中营头目只得下令砍掉这七个十字架。海斯勒逃亡的成功，预示着反法西斯斗争的必然胜利。

这个作品除了深刻的思想意义外，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平行并列的手法。西格斯分别描述了七个逃亡者的行动。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也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在逃亡过程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同人物，后来也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的被抓回。作者通过塑造这些人物形象，集中说明了一点：逃亡者的行动不是一件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这七个逃亡者中，作者着意刻划了瓦劳和海斯勒两个人物。在政治品质和个人性格方面，瓦劳是最优秀的，但在斗争中倒下去了，可是他在精神上却为活着的人们（包括海斯勒）树起了一面永恒的胜利旗帜。

“内心流亡”作家

1933年希特勒纳粹党攫取政权后，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纷纷流亡国外，但也有少数留在国内。他们没有同法西斯政权站在一起，而相反的持一种反对立场，他们也属于反法西斯文学流派，后来文学史上称之为“内心流亡”作家。这方面的代表有胡赫、卡罗萨、维歇特、贝根格律恩，以及后来的贝恩等。

里卡达·胡赫（1864—1947）是一位女作家，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小鲁道夫·乌尔斯劳的回忆》（1893），以感伤的笔调描写汉萨同盟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长篇小说《胜利巷纪事》（1902），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描写了里雅斯特旧城的劳动者苦难的生活。另一长篇小说《生活是一个短暂的梦》（1903），1913年再版时更名为《米歇尔·温格尔》，探讨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人们共同生活的道德准则的对立，也

就是个人和社会的矛盾问题。1912—1914年完成三卷本历史小说《在德国的大战》，叙述十七世纪上半叶在德国领土上进行的欧洲大战——三十年战争。她在1920年发表的诗集《旧诗与新诗》，则具有新浪漫主义色彩。1933年后她留在德国国内，被迫退出艺术科学院。为此，她发表义正词严的声明，表明了非凡的勇气，她说：“当今政府作为民族意愿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德国方式’。我认为，规定条条框框，强制的手段，残酷的方法，诽谤意见不同的人，傲慢的自我吹嘘，凡此种种，都是违反德国精神的，也是极端有害的”。此后，她基本上停止了创作。但是，她十分关心反法西斯的地下工作者的英勇斗争，在1944—1945年，她写下了《致我们的受难者》和《致无名死者》等诗篇，歌颂那些在德国的黑暗年代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人民的荣誉和声名的人们的功绩。当然，这些诗歌只能在纳粹德国灭亡后发表。

汉斯·卡罗萨（1878—1956），德国诗人，小说家。在大学时攻读医学，毕业后在巴伐利亚各地行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营部军医，1929年成为专业作家。早期因诗作闻名，出版《逃避》（1916）、《复活节》（1920）等诗集。后来写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童年》（1922）和《一个青年的演变》（1928）。1933年时，他拒绝接受纳粹文化机构授予的艺术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但是在1941年还是被任命为纳粹组织的欧洲作家协会主席。他在这个时期，继续创作自传性小说，重要的有《生命成熟的秘密》（1936）、《美妙迷惘之年》（1941）等。他的重要诗篇《古老的泉》，在法西斯独裁年代曾在德国知识分子反对派中流传，表达出一种同情、善意、亲近、友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创作思想上认为，人文主义的理想具有永恒性，整个世界是仁慈上帝井然有序和完美的创造物。因此，他的创作往往不敢正视社会现实。1951年，他发表回忆录《不同的世界》，为自己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行为作了辩解。

维歇特（1887—1950），德国小说家。在大学时攻读自然科学、地理学和哲学，1911年起任中学教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年后专事文学创作。但由于他曾著文反对纳粹的权欲狂和反犹太主义，1935年对慕尼黑的大学生发表演讲，因此，在1939年被关入集中营，释放后被禁止写作。二次大战后对德国社会感到失望，于1948年迁居瑞士。他政治上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是“内心流亡”的代表作家。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深感人类的尊严在这世界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认为只有脱离世界的纷乱，才有可能获得内心宁静和维护人的尊严，因而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为渔夫、牧人或猎手，在大自然中享受着自由。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死狼》（1924）、《于尔根·多斯科西尔的女仆》（1932）、《少校太太》（1934）、《简朴的生活》（1939）和《死人之林》（1945）等。二战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耶罗明的孩子们》（1945—1947）是他的代表作，描写二十世纪初至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人民所走过的危险道路。

贝根格律恩（1892—1964），德国小说家、诗人。父亲是瑞典籍医生。1911年在马堡大学攻读神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征入伍。战后任新闻记者，1925年主编《波罗的海报》，1927年成为专业作家。1937年被开除出纳粹操纵的德国作家协会。1942年移居瑞士，1948年迁居罗马。1958年回到德国，获慕尼黑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还获得多项文学奖。他毕生追求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并以此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所写的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影射德国法西斯专

政,《大暴君和审判》(1935)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某小城为背景,探讨暴力和法律的关系;《天上人间》(1940)写十六世纪时的一次“洪水”恐慌,主要是宣传基督精神,同情弱小部落。这两部作品在当时均引起反法西斯的政治共鸣,遭到查禁。以后他发表的重要作品有诗集《愤怒的日子》(1945)、《完好的世界》(1950),长篇小说三部曲《最后一个骑兵上尉》(1952)、《骑兵上尉夫人》(1954)和《第三个花圈》(1962),自传《书桌回忆录》(1961)等。

“内心流亡”这一名称一般认为是作家弗兰克·蒂斯(1890—1977)在1933年创造出来的(其他德国作家也使用过这个说法)。1945年下半年,德国文坛因吁请托马斯·曼等流亡作家返回祖国,曾引发一场大争论,蒂斯发表《内心流亡者》一文,于是这一名称被参加争论的人沿袭应用,直至今日它已在文学史上确定下来。

第四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

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自1945至1949年,德国分为东占区(即苏占区)和西战区(即美、英、法占区)。东、西占区执行着不同的政策。1946年4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为苏军支持的领导党(后为执政党)。1949年5月30日苏占区召开了第三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建立。在这过程中,纳粹德国时期一部分流亡在国外的反法西斯作家陆续回到苏占区。先后回来的作家有贝歇尔、布莱德尔、安娜·西格斯、魏纳特、弗·沃尔夫、阿·茨威格、布莱希特、雷恩、马尔希维察等。也有些作家回到西占区,或者留在美国、瑞士等国。

贝歇尔等一批著名作家回国后,积极参加民主改革工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争取德国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的统一而斗争。1945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以贝歇尔为主席的“德国民主改革文化联盟”,并出版《建设》杂志;执行以“人民阵线”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政策。这些反法西斯作家一方面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或文化领导工作,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贝歇尔的诗集《还乡集》(1946)和《德国十四行诗》(1952),布莱德尔的长篇小说《儿子们》(1949)、《孙子们》(1953)和《新的一章

》(1959—1964),西格斯的长篇小说《死者青春长在》(1949)和《抉择》(1959),魏纳特的前线日记《斯大林格勒回忆录》(1951),弗·沃尔夫的喜剧《女村长安娜》(1950),阿·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停火》(1954)、《时机成熟》(1957)和《梦是珍贵的》(1962),布莱希特的剧本《公社的日子》(1948—1949)、诗歌和戏剧论著,雷恩的长篇小说《特里尼》(1954),马尔希维察的长篇小说《库米阿克一家的归来》(1952)和《生铁》(1955)等等。纳粹政权统治时期隐居在国内的老作家法拉达发表长篇小说《各人单独死去》(1947),凯勒曼发表长篇小说《死之舞》(1948)。这些文学创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继续揭露和批判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描写反法西斯斗争;一类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及新时期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为战后初期

荒芜的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与这批老作家争相斗妍的是当时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也都经历了战争的磨难和生活的考验，在参加民主德国恢复与建设工作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阿皮茨（1900—1979）原是出版社编辑，1958年发表长篇小说《赤手斗群狼》，根据在纳粹集中营的亲身经历，描写了集中营里各国反法西斯战士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英雄事迹，扣人心弦，获得很大成功，被译成二十九种文字。博多·乌泽（1904—1963）的长篇小说《爱国者》（1954），描述广大爱国者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小说家克劳迪乌斯（1911—1976）在1951年发表长篇小说《站在我们一边的人》描写生产战线上新与旧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诗人毛雷尔（1907—1971）的诗集《四十二首十四行诗》（1953）和《要素》（1955）等，以抒情方式表现了时代的特点。小说家兼剧作家施特里马特（1912—）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丁柯》（1954）和喜剧《猫儿沟》（1953）等都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矛盾和斗争，风格纯朴，语言生动，富有乡土气息和幽默感。斯特凡·海姆（1913—）早年参加工人运动，二次大战中参加美军，他发表的长篇小说《十字军》（1948）、《理性的眼睛》（1951）等，根据亲身经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西斯的崩溃及战后占领区的状况。诗人库巴（1914—1967）的长诗《人之歌》（1948），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描绘人类历史的发展，语言形象，韵律自由。赫尔姆林（1915—）的叙事长诗《曼斯费尔德颂歌》（1950），描写曼斯费尔德铜矿工人从十三世纪到建立民主德国的漫长斗争史；短篇小说集《前列》（1951）生动地描写1933至1945年间德国反法西斯抵抗战士的形象。诗人兼小说家博布罗夫斯基（1917—1965）以他的诗集《萨马喜阿时期》（1961）、《冥府河流》（1962）和长篇小说《莱文的磨坊》（1964），享誉德语文坛，后者通过犹太人莱文磨坊被上游的德意志人放水冲垮一事，反映了十九世纪德国的民族矛盾。作家菲曼（1922—1984）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后来转向创作中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他的重要作品是诗集《斯大林格勒之行》（1953）和中篇小说《战友们》（1955）。前者描写主人公以士兵、战俘和朋友身份三次去斯大林格勒的感受，反映一个德国青年的思想转变过程，后者揭露法西斯对青年一代的毒害，情节曲折紧张。少数民族索布族作家布瑞昌（1916—）也在此时发表了诗集《进入新时代》（1950）和长篇小说《五十二周是一年》（1953）等作品，歌颂新时代、新生活。

五十年代中期，民主德国文学中出现“形式主义”倾向。随着关于文学艺术的风格和文艺思想问题的争论的展开，特别是1957至1958年对卢卡契（1885—1971）、汉斯·马耶尔（1907—）文艺思想的批判，民主德国的文学队伍逐渐失去战后初期那种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1956年以来开展的对于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的批判，冲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促使作家、艺术家思想活跃，提高了在选择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新探索的热情。作家在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性、同人民休戚与共的原则下，开阔了艺术活动的视野，活跃了创作氛围。

1959年，民主德国领导提出新的文化政策，名为“比特菲尔德道路”，其目的是促使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群众，写作现代题材的作品；工农群众要提高文化水平，自己动手写作。1959年4月和1964年4月，在哈勒附近的工矿城市比特菲尔德召开了两次作家会议，会上提出“工人们，拿起笔杆

来！”的号召，以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鼓励工人积极参与文学活动；而作家艺术家要深入工农劳动场所，同劳动人民实际生活密切联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真实形象，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这两次会议后，民主德国文学取得了新的成果，出现了一批描写社会现实、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新作。在长篇小说方面有女小说家布里吉特·赖曼（1933—1973）的《生活的归宿》（1961）、克里丝塔·沃尔夫（1929—）的《分裂的天空》（1963），雅各布斯《1929—》的《夏天的故事》（1961），舒尔茨（1921—）的《我们不是风中灰尘》（1962），施特里马特的《蜜蜂脑袋奥勒》（1963），诺伊奇（1931—）的《石头的痕迹》（1964），迪特·诺尔（1927—）的《维尔纳·霍尔特历险记》（1960—1963），康特（1926—）的《大礼堂》（1964），尤雷克·贝克尔的《说谎者雅各布》（1965）等。在诗歌方面，有赫尔姆林、瓦尔特·维尔特（1922—）、格拉赫（1926—）、库纳尔特（1929—）、萨拉·基尔施（1935—）、比尔曼（1936—）、布劳恩（1939—）等的诗作。在戏剧方面，有彼得·哈克斯（1928—）的《忧虑和权力》（1960），海纳·米勒（1929—）的《女移民》（1961，后改名为《农民》1964）和《建造》（1963—1964），布劳恩的《翻斗车工人》（1967，1972）等，这些作品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物的身上发掘题材，力图展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思想风貌和新的追求，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活，塑造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但是有些作品因为描写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揭露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阴暗面，特别是批判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压制民主、独断专行、不负责任、瞎指挥等），曾在文坛上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有的还受到严厉的批评，有的甚至当时未让出版或公演。如哈克斯的剧本《忧虑和权力》，围绕一个煤砖厂发生的故事，探讨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和党的领导作用问题，1962年公演后曾引起热烈争论，后来被停止上演。又如布劳恩的剧本《翻斗车工人》1967年完成后，因主要反映落后的生产方式对工人身心发展的影响，生产队长为改变这种现状所作的改革试验最后也归于失败，揭露和批判了领导的官僚主义，经三次修改，1972年才获准公演。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德国的政治、社会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在文学领域有所反映，不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有不少新的变化和发展。有不少作家尝试从友谊、爱情、婚姻的角度表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以及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变化，唤起人们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思考，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探讨。君特·德·布隆（1926—）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布里丹的驴子》（1968）和《授奖》（1972），都从婚姻、爱情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风貌。特别是前者描写一个图书馆长虽已逾中年，有了子女，却钟情于一个年轻的女同事，以致家庭破袭，最终完全失败，反映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地位的变化。克·沃尔夫的长篇小说《追忆克里丝塔·T》（1969）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个性发展问题。普伦茨多夫（1934—）的长篇小说《青年维某的新烦恼》（1972，1973改编成剧本），仿照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它通过描述一青年工人的苦恼——无望的爱情、受到损害的自尊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发表后引起东、西德的广泛重视，剧本也在两个德国演出，获得很大

成功。布劳恩的中篇小说《没有说完的故事》（1975）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因社会政治原因，几经波折，历尽坎坷的故事。赖曼的未完成长篇小说《弗兰齐斯卡·林克汉特》（1974），描述一个女建筑师敢于向周围群众的落后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作斗争的故事。在创作手法上，一部分作家仍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一部分作家采用了多层次结构、时空颠倒、深层次心理分析和描写、蒙太奇、内心独白等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刻画复杂的、不寻常的人，表现他们的各种侧面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诗人库纳尔特、比尔曼、布劳恩、孔策（1933—）、萨拉·基尔施等在此期间为了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弊端更加引起注意，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幽默诙谐，切中时弊。

七十年代的“纪实文学”浪潮，也影响到民主德国的文学创作。作家为追求事件的客观真实性，利用现代技术提供的录音器材，把采访来的材料加工整理成文学性的人物传记或小说，较著名的有女作家萨拉·基尔施的《驯豹女郎》（1973），雅各布斯的《采访者》（1973），女作家马克茜·万德尔的《你早，美女》等。这类作品虽然强调客观真实性，但又不完全放弃文学的虚构，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在发掘和借鉴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方面，七十年代也迈出了新的步子，如安娜·西格斯的《奇遇》（1972），描写果戈理、霍夫曼和卡夫卡三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布拉格相逢的故事。克·沃尔夫的《一只公猫的新生活观》（1974），则直接脱胎于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生活观》（1820—1822），不过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些小说都具有浓厚的传奇和幻想色彩，表现了作者的大胆试验和探索兴趣。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民主德国文学不再坚持一定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强调允许不同的艺术风格竞相发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流派在题材和风格上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自述或以第三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多议论，少描写，不时还加以旁敲侧击的嘲讽或满怀感情的赞颂。这种创作方法有利于直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人物的矛盾、痛苦、自责或喜悦。写作的重点转向日常生活，描写的多是平凡的人物，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体裁上也出现较多的由长篇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故事。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小说家是施特里马特、克·沃尔夫、康特、舒尔茨、伊·莫尔格纳（1933 - 1990）等；赫尔姆林于1979年发表的自传性散文《晚霞》是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也具有这方面特点。戏剧方面成就最大的作家是海纳·米勒、哈克斯和布劳恩，特别是前者在七十年代采用“组合式”方法创作戏剧，同一主题的事件，以多种形式一起展现在舞台上，使观众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其重要代表作是《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1956—1977）。

在文艺理论方面，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在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六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姚斯和伊塞尔提出“接受美学”问题后，民主德国科学院文学史研究所所长、文学理论家瑙曼（1925—）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接受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接受美学”的体系。他的代表作是《文学与读者》（1972）、《社会——文学——阅读：从理论观点看文学接受》（1975，与人合作），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1976年11月，诗人、歌手比尔曼（1936—）应邀去联邦德国旅行演出。就在演出期间，民主德国当局突然宣布取消他的国籍。当局的这一行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1976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把在一封致党的领

导的信里抗议这一事件的三名党员作家：萨拉·基尔施、尤雷克·贝克尔和格哈德·沃尔夫开除出党。1979年6月，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又把施特凡·海姆、罗尔夫·施奈德尔（1932—）、雅各布斯等九名作家开除出作家协会。这几起事件，使民主德国的文学队伍更加分裂，不少作家利用各种机会逃离到西德。1978年担任作协主席的康特不得不于1984年辞职。

1989年，欧洲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关于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边界的决定，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统一。在统一前的四个月，即6月份，克·沃尔夫发表了一篇作品《遗留的记忆》。原作写于1979年，叙述一个女作家受到监视的故事。联邦德国一些批评家和作家利用这件事攻击克·沃尔夫，从而攻击民主德国全体作家，达到否定民主德国文学的目的。也有不少批评家和作家为沃尔夫辩护，肯定沃尔夫的创作和民主德国文学的成就。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对提出的问题还没有结论，这表明统一后的德国要在文化领域内实行认同，将是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布莱希特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戏剧理论家、导演。他出生于巴伐利亚奥格斯堡一个工厂主家庭，1917年中学毕业后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后改学医学，1918年在战地医院护理伤员。他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获得士兵的信赖，十一月革命时被选为奥格斯堡士兵委员会成员。一次大战后继续在大学学习。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开始创作诗歌，这时对戏剧发生兴趣，写出了最早的剧本《巴尔》（1922）和《黑夜鼓声》（1922），后者获克莱斯特奖。接着被聘为慕尼黑小剧院戏剧顾问兼导演。1924年应著名导演莱因哈特（1873—1943）之邀去柏林任德意志剧院戏剧顾问。1926年入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结合创作实践系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家庭格言》。他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没有参加共产党。

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布莱希特被迫流亡国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先在丹麦住了六年，其间曾去苏联与福伊希特万格、布莱德尔共同出版文学杂志《言论》。1939—1940年住在瑞典和芬兰，1941年去美国。1947年底回到欧洲，次年定居东柏林，和妻子海伦娜·魏格尔一起创建和领导“柏林剧团”，亲任导演，实践自己的戏剧理论，直至逝世。

布莱希特的初期创作以诗歌为主，先后共写有一千五百首诗歌，《家庭格言》外的重要诗集有《歌与诗》（1934）、《斯文德堡诗集》（1939）、《流亡诗集》（1943），以及1951年出版的诗选《诗百首》。他的诗歌大多采用可以咏唱的歌词和歌谣体，其优秀作品都有诉诸理性、启迪思考的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还创作了小说多部，著名的有《三角钱小说》（1934）、《主人尤利乌斯·凯撒的业绩》（1938—1939）、短篇小说集《日历故事》（1949）。

布莱希特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他一生写了近五十部多幕剧和短剧。流亡前的重要剧作有《人就是人》（1927）、《三角钱歌剧》（1928）、《例外与常规》（1930）、《措施》（1931）、《母亲》（1932）等。这些戏剧富有辩证法，有明显的教育意义，称之为“教育剧”。流亡期间，他的思想和艺术更加成熟，进入“叙事剧”创作阶段，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剧本，如《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193—1938）、《卡拉尔大娘的枪》（1937）、《伽

利略传》(1938, 1945—1947)、《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四川好人》(1939—1941)、《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1940)、《阿尔图罗·魏的有限发迹》(1941)、《高加索灰阑记》(1944—1945)等。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要剧作有《公社的日子》(1948—1949)、《杜兰朵》(1954)。他的戏剧如按题材和形式区分,主要有大众戏剧、寓意剧和历史剧三种类型,此外,尚有一小部分传统戏剧。

布莱希特在戏剧上的重要贡献是创立了“叙事剧”理论。他的戏剧美学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叙事剧”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戏剧必须起教育作用,不仅解释世界,更应起改造世界的作用。其艺术方法的核心是“间离效果”(一译“陌生化效果”)。这种新的演剧理论和方法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暴露事物的矛盾性质,使人们认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它偏重于诉诸观众的理性,让他们在观看与思考中判断剧情的是非曲直,得出自己的结论。与之相适应的是戏剧情节故意夸大,矛盾冲突复杂,舞台设计和道具别开生面,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剧中加入叙事人、定场诗、舞蹈、歌唱等。布莱希特要求导演让演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同样,布莱希特也给观众在思考上及美学欣赏上以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并通过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使作品达到更高的美感教育作用。这是一种同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体系“以情动人”对立的戏剧理论。早在三十年代,布莱希特就对中国京剧产生浓厚兴趣,1935年在莫斯科观看过梅兰芳(1894—1961)的演出,并发表专门论文。他的戏剧中吸收了中国京剧的一些表演艺术特征。他的重要理论著作有《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间离方法》(1936)、《论实验戏剧》(1939)、《表演艺术新技巧》(1940)、《戏剧小工具篇》(1948)、《戏剧论著》(七卷,1957)等,还有许多对剧本的导演分析。今天,布莱希特已成为现代戏剧的经典作家,在世界各国具有深远的影响。

《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最重要的剧本之一,初稿产生于1938年,1943年首演。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后,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和巨大灾难,作者有感于科学技术与现代战争的关系,进一步改写了这个剧本,明确提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科学研究的目的问题,1947年完成。1954—1956年作者定居柏林期间,又一次修改了这个剧本。

这是一出历史哲理剧,以十七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2)的事迹为题材,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二十世纪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哲理性的主题思想。剧情如下: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了许多天文现象,证实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地球中心说”。这一发现客观上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为了科学研究和较高的收入,他搬到了佛罗伦萨,当了大公爵的宫廷数学家。不过在这里没有人相信他的发现,也不愿看一眼他的望远镜,还是坚持地心说,他只得带了科研成果到罗马,在一次假面舞会上,罗马的大主教凶狠地向他宣告:教会否定了哥白尼的学说,并不准伽利略继续从事研究。他被迫沉默了八年。后来新教皇登基,他鼓起勇气,继续在“禁区”进行研究。经过十年努力,他的学说已广为传播。宗教裁判所害怕伽利略的学说会动摇教会的统治,于1633年在罗马对他进行审讯,肆意迫害。伽利略在威胁和压力下公开宣布收回自己的学说。但仍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软禁在一所农舍里,只有他的女儿陪伴着他。一天,他的

学生安德利阿来看望他，才知道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说，而是在偷偷写下科学著作《对话录》。这一著作后来由这个学生带出意大利国境，传播到全世界。伽利略始终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破晓。

这部叙事剧从多侧面塑造了伽利略的形象。他有伟大的一面，又有软弱的一面，更有普通人的欲念和缺点。通过他的一生几个重要片断，表现了新旧社会交替时刻，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变革与反动之间存在着的生死搏斗，启迪人们去思考许多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历史上的真正的伽利略案，在沉冤达三百六十年后终于得到平反。1992年10月31日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式发布平反公告，为伽利略恢复名誉。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布莱希特于1939年完成的剧本，1941年首演。这是他的叙事剧理论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在戏剧舞台上享有盛誉，为许多剧院的保留剧目。

这是一部根据十七世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森的小说《女骗子和流浪者大胆妈妈》编写的历史剧，以德国三十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个绰号大胆妈妈的随军商贩的故事。大胆妈妈名叫安娜·菲尔琳，她带着二个儿子和一个哑巴女儿靠随军叫卖日用杂货，妄想发战争财。结果一子一女死于战祸，另一个儿子带上手铐成了罪犯。战争带给她的只是灾难，但她执迷不悟，依然拉着大篷车，孤单一人在战争中继续她的营生。

这个剧本通过开场和终场的鲜明对比，告诉观众：小人物想靠战争发财是不会成功的，战争只会给他们带来灾难而不是财富。意在提醒德国人民要起来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同时也向对希特勒抱幻想的西方国家敲响警钟，要求人们认清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全剧至终大胆妈妈没有觉醒，但观众却更加觉醒，受到教育。

布莱希特的剧本《四川好人》创作于1939—1941年流亡瑞典和芬兰时期，1943年首演。这是一出著名的寓意剧，描写四川好人欲行善而不得的故事。剧本开始，天上三位神仙下凡寻找好人，发现中国四川的贫苦而心地善良的妓女沈黛，就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开一家小烟店维持生活，不必再去卖身。但沈黛开了烟店后，许多乞丐和亲戚向她借钱，并在她那儿吃喝。她的小店几乎倒闭。这时，沈黛还救了一个叫宋的失业飞行员，并且与他相爱。但宋也对她诈骗。沈黛没有办法，便化装成一个男人，自称是表兄瑞达。“他”整顿烟店，并用简陋的工棚办起了烟厂，强迫大家（包括宋）在厂里劳动。瑞达冷酷无情，剥削工人，因此，许多人想念慈善的沈黛。有人怀疑沈黛被瑞达谋害了。瑞达最后被捕，三个神仙施计成了法官。在法庭上，瑞达脱去面具，恢复沈黛原来面目。沈黛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神仙无法回答，悄悄消失，他们寻找好人的愿望终于破灭。

布莱希特通过沈黛好坏两个人的形象以及后来提出的问题，说明现存世界需要改变，但如何改变，留待观众去深入思考。也就是说，让观众带着问题走出剧场：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好社会，人们既能行善做好事，又不会使自身的存在受到危害？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布莱希特的诗歌创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他的戏剧中也夹有不少诗歌。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风格，高度的概括性，强烈的讽刺性；选材精辟，形象深刻，击中要害，发人深思，很有教育意义。在形式上深受民歌的影响，语言简洁清晰，普通工人、农民都能读懂。在内容上他紧密结合时代和社会的重大事件，提出尖锐、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他写了《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坚固的车》、《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等诗篇，打击法西斯分子，启迪德国人民的觉悟。他还善于对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在这方面写了许多诗歌，下面是 1936 年创作的著名诗篇《一个读书的工人的疑问》：

是谁建造了七座门的忒拜城？
书上写着许多国王的名字。
是国王们背来的那些石块？
是谁多次重建了
反复遭到破坏的巴比伦？
在金碧辉煌的利玛城里
建筑工人住着什么样的房子？
中国长城竣工的那天晚上
民夫们在哪里栖身？
伟大的罗马城
有着数不清的凯旋门。是谁建造了它们？
皇帝们打败了什么人？
倍受颂扬的拜占庭
只为它的居民建造了宫殿？
据说神话里的阿特兰蒂斯
被海水吞没的那天夜里，
溺水的人们呼唤着他们的奴隶。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
靠他自己？
凯撒打败高卢人。
他身旁至少还有一个厨子吧？
西班牙的菲利浦，当他的舰队沉没时，
抱头痛哭。此外再没有人哭过？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打了胜仗。
除了他之外，还有谁打了胜仗？
每一页一个胜利。
是谁烹调了胜利的酒宴？
每十年一个伟人。
是谁偿付了那许多费用？
这么多的记载。
这么多的疑问。

（张黎译）

在这首诗中，布莱希特借读书的工人之口，对历史书上记载的帝王的丰功伟绩提出质疑。“每一页一个胜利”、“每十年一个伟人”。“这么多的记载。这么多的疑问”。但每一个疑问背后，都有丰富的“潜台词”，人们经过思考不难得出“人民创造历史”的答案。布莱希特认为，质疑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所以他的诗歌和他的戏剧一样，并不着力于去感染读者的感情，而是努力启发读者的理性。

贝歇尔和布莱德尔

约翰内斯·贝歇尔（1891—1958），德国诗人、小说家，生于慕尼黑一个高级法官家庭。中学毕业后在柏林、慕尼黑和耶拿大学攻读医学、文学和哲学。从1911年起开始文学创作，次年为表现主义刊物《行动》撰稿。1913年与几个志同道合者编辑《新艺术》杂志，投入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拒绝服兵役，经常变换住地。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第二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这个时期他发表的重要诗集有《崩溃和胜利》（1914）、《致欧洲》（1916）、《友爱》（1916）、《新诗集》（1918）等。这些诗作以幻象、讽喻和宗教象征代替对现实的真实描绘，在形式上一味追求新颖怪诞，具有表现主义的特征。但在部分诗篇中反战主题也是十分突出的。

魏玛共和国时期，贝歇尔领导了二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这时和弗·沃尔夫、托勒尔等一起脱离表现主义。1927年访问苏联，回国后倡办《无产阶级文艺通讯》（192—1929），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工人作家。1928年领导成立“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出版机关刊物《左翼路线》（192—1932），这个时期他出版的重要诗集有《在列宁的灵柩旁》（1924）、《王位上的尸体》（1925）、《宏伟的计划》（1931）等。此外，还有长篇小说《莱维西特，又名唯一正义的战争》（1926），揭露世界帝国主义正在策划新的战争，而如果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那就是“唯一正义的战争”。

1933年希特勒上台，贝歇尔被迫流亡奥地利、瑞士、捷克、法国和苏联，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35—1945年在莫斯科任《国际文学》（德文版）主编。1945年5月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回到德国苏占区，任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主席，并参与创办文学杂志《思想与形式》。1953—1956年任民主德国艺术学院院长，1954年起任文化部长，直至逝世。

贝歇尔的后期创作，从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这时他写了许多古典式格律严谨又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抒情诗。重要诗集有《幸福寻找者和七大牵累》（1938）、《十四行诗集》（1935—1938）、《再生》（1940）、《还乡集》（1946）、《新德国民歌》（1951）和《德国十四行诗》（1952）等。还有自传性长篇小说《告别》（1940）和剧本《冬季战役》（1952），前者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汉斯，告别他的家庭，也告别他的阶级，和无产者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小说反映了1900至1914年间德国社会生活的画面，后者描写德国军队在莫斯科郊外失败的情景。贝歇尔也著有诗论多种，如《保卫诗歌》（1952）、《诗的信仰》（1954）、《诗的力量》（1955）、《诗的原则》（1956）等。

《1937年哀祖国》、《三人谣》、《德国在呼唤》、《德意志，我的忧怨》等都是贝歇尔后期的一些代表性诗作，现把最后一首介绍如下：

祖国，我的忧怨，
朦胧中的故国——
天，蔚蓝的天，
你是我的快乐。
有一天我要这样讲：
当我流亡的时候，
我为了对你颂扬，
曾寄给你一曲轻歌。
我曾向你献诗，

希望你能统一，
并且让我在黑暗里
和你一同哭泣……
天明了，蔚蓝的天，
和平已经恢复——
德意志，我的忧怨，
你也是我的快乐。

(钱春绮译)

这首诗写于 1949 年，德意志祖国刚从战争的重大灾难中站起来，要清算纳粹德国的罪恶，要恢复，要统一。短短十六行诗，诗人多次重复用了“祖国”、“忧怨”、“快乐”等词，充分表达了对德意志的无限深情。诗人为陷入黑暗的祖国而哭泣，在流亡时曾用诗歌寄托思乡之情；现在重返祖国，看到了蔚兰的天，快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诗人热切地盼望和平、统一。在这首短诗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并富有优美的韵律，确是贝歇尔的上乘之作。

维利·布莱德尔（1901—1964）生于汉堡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就去一家造船厂学车工，参加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1918 年加入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年成为德国共产党员。他在 1923 年参加汉堡工人起义，被捕入狱两年，在狱中研究法国革命，写成《马拉，人民之友》（1924）一书。出狱后在一条轮船上当机工助手，到过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等地。1928 年进汉堡“N 和 K 机器厂”当车工，由台尔曼介绍在《汉堡人民报》当工人通讯员，因写了触犯当局的文章，以“文艺叛国罪”被判两年监禁。在狱中写了长篇小说《N 和 K 机器厂》（1931）、《罗森霍夫街》（1931），反映二十年代德国工人的艰苦生活和革命斗争，是德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品。从此，布莱德尔的名字开始在文学界流传。1932 年应邀访问苏联。

纳粹执政后，他于 1933 年 3 月被捕，在菲尔斯比特集中营关了十一个月，释放后逃往布拉格，后根据这段经历写成长篇小说《考验》（1934）。这部作品以两个共产党员为中心人物，真实地描写了他们在法西斯集中营的经历和体力上、精神上所受到的考验。这是第一部揭露集中营残酷暴行的作品，出版后被译成十七种文字，影响很大。1934 年他与贝歇尔到莫斯科，列席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后留居苏联，从事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工作。1936 年，与布莱希特、福伊希特万格一起合编文艺月刊《言论》。1937 年赴西班牙参加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任台尔曼营政委。后来他又回到苏联。这个时期完成的重要作品有：描写纳粹统治初期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你的不相识的兄弟》（1937），描写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中篇小说《埃布罗河上的遭遇》（1938），以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和亲友们的生活作素材的《亲戚和朋友》三部曲第一部《父亲们》（1941）。特别是后者通过汉堡一个工人家庭的命运，艺术地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变化，批判了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并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这部小说的发表使作者获得很大声誉。三部曲第二部《儿子们》和第三部《孙子们》分别于 1949 年、1953 年出版，反映了 1915 至 1948 年的社会历史。

1945 年纳粹投降，布莱德尔随苏军回到德国，参加祖国重建工作。1952—1957 年任《新德意志文学》杂志主编，1954 年任艺术科学院副院长，1962 年为院长。他曾两次获得民主德国国家奖。这个时期他发表的重要作品有：

控诉纳粹罪行的中篇小说《沉默的村庄》（1949），记述劳动人民团结互助在五十天内重建一个被洪水毁坏的村庄的报告文学《五十天》（1950），电影脚本《台尔曼》（1954—1955），以自己在罗斯托克领导民主建设的艰苦历程为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新的一章》（1959—1964）。1955年他曾来中国访问，去过延安，写有《枣园的宴会》（1956），记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故事。1964年10月27日布莱德尔在艺术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

施特里马特和康特

埃尔温·施特里马特（1912—），出生于施普伦贝格一个面包师家庭。他早年当过饭店服务员、饲养员、司机和辅助工人，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入伍，战争快结束时离开军队，漂泊他乡。1945年回到故里，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1947年任当地七个小村的联合村长。后任森夫滕贝格地方报纸的编辑，不久成为专业作家。他一直住在农村，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1959至1961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后任副主席，多次获国家奖金和其他奖金。

施特里马特的作品绝大部分描写农村生活。第一部长篇小说《赶牛车的人》（1950）描写农村无产阶级的生活，展示了德国从威兼时代到法西斯上台这半个世纪的农村阶级关系。短篇小说集《一堵墙倒塌了》（1953）共收八篇短篇小说和速写，作者以简练的文笔，描写了随着农村阶级关系的变革而引起的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猫儿沟》（1954）是他的第一部剧作，是一出四幕诗体喜剧，1953年由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上演，博得好评，获国家奖金。剧本围绕着农村一条新的公路的建设，展开了富农及其追随者与进步力量的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五年后，作者又加写了一场《1958年的猫儿沟》（1958），以表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剧本《荷兰人的未婚妻》（1960年演出，1961年出版），通过一个农村雇工的女儿在战争结束前后三年内爱情上的遭遇，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与阶级问题紧密相连，政治上的选择与私生活的处理常常是不可分割的。剧中虽然描写了对抗性矛盾，但女主人公汉娜与她的同志、朋友之间的矛盾却占了重要地位。这出戏被认为是东德六十年代戏剧发展的序幕。剧本发表后，曾在文艺界引起争论。

施特里马特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丁柯》（1954）是他的早期代表作。小说以1948至1949年土地改革后的下劳西茨农村为背景，通过主人公丁柯的观察，揭示了农村经济关系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小农思想与集体化道路之间的矛盾。丁柯的祖父，翻身农民克拉斯凯摆脱不掉旧生产方式的影响，一心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同丁柯的父亲、热心于农村改革的恩斯特发生了矛盾。老克拉斯凯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不但没有成为土地的主人，反而成了土地的奴隶，终于劳累致死。他的死既象征着旧思想的必然灭亡，也预示着合作化是农民应走的道路。小说结构朴实、语言生动，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1957年被改编成电影。

施特里马特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创奇迹的人》继承了德国“发展小说”的传统。第一卷（1957）叙述贫苦的农村青年施坦尼斯劳斯·比德纳从1909至1943年法西斯灭亡前夕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对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特别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作者把现实主义的描写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描绘了一幅幅生活气息十分浓郁的画面。第二卷

(1973)继续叙述施坦尼斯劳斯的发展道路，在直接描写之中穿插着许多回忆。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后，因对国内生活的描写带有强烈的社会批评性，引起文艺界的争论。

施特里马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蜜蜂脑袋奥勒》(1963)围绕奥勒的遭遇，表现了1951至1959年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复杂的斗争。主人公奥勒是农村中的基层干部，他在带领农民实现合作化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但他百折不挠，终于取得了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小说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批判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曾在文坛上引起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辩论。作者第三次获国家奖金。

施特里马特还写有长篇小说《店铺》(1983)、《绿色的六月》(1985)和短篇小说多种。他是个政治上敏锐、艺术上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在题材和主题方面的成就，常常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争论，成为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力量。他善于塑造农民形象，作品风格朴实、语言简洁通俗，富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和幽默感。

赫尔曼·康特(1926—)，出生于汉堡一园艺工人家庭。早年学过电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被征入伍，1945—1949年在波兰战俘营中度过。1949年回到东德，入格赖夫斯瓦尔德工农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1956年在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任过大学学报编辑、《新德意志文学》编辑，1962年成为专业作家。1969年为德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78年被选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

康特于六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海拾零》(1962)，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显示了作者的幽默风趣风格。196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礼堂》描写了民主德国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成长，也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引起东、西德文坛的广泛注意，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康特后来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报头栏》(一译《版权页》1972)和自传性小说《滞留》(1977)，后者描写一个十八岁的德国士兵于1945年被俘后关押在华沙监狱的经历。其他作品还有中短篇小说集《第三个钉子》(1981)、《青铜器时代》(1986)，文集《支柱》(1981)等。

《大礼堂》是康特的代表作，反映1949至1962年工农学院大学生的生活经历和成长道路。电工出身的主人公罗伯特·伊斯瓦尔在工农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新闻记者。十年后他应邀在停办工农学院的典礼上讲话。在准备这次讲话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许多往事。他回想到当时工农学院学生宿舍里的几位同窗好友。雅各布原是林业工人，基础差，学习很吃力，后来经过自己努力和大家帮助，慢慢跟上来了，现在是农林部的一名处长。克瓦西原是白铁工，富有组织才能，坚信社会主义，对前途很有希望；但正是这位坚信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去了西部，现在在汉堡开一家酒店。伊斯瓦尔对克瓦西的行动很不理解，曾利用机会去汉堡劝他回来，但没有成功。格尔德原是木匠，伊斯瓦尔为了阻止他与自己心爱的姑娘薇拉接近，设法让格尔德与同班女同学罗莎结婚，然后一块儿去中国学习汉语。伊斯瓦尔对这种把社会主义事业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深感内疚。他一边在准备讲话稿，一边必须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这部小说运用多层次结构、内心独白、回忆等手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民主德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同时也用幽默讽刺的笔调对现实社会中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此，小说发表后在东、西德都引起强烈反响。

克·沃尔夫

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出生于兰茨贝格（现属波兰）一商人家庭。1945年随家庭西迁来到梅克伦堡，1949年中学毕业后入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1953年毕业后先在作家协会工作，后在《新德意志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任编辑，并开始撰写文艺批评文章和散文作品。1959—1962年在哈勒工作期间，她常到一家机车车辆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1963年成为专业作家。1964年成为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成员，并获国家奖；1977年被吸收为西德达姆施塔特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成员，1980年获毕希纳文学奖。她曾是民主德国作协理事会和笔会中心主席团成员。

克·沃尔夫从1961年起创作小说，大多以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切的问题为题材。短篇小说《莫斯科的故事》（1961）描写1945年一位苏联军官在德国爱上一位德国姑娘，十五年后两人在莫斯科重逢，又惊又喜，最后正确处理了友谊和爱情。长篇小说《分裂的天空》（1963）是作者的成名作，写一对青年男女由于德国的分裂而造成爱情不幸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当时民主德国曾引起热烈讨论，在联邦德国也受到称赞。长篇小说《追忆克里斯塔·T》（1968），以第一人称形式追忆亡友克里斯塔·T在短暂一生中为争得个性完善所作的努力及遇到的挫折，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个性如何发展的问题，又一次引起文坛关注。自传性长篇小说《童年典范》（1976）描述了纳粹统治时期小人物在精神上被奴役的状态以及1945年解放时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作者的意图是批判法西斯专政，反对战争，全民族应吸取历史教训。中篇小说《茫然无处》（1979）叙述十九世纪初叶两位很有才华的德国作家自杀的故事。另一中篇《卡珊德拉》（1983）以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时期女先知卡珊德拉的故事，借古喻今，要世人关注世界核战争的危险。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后，她立即写了反映这一事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的小说《核干扰事件》（1986）。

这个时期，克·沃尔夫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菩提树下》（1974），电影脚本《梯尔·欧伦施皮格尔》（1972，与丈夫格哈德·沃尔夫合作），评论集《阅读和写作》（1972）、《继续尝试》（1979）等。1986年她还出版了收有至1985年所写的文章，所发表的演说和谈话的两卷文集《作者的尺度》。

1989年11月，分隔东、西德的柏林墙被拆除。1990年6月克·沃尔夫发表一篇作品《遗留的记忆》。原作写于1979年，描述一个女作家受到安全部门监视的故事，这是一篇艺术散文，表现了一个处于孤立无助、无能为力境地中的自我。作品发表后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西德一些批评家和作家想利用这一事件攻击沃尔夫，从而攻击东德全体作家，达到否定民主德国文学的目的。也有不少批评家和作家为沃尔夫辩护，肯定沃尔夫的创作和民主德国文学的成就。这场论战持续了两年多，并没有结论，但真正的意义是很清楚的，正如一本汇集论战文章的书的标题所表明的：《问题不在于克·沃尔夫》。可见克·沃尔夫的作品常常成为德语文坛上的热点。

长篇小说《分裂的天空》是沃尔夫的成名作，在1963年发表后即被译成多种文字，第二年还被拍成电影。小说描写的时间是1959—1961年，女主人公丽塔·赛德尔中学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与年轻化学家曼弗雷德结识，两人产生了爱情。后来丽塔离开家乡到曼弗雷德所在的工业城市哈勒，她志愿做教师，入教师进修学院学习。曼弗雷德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研究

所当化学师。他们两人共同生活。丽塔和同学、教师一起去机车车辆厂劳动，接触到各种人物，政治上逐渐成熟，开始信仰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曼弗雷德却与现实格格不入，当他的发明成果被拒绝接受后，愤然去了柏林西区。三个月后，丽塔去柏林西区看望曼弗雷德。她发现西方并非那么美好，她规劝他一起返回东部，但无效。她只得一人返回柏林东区。失去恋人的痛苦折磨着她，一度使她绝望自杀，同志的情谊温暖了她的心，她重新又振作起来，克服感情上的创伤，投入新的生活。

小说的主题是普通的爱情故事，但作者赋予这个老主题以新的政治内容。它以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修筑柏林墙为背景，表现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给德国人民的家庭、婚姻和爱情带来的不幸，以及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阴影。由于小说把社会政治问题和个人遭遇、经历结合在一起描写，并采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内心奥秘，现实和回忆并行发展，语言简洁、含蓄，对话都是日常口语，出版后受到东、西德广大读者的欢迎。

1983年发表的中篇《卡珊德拉》是一部散文化小说。主人公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国王的女儿，她渴望自己成为先知，太阳神阿波罗赐予她为预言家。但因为多次拒绝阿波罗的求婚，阿波罗使她只有预言的本领，却没有人信她的预言。在特洛伊战争中卡珊德拉虽一再警告，不能让帕里斯率船舰去希腊，不要去抢希腊美女海伦，不要把大木马搬进特洛伊城，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的话（后人把没人听的警告称之为“卡珊德拉呼吁”），最终导致特洛伊城的毁灭。希腊人获胜后把城中妇弱老幼押回去作为俘虏。卡珊德拉在被俘后成为希腊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女奴和情人，后来被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所杀。小说写作的时间是八十年代初，正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时候，欧洲笼罩着核战争的危险。沃尔夫通过卡珊德拉在被杀之前的回忆、思考，重新认识特洛伊战争的历史，借古喻今，提出了当前人类最关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震惊了世人。小说发表后得到了东、西欧文坛的一致好评，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

米勒、哈克斯和布劳恩

海纳·米勒（192—）出生于萨克森州的埃彭多尔夫。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下度过的，中学没有毕业就被迫参加帝国劳动服务队，目睹了法西斯的暴行。战后1949年才读完中学。后来在图书馆和报社工作，1954—1955年在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工作，1958年任月刊《青年艺术》编辑和柏林高尔基剧院编剧，1959年起成为专业作家。1974—1977年任布莱希特创建的柏林剧团的戏剧顾问，后来又任柏林人民舞台的戏剧顾问。他曾多次获得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文学奖金，1985年获毕希纳文学奖，1986年获民主德国国家奖。

米勒最初的一些剧本是和他的妻子英格·米勒（1925—1966）一起创作的，重要的有《廉价劳动力》（1957）、《校对》（1958）、《女移民》（1961，后改名为《农民》1964）、《建造》（1963—1964）等。这些剧作受布莱希特“教育剧”的影响，引起剧坛的广泛注意。六十年代中期后，他致力于对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古典悲剧的改编，完成的重要剧本有《菲罗克泰特》（1964）、《赫拉克勒斯》（1966）、《暴君俄狄浦斯》（1967）、《普罗米修斯》（1968）、《贺拉梯人》（1968）、《美狄亚》（1974）等，他还改编莎士比亚的名剧，如《麦克白斯》（1971）、《哈姆雷特》（1977）、

《哈姆雷特机器》(1978)。这些剧作大都采用韵文体,语言简练优美,有高超的艺术性;但由于作者借历史题材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艺术主张,曾在东、西德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剧本还在东德遭到严厉批评和禁演。

米勒在戏剧艺术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七十年代后他采用“组合式”方法完成的著名戏剧有:《战斗》(1951—1974)、《巩德林的生平、普鲁士的腓特烈、莱辛的睡眠梦幻呼喊》(1977)、《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1956—1977)和《四重奏》(1981)等。“组合式”戏剧在艺术手法上熔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于一炉;各场之间情节并不关联,但主题思想却是一个,通过它们的内在联系,启迪观众思考更深层的问题。

《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是米勒“组合式”戏剧的代表作之一,产生于1956至1971年,1977年公开发表,1978年首演获得成功。这个剧本浓缩了德国的全部历史灾难。全剧六幕十三场,从日耳曼祖先开始,概括地描述了德国的过去、现在,并展望了将来,其中特别突出了普鲁士的历史和法西斯年代的历史。有些场景是现实主义的描述,有些场景则运用荒诞和残暴戏剧手法。如第四幕第一场名为“神圣家庭”——基督教里本意是指约瑟夫、玛利亚和耶稣一家——,作者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即不神圣家庭之意,写希特勒作圣父,戈培尔作圣母,戈培尔怀孕临产,日耳曼女神作产婆,帮助戈培尔产下一个畸形儿——康泰戛——狼。表面上看,似乎荒诞离奇,而实际上正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希特勒当父亲,戈培尔当产妇,说明法西斯主义是通过这个纳粹党的宣传部长去传播和扩大的;日耳曼女神当接生婆,说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产生,这与德国的历史传统和普鲁士精神密切相关。而戈培尔产下的畸形儿——康泰戛——狼,也有深刻的含义。康泰戛是一种镇静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德国差不多家喻户晓,并且用得很普遍。但是在此期间,常服此药的孕妇生下孩子,多为畸形。这个畸形儿,作者既用以比作西德这个国家,也比作法西斯思想的毒害,它影响着下一代,乃至子孙后代。康泰戛后面加个“狼”字,表明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的极度憎恨。剧中对希特勒本人的描写,也是现实和荒诞相结合,如写他在元首地堡中打哈欠、神经质地踱步,十分逼真;又写他大口大口地喝汽油解渴,抓着士兵就吃,非常荒诞,但荒诞的后面却很真实。希特勒在战争中不是耗尽了大量物质财富,并把德国人民推进了战争的火坑吗?海纳·米勒是一位当代悲剧家,他主张悲剧首先要引起恐惧和惊吓。他所以作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目的就是为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惊吓,以激发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憎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这部戏在艺术手法上也很独特,它完全打破了戏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情节跳跃性极大,有强烈的对比感。语言精练、优美、幽默、诙谐,比喻生动,寓意深刻,荒诞中隐含着严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强烈的讽刺。

彼得·哈克斯(1928—)是另一位德国剧作家。出生于西里西亚布雷斯劳一律师家庭。1945年随全家迁往西德,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哲学、文学和戏剧。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为电台、剧院等工作,同时进行戏剧创作。1955年应布莱希特的邀请赴东柏林,先后在柏林剧团、德意志剧院任编剧。1965年成为专业作家。

哈克斯在戏剧创作上受布莱希特的影响。他的剧作题材广泛,有取材于十世纪民间故事的《恩斯特大公的民间话本》(1953),有描写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西班牙皇室掠夺印第安人的《揭开印度的纪元》(1955),有描写七

年战争的喜剧《洛博齐茨战役》（1956），有记叙十八世纪普鲁士国王传说的《无忧宫的米勒》（1958），有反映民主德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忧虑和权力》（1960）和《莫里茨·塔索》（1961—1965），有根据阿里斯托芬同名剧改编的《和平》（1962），有反映法国王朝争斗的《玛加蕾特在艾克斯》（1966），有根据普劳图斯同名作品改编的《安菲特律翁》（1967），有描写歌德和斯泰因夫人亲密关系的《在斯泰因府上叙谈不在场的歌德先生》（1976）。

哈克斯在艺术手法上，早期擅长运用悲喜剧的形式和陌生化技巧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六十年代后，他摒弃布莱希特传统，剧作多以历史和神话故事为题材反映现实政治问题。他强调塑造个性，并赋予人物丰富的想象力。他曾多次获得民主德国的文学奖金，1977年获国家奖。

福尔克·布劳恩（1939—）出生于德累斯顿，195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人、管道工人和机车司机。1960—1964年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1965至1966年任柏林剧团戏剧顾问，后来专事文学创作。1972年起在柏林德意志剧院工作。

布劳恩的创作从诗歌开始，后来也写剧本和小说。他的诗歌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常以自由体形成，写无韵长句诗，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号召性；善用夸张、讽刺的手法，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他在诗歌中往往把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态度结合起来，代表了一代青年的心声。诗集《向自己挑战》（1965）描写建筑工地的劳动生活，表达青年渴望社会更快发展的感受和愿望。在《我们，不是他们》（1970）中，以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形式，从历史发展角度颂扬了民主德国的成就。诗集《迎向对称的世界》（1974）和《操练正步走》（1979），探讨了人类的发展问题，富有哲理性。

他的戏剧创作受布莱希特的辩证剧影响，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重要剧本有《翻斗车工人》（1967，1972）、《辛策和孔策》（197）、《廷卡》（1976）、《世界大同》（1979）和《德米特里》（1982）等。

从七十年代开始，他也以上述主题创作小说，短篇集《卡斯特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中篇《没有说完的故事》（1975发表于杂志，1977年出版）、《辛策和孔策的小说》（1981完成，1985发表）都表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特别是《没有说完的故事》描述一个青年工人遭到保安部门不公正的怀疑，酿成爱情上的波折、坎坷，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法制不健全，批判了草菅人民的官僚主义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布劳恩曾获得多项文学奖，他是德国新一代值得注意的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他的创作，不论是诗、剧本还是小说都贯穿着一种辩证思想，充满着要前进、要发展的进取精神。

第五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学

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西部地区由美、英、法三国占领，称西占区。1948年9月，在波恩成立了议会委员会。1949年5月10日确定波恩为首都，23日公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并且决定成立政府；9月间，经过

议会选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战后，国外流亡的反法西斯作家回到西占区的并不多，但留在西方国家的德国流亡作家，或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同西德的联系比较多。少数返回西德的作家，没有得到参与国家民主建设的机会，小说家克劳斯·曼（1906—1949）的自杀，反映了流亡回来的人们对于西德现状的悲观失望；德布林（1878—1957）虽在1949年参与创办美因兹科学院，也终因困难重重被迫于1951年重新出走法国。

二次大战后的联邦德国文学反映了战后西德历史发展的概貌。西德作家的作品，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四十多年的社会生活，如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的萧条岁月，五十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战争的谴责，法西斯分子的蠢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等。在有些作品中，把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同德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把德意志民族的历次灾难同个人悲剧结合在一起，以加深对德国社会的认识。在题材选择和艺术手法上，西德作家颇受美国和法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战后文学中首先出现的是废墟文学。这是指1945年的“零点”至五十年代初期的德国文学。一些青年作家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主张对过去的文学传统“砍光伐尽”，从思想上、语言上进行冷静、谨慎的清理与探索。当时人们生活在废墟之中，他们都蒙受了战争创伤。战后的西德作家“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于是出现了与这种年青文学如影随形的三个口号：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伯尔语）其中以废墟文学最能正确地反映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和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废墟文学不致“把同时代人诱骗到田园诗中去”，而是提醒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世界遭到破坏，家园成了废墟，人们应该思索。废墟文学的题材大多是描写希特勒法西斯专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废墟文学都写得很实际，对事物抱有怀疑态度，没有什么英雄行为或浪漫主义的情感；社会批评、嘲讽和怪诞是它的艺术风格。废墟文学的作家大多出生于1916—1925年间，其主要代表都是文学团体“四七社”的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家亨利希·伯尔（1917—1985）。他的早期作品《列车正点到达》（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一声没吭》（1953）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等，都反映了战争、回乡、战争中的见闻和废墟上的建设。其他著名的有博尔歇特（1921—1947）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大门外面》（1947），后者描写了年青的纳粹士兵贝克曼的悲剧，他在战后返回德国，既缺衣少食，也无容身之所；人是回“家”了，但四处碰壁，始终被关在“大门外面”。贝克曼的遭遇是当时西德青年一代的缩影，剧本被改编成广播剧后，引起强烈反响。安德施（1914—1980）的自传体小说《自由的樱桃》（1952），以纪实手法回忆了过去的经历，特别是被征入伍后的军旅生活和在前线投诚的经过。瓦尔特·延斯（1923—）的长篇小说《不，被告的世界》（1950）抨击极权主义国家对人性的扼杀，以影射希特勒政权。

1947年，作家和评论家里希特（1908—）、安德施等在慕尼黑建立文学团体“四七社”，以后参加者愈来愈多，有作家、评论家、出版商、新闻记者、大学文学教授，这个团体包括了战后西德文学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没有严密组织、没有坚定的政治或美学纲领的松散的集体，以建立新的、民主的、自由的德国，促进战后德国新文学的繁荣和扶助青年作家为宗旨。从1947

—1955年每半年集会一次，主要是朗读和讨论文学作品，对成员（有时也邀请客人）中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相互提出批评意见；从1956—1967年改为每年集会一次。1950年起颁发“四七社文学奖”。“四七社”对战后德语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并一度成为左右联邦德国文坛的力量。但由于其成员包括了各种倾向的作家，政治和艺术观点都不尽相同，因此矛盾较多，存在了二十年，于1967年举行最后一次会员大会后停止活动。1972年7月和1990年5月（在布拉格）“四七社”在长期沉默后又有过两次活动，但不再经常化。因为它已完成使命，于1977年正式宣告解散。

“四七社”成员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很多，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表现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也适当吸收现代派的回忆、象征、荒诞、蒙太奇、意识流、内心独白、多层次结构、时空概念颠倒交错等艺术手法。诗人、剧作家君特·艾希（1907—1972）早年发表诗集《偏僻的田庄》（1948）、《地下铁道》（1949）等，后来以写广播剧蜚声文坛，1951年发表的《梦》以寓意手法描写发生在五大洲的五个不同人的梦，揭示危及人类社会的种种威胁。小说家伯尔除上面已提到的作品外，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之见》（1963）和中篇纪实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等。君特·格拉斯（1927—）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1958年在“四七社”朗读断片时就获得交口称赞，出版后轰动了国内外文坛，接着他又发表了《猫与鼠》（1961）、《非人的岁月》（1963），构成《但泽三部曲》。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的长篇小说《空中群鹰》（1951）、《激流中的人》（1957）和《德语课》（1968），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克彭（1906—）的三部长篇小说《草里的鸽子》（1951）、《温室》（1953）和《死在罗马》（1954），以社会现实为题材，描写战后知识分子阶层徘徊动摇的矛盾心理，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复活和战争危险。马丁·瓦尔泽（1927—）的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姻》（1957）、《间歌》（1960）、《独角兽》（1966）等，揭露联邦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社会道德的败坏和人们的种种心态。乌韦·约翰逊（1934—1984）的长篇小说《对雅各布的种种揣测》（1959）、《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1961）、《两种观点》（1965）等，大都描写德国的分裂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作品摒弃传统的叙事方式，通过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等手法展开情节，颇有新意。诗人、散文家恩岑斯贝格尔（1929—）的诗集《狼的辩护》（1957）、《国语》（1960），抨击军国主义，揭露联邦德国表面繁荣的社会现实，语言锋利泼辣，诙谐幽默。彼得·魏斯（1916—1982）是1945年加入瑞典籍的德语作家，参加“四七社”活动，他的小说《马车夫的身影》（1960）、《告别双亲》（1961）和《逃亡的终点》（1962），以细节描写精确见长，后两者主要描述流亡经历，具有自传性质；他的剧作《马拉/萨德》（1964）、《调查》（1965）等，开创了德语“纪实戏剧”（一译“文献戏剧”）的新页。此外，尚有奥地利著名作家艾兴格（1921—）、策兰（1920—1970）、巴赫曼（1926—1973）等也是“四七社”的重要成员。以上这些作家基本上都获得过“四七社”文学奖。

当“四七社”的作家全力进行文学创作，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时，一批老作家不甘寂寞，他们也发表了不少小说、诗歌、戏剧，为繁荣文坛作出贡献。除本篇第二、三章已经介绍过的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黑塞、

福伊希特万格、贝恩、维歇特、贝根格律恩等外，还有一些老作家必须提及。他们中又有三种：一种是纳粹德国时期流亡国外战后没有回国的作家，一种是流亡后回国的作家，再一种是留在国内的所谓“内心流亡”作家。女诗人内莉·萨克斯（1891—1970），生于柏林犹太工厂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流亡后定居在瑞典。发表的重要诗集有《在死亡的寓所里》（1947）、《星辰黯淡》（1949）、《无人再知晓》（1957）、《逃亡与变迁》（1959）、《进入无尘之境》（1961）和诗剧《艾里》（1951）、《沙滩上的画》（1962）等，她以诗歌形式反映犹太民族在法西斯统治下遭受的残酷迫害及其悲惨命运，隐喻含蓄，格调悲怆，节奏和谐，曾多次获瑞典和联邦德国文学奖，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剧作家楚克迈耶尔，小说家雷马克相继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这在前面已做了介绍。剧作家、小说家雅恩（1894—1959）流亡回国后定居汉堡，潜心文学创作·长于心理描写。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无岸之河》（1949—1961），描写德国作曲家古斯塔夫·安尼阿斯·霍恩对过去年代的追思，表现了一个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坎坷经历；全书二千七百多页，采用意识流手法，评论家把它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诗人、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没有流亡国外，三十年代两次被捕，并被禁止创作。战后长期任国际笔会联邦德国中心主席，发表诗集《审阅我写的书》（1946）、《日常琐事》（1948）、《小自由》（1952）等，抨击资产阶级市侩习气，鞭笞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的诗作通俗易懂，不拘形式；儿童文学作品有《口是心非的特洛兴》（1949）、《动物大会》（1950）等。女作家朗盖瑟（1899—1950）没有流亡，1946年发表了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长篇小说《不可磨灭的印记》，描写了犹太人的遭遇。另一女作家卡施尼茨（1901—1974）没有流亡，长期住在法兰克福和罗马，她的《诗集》（1947）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短篇小说集《长长的阴影》（1960）、《长途电话》（1966），主要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

1961年6月，由弗·许塞尔在多特蒙德建立新的文学团体“六一社”，包括作家、批评家、新闻记者和教师，其目的是通过相互批评和讨论，以促进工人文学创作为宗旨，主张“不受政治的、国家的使命和指示约束，以艺术探讨工业化劳动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每年集会两次。“六一社”成员的社会出身有工人也有职员，尽管政治观点和艺术风格不同，但都致力于在工业社会新的角度下革新工人文学，并以较多的理性思考去反映工厂、企业中的劳动世界，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强调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社会阶级斗争。他们的作品大多描述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揭示工人遭受剥削的实情，反映劳资矛盾和工会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问题。在一些工业区出现了工人写作小组。“六一社”中的著名作家有比舍尔（1918—）、格律恩（1926—）、瓦尔拉夫（1942—），女作家艾利卡·龙格（1939—）、梅希特尔（1943—）等。1970年，“六一社”中的左翼在瓦尔拉夫、龙格带领下又分裂出来，在科隆成立“劳工界文学社”，又称“七〇社”，提倡写作“纪实文学”。瓦尔拉夫于1985年发表的描写外籍工人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受压迫的报告文学《最底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西德纪实文学的早期代表作有霍赫胡特（1931—）的剧本《基督代理人》（1963），基普哈特（1922—）的剧本《奥本海默案件》（1964），龙格的报告文学《波特罗普笔录》（1968）等。

六十年代，“具体派”诗歌在西德风行一时，代表性诗人有海森比特尔（1921—）、莫恩（1926—），还有瑞士的戈姆林格（1926—），奥地利的扬德尔（1925—）、吕姆（1930—）等。这些诗人用单词或字母排列、组合成各种形象或声音，以表达一种情绪和内容。这一诗派到七十年代趋于消沉。在形式上追求革新的尝试，反映在阿尔诺·施密特（1914—1979）的作品中特别明显，他的长篇小说《纸片的梦》（1970），以每页三栏、三条线索并行记录一个离群索居的作家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例。

1968年，西德发生大学生反权威运动，把文学政治化倾向推向顶峰。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宣告文学的丧钟敲响了，要求停止纯文学创作，投身于直接的改革社会的行动。但不久这场运动就流产了，并没有动摇现存社会制度；可是，它对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女性独立意识和公民自觉主动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巨大热情，唤起他们对权威的怀疑和反叛精神。但运动的失败也使他们深深感受到破灭的痛苦和沮丧。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文学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复杂的心态。这一时期的西德文学，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千姿百态，变幻莫测。有位评论家说：“不论是主题还是素材，占主导地位的是含糊的不确定性”。没有共同的信号，不传达统一的信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当代德语文学多样化的状况。“四七社”老作家坚持社会批判精神，抨击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弊端。这个时期伯尔发表了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1）、《保护网下》（1979）和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他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格拉斯发表了长篇小说《蜗牛日记》（1972）、《鲑鱼》（1977）和《母老鼠》（1986）。伦茨发表了长篇小说《楷模》（1973）、《故乡博物馆》（1978）和《练兵场》（1985）。瓦尔泽发表了长篇小说《爱的彼岸》（1976）、《激浪》（1985）和《保卫童年》（1991）。魏斯发表了长篇小说《抵抗的美学》（1975—1981）。约翰逊发表了长篇小说《周年纪念日》（1970—1983）。以上这些老作家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被认为是对联邦德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当年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参加者经过反思，发表了不少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失落自我的痛苦的作品。七十年代起对这些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出现新的转折，注意力从社会转向个人、转向内心世界。这些作品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从怀着狂热的希望，憧憬美好的未来到乌托邦的幻灭而失望、消极的过程。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彼得·施奈德尔（1940—）的中篇小说《棱茨》（1973），女作家斯特鲁克（1947—）的长篇小说《阶级之爱》（1973）、薇雷娜·斯特凡（1947—）的《蜕皮》（1975），尼·博尔恩（1937—1979）的长篇小说《历史背向地球的一面》（1976），博托·施特劳斯（1944—）的剧本《重逢三部曲》（1976），布林克曼（1940—1975）的散文集《罗马掠影》（1979）等等。文学史家把这种反映自我失落感的反思、内省的作品称为“新主体性文学”。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反思发展成为“重新发现自我”、分析自我的倾向，更多地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有的评论家称之为“新感受”派或“自我中心”派。这派作家多为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除上述几人外，还有黑尔特林（1933—）、肖特耶维茨（1934—），女作家沃曼（1932—）、布隆克（1937—）、汉内莉斯·塔肖（1937—）等，这些作家在描写自我的同时，常常对社会以及社会对个人产生的畸形影响进行抨击。上述作家中的

女性作家同时也是妇女文学的积极创导者，她们的作品往往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并带有自传色彩。七、八十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还有小说家恩德（1929—），诗人特奥尔巴迪（1944—），剧作家施佩尔（1944—）、克罗茨（1946—），女作家弗·罗特（1948—）、申克（1948—）等。

联邦德国写作通俗文学的著名作家有康萨利克（1921—）、聚斯金德（1949—）等。后者的长篇小说《香水》（1985）曾轰动一时，起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在文学理论方面，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姚斯（1921—）和伊塞尔（1926—）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接受理论、接受美学。“接受美学”的创立，导致文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即由过去的以本文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从而使文学研究的趋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人著述甚丰，在理论界很有影响。形成于三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六十至七十年代是它的鼎盛时期。这虽是一个哲学流派，但它的重要理论特征是把哲学理论研究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其主要成员如霍克海默（1895—1973）、阿多尔诺（1903—1969）等，在写哲学著作的同时，也写了不少美学著作，对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伯尔

亨利希·伯尔（1917—1985），出生于科隆一个天主教徒家庭，父亲是雕刻匠和细木工，祖先是爱尔兰的移民。伯尔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当学徒，1939年入科隆大学攻读日耳曼语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年，他被法西斯德国征兵入伍，在部队中经历了六年战争生活。1945年战争快结束时，他被美军俘虏，同年12月获释。战后伯尔住在科隆，一面在大学继续学习日耳曼语文学，一面做些辅助工作，如本工、统计员、职员等。1951年起成为专业作家。

伯尔在中学读书和做店员时，开始写小说，但都没有发表。战后，他的创作又正值“废墟文学”时期，他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从1947年起，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并应邀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活动。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和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都以二次大战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他把战争渲染成一场抽象的人与命运的搏斗，结果是人的毁灭。“战争是无聊的”这是伯尔对战争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在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中，作者通过伤病员的眼睛，把法西斯士兵的残暴行径和纳粹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描写，把德意志民族的灾难和德国人的个人悲剧联系在一起，含意深刻。

从五十年代起，伯尔作品中描绘的社会面比从前宽阔得多。在他笔下，有上层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更多的是小职员、小商贩、穷教员、杂耍演员、普通工人、战争中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孤儿寡妇等人物。伯尔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这些所谓的“小人物”在西德战后“经济奇迹”中的生活遭遇，刻画了他们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精神上的彷徨苦闷，从而揭露和批判了战后西德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的现象。195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声没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4）描

写的是西德战后出现的“寡妇婚姻”问题，这个问题与贫困、金钱联系在一起，同样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伯尔采用多层次结构的手法，通过对两个遭到战争破坏而社会地位悬殊的家庭的描写，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蠢蠢欲动的法西斯势力。另一长篇《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描写的是西德莱茵地区一个世袭建筑师家庭在一天内的经历。伯尔通过主人公亨利希·费麦尔一家三代人对圣安东修道院建造、炸毁和重建的回忆，概括地描述了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五十年的历史和命运，抨击了当时西德存在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辟活动，表达了德国人民的希望、痛苦和幻想。长篇小说《小丑之见》（1963）描写的是一个滑稽演员在教会的迫害下，爱情和事业都遭到失败的故事。伯尔以深切的同情控诉了天主教会的蛮横无理，讽刺了西德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因而招致了教会人士的攻击，但却受到了广大普通人民的赞赏，使本书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是一部纪实小说，以新闻报道的形式，通过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描述木匠格鲁尔父子由于苛捐杂税不堪负担，而对社会采取了报复行动。伯尔以这部小说为开端，采用纪实体这一新体裁进行小说创作，以强调描写的事件的客观真实性。

伯尔在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更是那些不起眼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往往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无事遭殃，落得悲惨的结局。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除了揭露法西斯战争罪恶、反映德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的灾难外，进一步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短篇的篇幅，长的八、九千字，短的仅一、二千字，故事生动、幽默，结构紧凑、集中，语言简单、自然，讽刺辛辣、尖锐，深受读者的欢迎。其中《败家子》（1951）、《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1952）、《正义者丹尼尔》（1954）、《一定照办》（1956）、《战争爆发的时候》（1961）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七十年代以后，伯尔作品的艺术手法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以前，他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但197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一译《莱尼和他们》或《女士和众生相》），197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保护网下》和198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一译《沿河区的女士们》），却采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伯尔的文学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通过二次大战后一个名叫莱尼的妇女所接触的人物，向读者展现了德国战前岁月、战争年代以及战后西德社会的广阔画面，从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德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剖析，并塑造了各种典型人物形象，被誉为1971年度“欧洲之书”，伯尔“小说创作的皇冠”。《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描写的是一个年轻正派的家庭助理员遭到黄色报纸的诽谤，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开枪打死了任意歪曲、捏造事实的记者。这部作品起因是1971年西德某地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某家报纸指控犯罪者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主义集团，伯尔著文认为这种指责毫无证据，因而遭到这家报纸的攻击，住宅也受到警察局的搜查。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抨击了热衷于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专门残害别人名声，以致迫使当事者家破人亡的低级新闻报纸，从中对西德

政界、新闻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保护网下》在题材上和前一部小说相联系，反映的是七十年代西方那个“感觉自身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同时又日益畸形化的社会”。伯尔通过报业巨头托尔姆一家受到警察严格的安全措施的保护而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抨击了联邦德国的所谓反恐怖活动以及 1972 年颁布的“禁止就业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批判了新闻界和警察局的罪恶勾当。以上两部针砭时弊的作品在西德曾引起轩然大波，少数评论家认为伯尔的描写“不真实”，是“失败之作”，甚至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同情恐怖分子；但大多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欢迎这样的作品。《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在伯尔逝世后一个月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描述的是波恩政治家的内幕故事。所谓“大河秀色”指的是西德首都波恩附近的莱茵河风光，这里是政治家角逐的场所，风云变幻的舞台。伯尔笔下的波恩政治家除少数几个外，几乎都是些无恶不作的蒙昧主义者，而小说中出现的女士们，大部分都成了那些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政治家手中的牺牲品。这部小说与西德的政治现实紧密相联，但不是影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不等于当今真实的波恩政治家。这部小说的形式也很独特，它有一个副标题，名为《对话式和独白式的长篇小说》，它既象小说，又象剧本，完全打破了小说和戏剧之间的界限。全书共十二章，就象十二场戏，不是通过上场人物的对话就是通过内心独白来表现，作者的直接叙述只有几句提示式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既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情节的发展，既没有细节描写，也没有形象描写，完全靠读者的再创造来进行补充，其目的在于把读者从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一起参与创作。

伯尔是一个多产作家，他除了写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还写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等戏剧作品和少量诗歌。他的文论、杂文、随笔也很有特色，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触及面广，1967 年出版的《论文、批评、讲话》和 1973 年出版的《新政论和文论集》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他还翻译英语作品介绍给德国读者。

伯尔的作品充满同情“小人物”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不畏权势，不怕诽谤打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西德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他的创作总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当前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因此，他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至 1985 年止，已被译成四十五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国的总发行量达三千一百万册。他获得了许多殊荣，被誉为“国际文坛巨擘”。他在 1970—1972 年被选为德国笔会中心主席，1971—1974 年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在 197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证书上这样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灵敏技巧结合起来，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1992 年，伯尔在 1949—1951 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沉默无语》在埋没四十年后正式出版，再次引起轰动。这部遗著描写了 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后，面对战后沦为一片废墟的德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其主题与五十年代初伯尔的其他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德国舆论界所以对伯尔和他的这本著作又一次作为热点给予关注，主要是面对德国极右势力（新纳粹分子）的抬头，德国人民必须如伯尔作品中一再警告的：德国人民必须敢于正视自己头上的疮疤，敢于批判清理过去的历史，否则将贻害无穷。伯尔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永世长存。

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1927—）出生于但泽（现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小商人，母亲是波兰人。1944年被征入伍，次年受伤被美军俘虏。1946年获释后当过农业工人、矿工和石匠学徒。1948—1951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雕刻和版画，后又转入柏林造型艺术学院继续深造。1956—1959年旅居巴黎，进行文学创作。1960年后主要居住在柏林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1983—1986年任西柏林艺术科学院主席。

格拉斯最初是以诗歌和戏剧登上文坛的，早期重要作品有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6）、《三角轨道》（1960），剧本《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时弊，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在艺术手法上既有现实主义成分，又受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使格拉斯获得世界声誉的是他19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铁皮鼓》，这部作品在未出版时就获1958年“四七社文学奖”；接着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非人的岁月》（1963），由于都以但泽为背景，合称为《但泽三部曲》。后来他除了发表《平民试验起义》和《在此之前》（1969）两个剧本，诗集《盘问》（1967）和《诗歌全集》（1971）外，主要创作小说，重要的有长篇《局部麻醉》（1969）、《蜗牛日记》（1972）、《鲽鱼》（一译《比目鱼》1977）、《母老鼠》（1986），中篇《在特尔格特的聚会》（1979）。他的小说往往以动物隐喻人类，构思奇诡、情节怪诞，探讨的问题比较隐晦。作者喜爱烹饪，作品中常有烹饪知识。他还著有文集多部，如《论不言而喻》（1968）、《公民和他的选举权》（1974）、《学习抵抗》（1984）等。

格拉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1982年加入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张在“正常状态”下实行渐进的改革，因此他有时会遭到“左右夹攻”。在艺术上他主张摆脱一切意识形态的影响，提倡创作自由。他常到世界各地旅行，除欧洲各国外，去过美国、以色列、日本，1979年来中国访问。他曾获多种文学奖，为当代德语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除了创作文学作品外，还进行版画和雕刻创作，他的许多作品都由自己绘制封面或插图。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格拉斯旅居巴黎期间完成的，1959年发表后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有人说二次大战后的德国文学受到国际的重视首先是从这部小说开始的。它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1979年由导演施隆多夫搬上银幕，多次在国内外电影节上获奖（包括获得1980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使这部作品传遍世界。

格拉斯的这一代表作，通过侏儒奥斯卡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作者家乡和西德的社会历史，揭露和讽刺了法西斯的残暴和腐败的社会风尚。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法。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住在西德一所护理与疗养院里，回忆和叙述自己的故事。着重反映的是1924—1954年的德国历史，也追溯了1899年以来的情况。那时，奥斯卡的外祖母是一位美丽的波兰姑娘，她救了一名逃犯，两人结为夫妻，生下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丝。阿格内丝和表兄扬·布朗斯基相爱，但没有成婚。1923年她嫁给了德国人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两人在但泽经营一家殖民地商店。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私下仍和表兄幽会，怀孕后生下奥斯卡。他一生下就有成人的智力，但无法断定谁是自己的生父，把两个男人都作为“假想的父亲”。三岁生日那天，母亲买了一只铁皮鼓送给他作为礼物。也就在这时，他不愿长大后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决意“自我

伤残”，故意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这样他长到九十六公分就停止发育，成为侏儒。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还有用嗓子“唱碎玻璃”的特异本领。三十年代他父亲成了纳粹冲锋队员，母亲病死。1938年11月“水晶夜”，纳粹党徒在但泽肆意抢劫，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39年9月，党卫军占领但泽，布朗斯基也被德国人枪杀。马策拉特找了邻居家十七岁的姑娘玛丽亚来照管他的店铺。这时奥斯卡已十六岁，但仍像三岁孩童。她帮助他穿衣、洗澡，晚上陪他睡觉。他爱上了她，两人发生了关系。马策拉特在此时正式娶玛丽亚为妻。后来她生下男孩库尔特，名义上是奥斯卡的弟弟，实际是他的儿子。1943年6月至1944年奥斯卡作为侏儒参加前线剧团去各地巡回演出。后来苏军攻占但泽，马策拉特在慌乱中想把党徽吞进肚里，结果被打死。奥斯卡在埋葬父亲时，把铁皮鼓扔进墓穴。库尔特用石子掷中他的后脑勺，他跌进墓穴，开始长高身体，一直长到一米二三，成为一个鸡胸驼背的人。战后玛丽亚带着他和库尔特来到西德。奥斯卡干过雕刻匠、模特儿、鼓手，并接受一笔遗产。后来他对生活厌倦，自己让人控告有杀人嫌疑，被送进护理与疗养院监视，以观察他是否患有精神病，他在这里倒也可以逃避人世的纷争。谋杀案真相大白，三十岁生日过后不久他将被无罪开释。但他究竟想干什么？无名的恐惧的阴影不离他左右。

这一小说继承了欧洲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奥斯卡的奇特经历，建构了这部作品的主要线索。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畸形的时代，只有通过畸形的人才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小说中通过侏儒的眼睛审视人生，可以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无所顾忌。奥斯卡这一怪诞人物通过“自我伤残”——自我伤残是当年德国兵不愿打仗而采取的办法——而进入当时的社会，这就定下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基调。这样，奥斯卡既成了“局外人”，又时时处处“身在现场。”他可以不被人们注意地到处观察、审视，象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讥讽嘲笑，嘻笑怒骂，无所不能。又因为他具有成年人的三倍智力，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当然也会被卷入现实事件，所以他制造闹剧，揭露丑闻，亲身经历，无所不在。格拉斯让奥斯卡进得去又出得来，以敏锐机智、诡计多端的流浪汉的眼光展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广阔画面，特别是在揭露法西斯暴行的同时，还幽默地讽刺了小市民社会阶层的百态，向人们敲响了反省的警钟。《铁皮鼓》可以说是一部现代流浪汉小说。小说语言粗犷、形象而生动，并富有地方色彩。

中篇小说《猫与鼠》在内容上与《铁皮鼓》没有关联，不过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在但泽。小说主认公马尔克是但泽中学的学生，他的喉结特别大，吃饭、吞咽或讲话时象一只老鼠在跳动，为此时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命运或社会好似一只猫，不停地戏弄、追捕这只老鼠。马尔克是个虚荣心极强的青年人，一次他和同学在一艘废弃的扫雷艇上玩，他表演了出色的潜水技巧，博得大家喝采。另有一次他将一个当了海军上尉的母校毕业生得到的一枚骑士勋章偷了来，因此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应征入伍，一度任坦克指挥官，获得了勋章。他想挂着勋章回学校作报告，以恢复自己的名誉，但没有成功。他绝望地逃离部队，在过去玩过的扫雷艇上失踪了。这部小说以猫与鼠的隐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嘲讽了第三帝国对“英雄”崇拜的市侩风气。

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非人的岁月》分三部：第一部叙述有一半犹太血统、出身商人家庭的阿姆塞尔，与同学马特恩的亲密友谊。阿姆塞尔有艺

术天赋，心灵手巧，他扎的驱鸟稻草人十分逼真，人人喜爱。第二部叙述阿姆塞尔和马特恩中学毕业后仍友情甚笃。阿姆塞尔还是扎稻草人，马特恩在一家剧院当统计员。德军占领但泽后，阿姆塞尔在扎稻草人时被一纳粹军官发现，他被抓了起来，拔掉全部牙齿，埋在雪里做雪人。马特恩也因不满纳粹而被投入苦役营，送上前线；后来他投奔了盟军。第三部叙述战后马特恩在西德，决心向纳粹分子复仇。但人们竟然忘记了战争、忘记了过去，竭力歪曲事实，他感到非常愤慨。这部小说的标题《非人的岁月》，德文原义也作《狗的岁月》解，具有双重的意义。小说通过阿姆塞尔和马特恩这两个青年朋友由战前到战后的经历，揭露了德国纳粹党和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批判了战后西德社会对纳粹的姑息容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拉斯对战后西德社会现实的不满。

伦茨和格律恩

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吕克一税务官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被征入纳粹海军，后来他在丹麦受训时逃跑。战后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学史。1951年任《世界报》副刊编辑，1951年起成为专业作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曾获得多种文学奖。

伦茨的初期创作受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特别是海明威的影响。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空中群鹰》于1951年发表后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小说叙述战争中一名战俘逃跑后被追逐最后在边境上被打死的故事。接着他又写了多部长篇小说。《与影子决斗》（1953）写一个德国上校重新访问非洲战场，受到良心的谴责。《激流中的人》（1957）写一个老潜水员因年老失业而涂改证件，虽努力工作但结果还是被解雇的故事。《面包与运动》（1959）写一个曾获得过荣誉的运动员，为了保持荣誉不顾体力和衰老，仍顽强地在运动场上和新起的一代进行力所不及的角逐，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满城风雨》（1963）通过一个游击队员与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提出了战争罪责问题。《德语课》（1968）是伦茨的一部力作，剖析了长期作为“德意志品质”宣扬的“忠于职守”的思想，发表后在德语文坛引起轰动，并立即被拍成电视片，广为流传。《楷模》（1973）描述三个教育工作者承担编写一部符合时代要求，作为青年人楷模的教科书，他们几经努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作品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问题。《故乡博物馆》（1978）写一个地毯工人呕心沥血在故乡筹办一座博物馆，后因纳粹省长被选为博物馆馆长，愤而将博物馆焚烧的故事。1985年他又发表长篇小说《练兵场》。

伦茨还写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著名的有《苏莱肯村曾经如此多情》（1955）、《灯船》（1960）、《败兴的人》（1965）、《爱因斯坦在汉堡横渡易北河》（1975）和《塞尔维亚姑娘》（1987）等。他也创作戏剧（如1961年发表的《无辜者的年代》和广播剧（如1963年发表的《抄家》），不过没有小说有名。

揭露和清算法西斯的罪恶，吸取全民族的历史教训，是伦茨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1968年发表的《德语课》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945年。少年西吉因“盗窃”艺术品被关进教养所。他在单人囚室里被罚写德语课的一篇作文；“履行职责的欢乐”。他想起了往事。父亲耶普森是一名乡村警察，1943年奉命监视画家南森，禁止他继续作画，并没收他的作品。当时十岁的西吉同情画家，帮他藏画。耶普森则忠实地执行命令。一次，警方

借故抓走南森时，画家偷偷地把画塞给西吉。战争即将结束时，耶普森在院子里烧毁文件，英军赶来，把他抓走；西吉从火堆旁抢出一卷没收的画稿。战后，耶普森仍回小镇当警察，尽管时代早已不同，但他仍执行原来的命令，搜寻并销毁南森的画。他的顽固使西吉十分恐惧，最后发展到病态的地步。一次在画展上西吉唯恐南森的作品被毁，便继续偷藏画家的画。后被父亲发现，当作难以管教的少年犯送进教养所。

这部小说取材于画家埃米尔·诺尔德（1867—1956）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并赋予新的内容，它深刻地揭示了希特勒纳粹执政的年代，某些德国人由于盲目“履行职责”以至沦为法西斯的帮凶和牺牲品的可悲教训。作者着意塑造的是非不分、冥顽不化的警察耶普森的形象和他的儿子西吉的形象十分成功，非常富有教育意义。《德语课》也是“德国人的一课。”

马克斯·封·德尔·格律恩（1926—），德国工人作家，出生于巴伐利亚州拜伊罗特市一个鞋匠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商业学校，因父亲被纳粹关入集中营而辍学，到商店当学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纳粹征召入伍，在伞兵部队服役，1944年为美军俘虏，在美国留居三年，1947年回国。1948—1951年当过建筑工人、矿工，1951—1963年在鲁尔区当了十三年煤矿工人，后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格律恩从1953年开始进行写作，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1962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双重黑夜里的人》，根据亲自经历描写了四名矿工因塌方埋在井下以及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引起文坛重视。接着发表的重要长篇小说有《鬼火与烈焰》（1963）、《给波施皮希尔的两封信》（1968）、《坎坷人生》（197）、《雪崩》（1986）等。他还写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描写工人生活的纪实文学，其中《西德外籍工人生活景象》（1975）影响较大。1979年他为青年写了读物《当初情况究竟怎样？》描写了在第三帝国度过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1961年格律恩和许泽尔共同发起成立以工人作家为主体的多特蒙德“六一社”。从此“劳工界文学”正式出现在西德文坛。格律恩是“六一社”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他的作品反映职工的生活和面临的问题，用工人的语言讲工人的事情，朴素而真实。他曾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高雅’文学，我描写我们社会里的工人、职员。我观察他们，我只能描写他们的事，因为我了解他们的矛盾，我曾和他们一起受过苦”。格律恩当年是两个德国笔会中心成员，曾获得多项文学奖。

1963年格律恩发表长篇小说《鬼火与烈焰》，很快在社会上和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成了他的代表作。小说发表后，曾遭到国内一些人的攻击，某公司业主还以诽谤罪控告作者，后来格律恩虽被判无罪，但被公司解雇，从此成为职业作家。

小说以矿工生活为题材，通过主人公尤尔根·福尔曼多次变换工作，反映“福利社会”里各方面人物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小说描写了六十年代初的西德社会，尤尔根原在矿山工作，后被解雇，又去钢铁厂、建筑工地等处劳动；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对于“经济奇迹”采取了怀疑态度。他妻子则对“经济奇迹”抱有幻想，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结果在“分期付款”的枷锁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家庭的和睦关系也成了问题。整个作品由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入手，揭示了

劳资矛盾，工人与工会的矛盾，以及纳粹势力的影响。格律恩在写作手法上无所拘泥，时而将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时而不动声色地如实记录，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世间的_{不平}。全书不分章节，只分几个大段和一般段落，叙述生动，语言通俗简洁。

《坎坷人生》(1973)是格律恩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主人公卡尔·迈瓦尔德是马斯曼公司多特蒙德分厂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他发现厂方用窃听设备窃听工人之间的交谈，监视工人。他设法弄到了这些谈话。在圣诞节的庆祝会上，迈瓦尔德在工人面前揭露了厂方的这一卑劣行径，并当场责问法贝尔经理。这事在全厂引起轰动。迈瓦尔德还把情况向区工会领导反映。不久，法贝尔经理被调回总管理处。新来的经理博施用刑事警察，企图压服迈瓦尔德。迈瓦尔德在厂内厂外进行了揭发，但处处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制和欺骗，使他有如履薄冰之感。他的活动尽管在公众中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使工人政治地位得到改善，更可悲的是，迈瓦尔德反遭到工厂的解雇。但是工人们团结一致，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工人群众声援下，最后劳工法庭出面迫使厂方收回解雇的决定。格律恩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形式，生动地揭示了劳资矛盾、工人与工会的矛盾、各种党派力量之间的妥协与争斗，还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病退工人和外籍工人的遭遇。这部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德社会中工人的生活_{和斗争}，抨击了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活动家，同时也描写了工业发达国家在全面机械化和向自动化过渡过程中劳动对人的异化的新阶段。

瓦尔泽和霍赫胡特

马丁·瓦尔泽(1927—)出生于博登湖畔瓦塞堡一旅店主家庭。1944年应征入伍。1946年中学毕业后入雷根斯堡和蒂宾根大学攻读文学、历史、哲学，1951年以研究卡夫卡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在斯图加特的南德意志电台、电视台工作。1957年成为专业作家，回到博登湖畔定居。

瓦尔泽在电台工作期间，由于业务需要曾旅行意大利、法国、英国、捷克和波兰，后来又多次去美国旅行和讲学，大大拓宽了视野。他是“四七社”成员，曾获1955年“四七社文学奖”。他既写小说，又写剧本，也写诗歌。他的重要小说有短篇集《房上一飞机和其他》(1955)，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事》(一译《菲城婚事》1957)、《间歇》(196)、《独角兽》(1966)、《虚构》(1970)、《加列斯特氏病》(1972)、《坠落》(1973)、《爱的彼岸》(1976)、《心灵的活动》(1979)、《致洛尔特·李斯特的信》(1982)、《激浪》(1985)、《保卫童年》(1991)等，《一匹逃遁的马》(1978)被认为是中篇小说的杰作，另一中篇间谍小说《多尔勒和沃尔夫》于1987年发表后立刻成为畅销书。他的重要剧本有《橡树和安哥拉兔》(1962)、《身材超人的克罗特先生》(1964)、《黑天鹅》(1964)、《夫妻同房之战》(1967)、《一出儿童剧》(1970)、《耳光》(1983)等。

瓦尔泽迄今已写了二十来部中、长篇小说，十多部剧本。他的作品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联邦德国的现实社会，揭露矛盾，针砭时弊，有明确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在艺术手法上他博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家之长，从形式、结构、语言等方面不断进行试验改革。因此他的作品发表后常受评论界的关注，有时褒贬不一，有时引起轰动。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为当代德语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早期作品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事》，通过出身低微的大学毕业汉斯·博伊曼与大工厂主女儿安妮的结合以及向上爬的经历，揭露西德五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道德败坏、人欲横流等现象，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西德的社会现实。《间歇》、《独角兽》和《坠落》又称《克里斯特莱因三部曲》，通过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成为广告业大老板及其暮年的衰落，反映西德福利社会中人们相互竞争并走向自我毁灭的现实。小说主要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绝大部分是主人公克里斯特莱因的感受、观察、联想和回忆，读者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内心视野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全景。瓦尔泽的《间歇》等三部曲是托马斯·曼和穆齐尔的反讽式的讽刺小说传统的继续。

中篇小说《一匹逃遁的马》1978年发表后，获得评论界的一致推崇，被改编成剧本、广播剧、电视剧和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篇小说象作者以前许多小说一样，以故乡博登湖为背景，以他生活中熟识的原型为人物，描写了中年知识分子苦闷遁世的心情。小说主人公赫尔穆特·哈尔姆和妻子扎比内在博登湖度假，巧遇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克劳斯·布赫和妻子海伦妮也在这里度假。于是，两对夫妻一起游乐、一同聚餐，互相交谈。昔日的优等生赫尔穆特现在是中学教师，成绩平平，暮气沉沉；虽有苦闷，但也满足于此。而当年的调皮鬼克劳斯却已功成名就，既是作家，又是环境保护专家，体育运动员，朝气蓬勃。一天，他们在森林中散步，克劳斯制服惊马的行动，更使赫尔穆特夫妇钦佩不已。有一次赫尔穆特和克劳斯两人在湖上泛舟，克劳斯向赫尔穆特倾吐了苦闷遁世的心境。他一方面感到精力不济，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忧虑，也担心失去年轻漂亮的妻子，另一方面又挑逗赫尔穆特，激励他再次下水，不能听天由命，以便他们两人最终能相互救助。正在这时，湖上聚起风暴，克劳斯落入水中，赫尔穆特死里逃生。后者向海伦妮报丧，但她在悲痛之余又向赫尔穆特夫妇叙述了她与克劳斯结合的苦闷，她丈夫实际是个失意的人，他的许多言词都是谎言。突然，克劳斯脱险归来，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感到羞愧，与妻子匆匆离去。赫尔穆特夫妇也提前结束休假，乘火车离开博登湖畔。小说结尾一句和开头第一句完全相同，暗喻一切照旧，生活依然如此。这个作品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遁世心情，又暴露了人际关系中的虚伪性；情节简单，叙述朴素，手法新颖，寓意深刻，为瓦尔泽的名篇佳作。

罗尔夫·霍赫胡特（1931—）出生于黑森州埃施维格一工厂主家庭。他很早对文学发生兴趣，实科中学毕业后就到书店工作，同时在海德堡、慕尼黑等大学旁听，后来任出版社编辑。1963年起住在瑞士巴塞尔附近，后又迁往维也纳。曾获柏林、巴塞尔、慕尼黑、汉堡等城市的文学奖金。

霍赫胡特开始时写自传性小说，未获成功，后转向戏剧创作。1963年第一部剧本《基督代理人》发表，引起西方剧坛强烈反响。以后的重要剧本有《士兵们》（1966）、《游击队员》（1970）、《助产士》（1972）、《吕西斯特拉特和北约》（1973）、《猎人之死》（1976）、《法学家》（1979）、《女医生》（1980）。这些剧作一般都恪守席勒的古典主义美学规范。作者相信戏剧的启蒙作用和净化效果，围绕着责任、道德和良心问题展开剧情，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社会现实性。他和彼得·魏斯（1916—1982）、海纳尔·基普哈特（1922—）等一起，对六十年代德语国家兴起的文献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中篇《柏林的安提戈涅》（1966）、《在德

国的爱情》(1978)。此外,还有杂文集《在历史的禁区》(1980)、《强盗的谈话》(1982)等。

《基督代理人》是霍赫胡特的成名作,有一个副标题《一出基督悲剧》,1963年在西柏林自由人民舞台公演,引起西方文坛极大轰动;接着的十五年中,在二十六个国家七十二个舞台上演出,使作者一跃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著名导演皮斯卡托(1893—1966)曾为本剧的出版写了序言。

剧本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罗马教皇纵容默许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事件。1943年10月德国法西斯进入罗马后,将全城的犹太人抓起来要送集中营。面对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教皇庇护十二世却听之任之。剧本取这个标题在于谴责教皇不配作为基督的代表,听任法西斯暴徒把人类投入苦难的深渊。剧中歌颂了青年神甫里加铎的行为。他为了洗刷教会蒙上的耻辱,自愿和犹太人一起进集中营,给他们以同情和安慰。

这是一出纪实性很强的文献戏剧。作者运用了许多文献资料,插入大段关于历史背景的注释,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罗马教廷,尖锐地提出梵蒂冈在法西斯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罪责问题。剧本的演出触怒了教会,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并在一些地区遭到禁演、删改,或破坏它的演出。但绝大部分观众和读者对这部揭露纳粹暴行、谴责罗马教廷的文献剧是非常欢迎的。

魏斯和瓦尔拉夫

彼得·魏斯(1916—1982),瑞典德语作家。生于柏林附近的诺瓦丰斯,他是西德笔会的成员,所以也有称他为联邦德国作家。他父亲是犹太资产阶级。1918—1929年在不来梅度过童年时代,随后移居柏林。1934年与父母一起流亡,经英国去布拉格。1936—1938年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从1939年起定居瑞典,当过画家和导演,后与一位瑞典舞台布景设计师结婚,1945年成为瑞典公民。同时也是西德笔会的成员。他早年用瑞典文创作,自五十年代起改用德文写作;既写小说,也写戏剧,曾获得多种文学奖。他的绘画艺术也有相当水平,在瑞典和德国举办过多次展览。

魏斯的创作从小说开始,成名作《马车夫的身影》(1960),表现一群精神空虚的流亡者的生活感受,描写过于精细,被称为“微观小说”。以后的重要小说还有《告别双亲》(1961)、《逃亡的终点》(1962)。去世前完成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抵抗的美学》(1975, 1978, 1981),卷帙浩瀚,内容丰富,风格新颖,是他小说艺术的高峰。他的小说具有卡夫卡风格,后三部作品还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他的戏剧作品较之小说更为著名,重要的有写法国大革命的《马拉/萨德》(1964),揭露德国法西斯分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调查》(1965),反映越南战争的《论越南持久解放战争的来龙去脉》(1968),关于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在流亡中》(1970),描写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荷尔德林》(1971),以及根据卡夫卡同名小说改编的《诉讼》(1975)。这些戏剧创作多数取材于历史文献,被称为“纪实戏剧”(一译“文献戏剧”)或“舞台报告”。在艺术风格上,既汲取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又具有荒诞派戏剧的某些特征,被认为是德语戏剧的新发展。

魏斯的剧本《马拉/萨德》是英译本的缩写标题,它原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对让·保尔·马拉的迫害与谋杀,在德·萨德先生指导下由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剧团演出》,也有人根据剧本内容译为《马拉遇刺记》。该剧初稿完成于1963年,1964年首演并正式出版,接着在二十二个国家和三十多

家剧院演出，轰动国际剧坛。1966年被摄制成电影。作者自称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戏剧”。

这个剧本受布莱希特教育剧的影响，以戏中戏的结构，把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让·保尔·马拉（1744—1793）被谋杀的过程呈现于舞台，表现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同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出纪实剧，假托由萨德所写所导，演出地点是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演员都是该院病人，演出时间是1808年即马拉死后十五年。舞台上的观众是拿破仑皇帝治下的臣民，而舞台下面的是当代观众——即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居民，一个主题把三个时代串联在一起。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马拉。作者认为，过去某些史学家对马拉评价不公，把他写得凶恶可怕，嗜血好杀，许多暴行的责任都推在他身上。魏斯替马拉翻案，在剧中把他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颂扬。而萨德则是一个唯我主义者。剧中少女夏洛特·科黛以送信为名，将马拉刺死在他的浴缸中，基本上根据的是历史事实。评论家认为，这个剧本可以演成不同的模样，收到不同的效果，是一部多解性的戏剧。剧本广泛运用了对话、独白、评论、演说、歌唱、舞蹈、哑剧，以及现实与梦幻等多种表现手段，被称为“总体戏剧”。

君特·瓦尔拉夫（1942—）生于科隆附近布尔沙伊德一个工人家庭。1957年十年制中学毕业后当了书店学徒。1963年入联邦国防军服役，但他反对服兵役并进行了斗争，被认为是拒绝服役者。这次斗争锻炼了他的性格，并对未来产生了影响。1964年起他在福特、西门子、蒂森等一些大企业当工人，了解工厂和工人的情况，又当过一些杂志的编辑和记者。

瓦尔拉夫在书店工作时，开始练习写作，先在一些工会刊物上发表作品。他是在多特蒙德成立的工人文学团体“六一社”的成员。1970年，他和“六一社”中的左翼又分裂出来，成立“劳工界文学社”，亦称“七〇社”，提倡创作纪实文学。他擅长写报告文学，发表的重要报告文学集有：反映德国大企业中工人生活的《我们需要你》（1966），揭露西德社会一些违反宪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现象的《十三篇不受欢迎的报道》（1969），揭发豪富们生财之道的内幕的《你们在上面，我们在下面》（1973，与人合作），去希腊参加反对军事独裁政权斗争的《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在邻国》（1975，与人合作），化名汉斯·艾塞尔进入《图片报》当编辑并揭露该报内幕的《头条标题》（1977）和它的续集《诉讼的证人》（1979），陈述外籍工人在联邦德国遭遇的《最底层》（1985）。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视剧。

瓦尔拉夫是当代纪实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方面独辟蹊径。他把创作建立在亲身经历之上，因此他经常借助于乔装改扮，使自己能更接近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之后以亲身经历的自述写出揭露性的文字，为此他曾多次卷入诉讼的漩涡。但是他虽被控告，仍坚持认为：“人们只有乔装改扮才能揭露社会，人们只有欺骗和伪装才能发现事实真相。”瓦尔拉夫的作品描述准确，细节真实，语言简明，风格朴实，受到广大工人群众和社会底层的民众的欢迎。

长篇报告文学《最底层》于1985年10月出版后，在联邦德国引起轰动，立即成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创四个月发行一百八十万册的德国出版史上最高纪录。接着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出版，特别是在土耳其反响尤烈。

1983年3月，瓦尔拉夫改扮成土耳其人，化名“阿里”，在联邦德国各地打工。他在科隆郊区修过马厩，在农村打过零工，在鱼品加工厂清扫垃圾，

在街头摇手摇风琴卖艺，在快餐店卖汉堡包、擦桌子、扫厕所，在蒂森钢铁公司非法做工，甚至还为一家科研机构充当“自愿”药物试验者。“阿里”总是干最脏、最重的活，或者最有危险的工作，但得到的报酬最少。作者通过两年多的打工经历，以纪实的手法描述了外籍工人在联邦德国这个“福利社会”到处受人歧视和侮辱的遭遇，揭露了某些企业和个人以转雇非法就业的工人牟取暴利的违法勾当。

本书出版后引起西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纷纷呼吁社会要公正、平等地对待外籍工人，给予他们在联邦德国平等的生存权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等等。瓦尔拉夫从稿酬中拿出了一百万以上马克，为外籍工人设立“共同生活基金会”。为此，罗素道德法庭把瓦尔拉夫列为1985年的世界善人。

第七章 二十世纪奥地利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奥地利原来是德意志诸侯邦国中较为强大的一个，但在1866年对普鲁士和意大利战争中遭到失败后，国势每况愈下。被削弱了的奥地利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免于崩溃，便决定和国内最强大的民族匈牙利人妥协，于1867年与匈牙利的贵族阶级签订协定，将奥地利变为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二元”君主国——奥匈帝国。这个奥匈协定，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实行民族政策的支柱，即依靠在帝国西部的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来继续维护专制统治。

1879—1882年，奥匈帝国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二十世纪初，它不断扩充军备，并对巴尔半岛进行侵略扩张。对内则继续实行民族压迫，加紧封建剥削，因而不断引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它和德国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

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文学，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奥匈帝国的社会状况：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继续过着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享乐主义的生活；各民族劳动人民备受剥削和压迫，道路坎坷，生活艰辛，命运难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深表不满，但缺乏斗争的勇气，看不到前途，消极悲观，彷徨痛苦。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一样，受到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处于世纪转折时期同样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主义，流派纷杂，人才辈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德国文学。

当自然主义在德国盛行时，奥地利出现了“青年维也纳”派，又名维也纳现代派，约活动于1890—1900年间，它由一批作家和批评家组成。他们不是以左拉的自然主义为榜样，而是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作楷模。他们的哲学与艺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厌恶现实、鄙弃现实，而对现实的发展又感迷惑不解，于是逃向梦幻世界。他们否认现实是艺术表现的对象，在艺术上刻意求工，追求形式上的完美。“青年维也纳”派的代言人是赫尔曼·巴尔（1863—1934），他写过小说和戏剧，也写评论，当过编辑，但创作上的成就就不大。这派作家中有影响的是施尼茨勒（1862—1931）和霍夫曼斯塔耳（1874—1929）。施尼茨勒也是印象主义在奥地利的代表作家。他是德语文学史上最早运用“意识流”写作技巧的作家，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重要作品有剧本《阿纳托尔》（1893）、《轮舞》（1900）、

《贝恩哈迪教授》(1912)等,小说《古斯特少尉》(1901)、《通往自由之路》(1908)、《埃尔泽小组》(1924)等。霍夫曼斯塔尔也是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在奥地利的杰出代表之一(另一位是里尔克),他的创作表现了超时代的“永恒的”生与死、苦与乐的斗争,情节和人物都富有象征寓意,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诗选》(1903,1907)和诗体短剧多种。这派作家中较著名的还有阿尔腾贝格(1859—1919)、贝尔—霍夫曼(1866—1945)等。

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四十年,存在着“布拉格德语文学”。这是指布拉格松散的、没有组成正式流派的作家圈。这些作家出生在布拉格或住在布拉格或与布拉格有某种联系,用德语写作,是德语文化在布拉格的代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犹太人。布拉格德语文学反映了布拉格的历史和老城的神秘主义气息,以及布拉格德语作家所特有的孤独、压抑、焦虑、惶恐的心绪和表现主义的特点。这批作家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几乎没有什么反映,而在作品中更多关心的是普通人的命运。

布拉格德语文学存在的四十年里,涌现出一批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和评论家,总共约有三十余位,形成了强大的文学潮流,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重要代表有里尔克(1875—1926)、卡夫卡(1883—1924)、韦尔弗(1890—1945)、基施(一译基希,1885—1948)。里尔克的诗集《图象集》(1902)、《新诗集》(1907)和《杜伊诺哀歌》(1923),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1915)、《诉讼》(1925)和《城堡》(1926),韦尔弗的诗歌和小说作品,基施的报告文学集,在世界文坛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作家布罗德(1884—1968)是卡夫卡的挚友,正是通过他的文艺评论和坚持不懈的大力推荐,布拉格德语文学才享有世界声誉。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1916)、剧本《雷本尼——犹太人的公侯》(1925)、《卡夫卡传》(1937)等。小说家迈林克(1868—1932)是“青年布拉格”的核心人物,他以布拉格老城和犹太人居住区为素材创作的表现主义小说,曾获得巨大成功。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犹太假人》(一译《机器人》1915)和《绿脸》(1916)。小说家恩·魏斯(1884—1940)的作品中充满孤独、抑郁的心绪,重要长篇小说有《奴隶船》(1913)、《格奥尔格·莱塔姆——医生和杀人犯》(1931)等。布拉格德语文学中,重要的年轻一代作家有乌齐迪尔(1896—1970)、魏斯科普夫(1900—1955)、托尔贝格(1908—1980)、菲恩贝格(1909—1957)等。

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产生除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的、宗教的诸方面因素。当时的布拉格有很好的文学氛围和各种各样的传统:捷克的、德国的、犹太的、奥地利的,孕育了布拉格德语文学这样一个文化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战败,帝国瓦解,奥地利在人口和领土方面减少到原二元帝国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上述布拉格德语文学外,以维也纳为中心还有一批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表现主义从德国影响到奥地利,除布拉格的韦尔弗、布罗德、迈林克创作表现主义作品外,诗人特拉克尔(1887—1914)写了《孤独者的秋天》、《童年》、《夜之歌》等诗作,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忧伤情绪、梦境般的幻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被认为是奥地利

表现主义代表诗人。作家卡·克劳斯（1874—1936）的创作，在形式上也接近表现主义，其代表作大型戏剧《人类的末日》（1918—1919），是奥地利第一部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一次大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帝国的覆灭，奥地利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重要时期，产生了不少长篇小说探讨哈布斯堡王朝由盛到衰的原因，揭示奥匈帝国崩溃的过程。小说家穆齐尔（1880—1942）的长篇巨著《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小说家布罗赫（1886—1951）的成名小说、三部曲《梦游者》（1931—1932），小说家罗特（1894—1939）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和《先王墓室》（1938），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或者抨击帝国主义战争，或者揭露奥地利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弊端，或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存秩序持否定态度，或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没落发出悼亡的哀叹，在世界文坛上都有相当的影响。

小说家斯·茨威格（1881—1942）早年深受“青年维也纳”派和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后来他以心理分析为主要手法，创作了一批中篇小说和传记文学，在德语文坛上独树一帜。霍尔瓦特（1901—1938）的剧作和小说，讽刺和揭露资产阶级市侩小人的愚蠢和卑劣，剖析法西斯上台前的奥、德社会现实，有相当的深度和预见性；他把奥地利传统的“大众戏剧”推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高峰。

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攫取政权，特别是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许多著名的奥地利作家流亡国外，如弗兰茨·布莱（1871—1942）、布罗赫、费·布鲁克纳（1891—1958）、埃伦斯泰恩（1886—1950）、基施、穆齐尔、罗特、罗·诺伊曼（1897—1975）、乌齐迪尔、恩·魏斯、魏斯科普夫、韦尔弗、斯·茨威格等。其中有些作家如斯·茨威格，因看不到出路而自杀。大部分流亡作家投入了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奥地利同德国一样，全境划分为美、英、法、苏占领区，维也纳也为四国军队共同占领。但对奥占领是暂时的，早在1945年11月，就准许它举行了全国性的议会选举，组成政府。1955年10月，四国占领军全部撤走。奥地利成为“永久中立”的共和国。奥地利文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后，一方面继承战前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世界各国文学新的表现手法，进行艺术创新，揭开了新的一页。一部分流亡国外的作家陆续回国，一部分作家虽然没有回国，但他们在流亡期间写的作品，终于有机会在祖国发表，如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韦尔弗的《诗歌全集》和部分小说等。小说家多德勒尔（1896—1966）在战前就发表过诗集和长篇小说，战后五十年代接连发表长篇小说《斯特鲁德霍夫梯道》（1951）和《恶魔》（1956），展现一次大战前至二十年代末奥地利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和思想，被誉为“维也纳社会的编年史”。其他写历史小说的作家还有莱内特——霍勒尼亚（1897—1970）、居特斯洛（1887—1973）、布·布莱姆（1892—1974）、布龙格拉贝（1901—1960）等。流亡英国并加入英国籍的作家卡内蒂（1905—），早在1935年就在维也纳发表长篇小说《迷惘》，通过一个学者受迫害的故事，影射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状况。战后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对生、死、权力和群众的关系等哲学、人类学问题上，写下了许多文章、随笔、杂感、日记，赢得了世界声誉，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主要是战争、流亡、纳粹迫害犹太人、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以及战后的生活。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1921—）于1948

年发表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以现代派的手法描述了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姑娘在纳粹统治时期的不幸遭遇，震动了德语文坛。在创作风格上与她相近的尚有另一位女作家杰·埃布纳（1918—），她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黑白棋子》（1964），通过女主人公特蕾泽的经历，反映了1925—1955年间奥地利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上的迷惘与痛苦。此外，还有诗人兼小说家古腾布龙纳（1919—）、灿德（1923—1970）、弗里奇（1924—1969）等，他们的作品根据亲身经历描绘了战争残酷性和破坏性，反映了士兵的厌战情绪，同时也抨击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黑暗统治，揭露了纳粹罪行。诗坛上最有成就的诗人当推策兰（1920—1970）和巴赫曼（1926—1973）。策兰的《死亡赋格曲》把音乐形式移植到诗歌创作中，表现了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痛苦和死亡这一主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音乐性；他的重要诗集有《罂粟与记忆》（1952）、《从门槛到门槛》（1955）等。女诗人巴赫曼的代表性诗集是《延期付款的时间》（1953）和《祈求大熊星座》（1956），她善于表现死亡、爱情、离别、孤独等主题，诗歌形式多为自由体，手法新颖，寓意深刻，并且有存在主义倾向。这两位作家善于用隐喻和比喻来表达思想，让读者体会最隐蔽的感受，深受读者喜爱。

战后许多作家在语言上颇受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和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影响，在创作形式上追求标新立异，从事所谓“语言革命”，先后形成了维尔纳、格拉茨、萨尔茨堡三个文学中心。早在1952年，诗人阿尔特曼（1921—）和吕姆（1930—）、拜尔（1932—1964）、阿赫莱特纳（1930—）、维尔纳（1935—）等一起在维也纳结成“艺术俱乐部”，定期聚会，举办作品朗诵会和演唱会，向传统文学发动挑战。1958年这个团体正式定名为“维也纳文学社”，亦称维也纳派。其成员宣称要冲破资产阶级思想樊篱进行所谓“语言革命”；他们模仿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风格，自称为诗歌革新的先锋派，创作实验性的抽象诗、装配诗和方言诗，运用音响和图像手段，创造了所谓的听觉诗和视觉诗。其重要代表阿尔特曼于1958年出版的成名作、诗集《用一瓶黑墨水》，轰动了文坛。后来他又与阿赫莱特纳、吕姆合著方言诗集《霍森，罗森，巴》（1959）。到1964年，由于阿尔特曼长期旅居国外，吕姆去了柏林，拜尔自杀，“维也纳文学社”就自行解体。但与这个组织关系密切的诗人扬德尔（1925—），后来转向“具体诗”的创作，利用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区别，把词的语音和意义分离开来，重新组合，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代表性诗集有《语音和路易丝》（1966）、《人造树》（1970）等。

1959年1月“城市公园论坛”在格拉茨宣告成立。这个松散的文艺团体也称为“格拉茨派”。他们在成立纲领中宣称：“城市公园论坛”以探讨最新的表现形式为宗旨；并创办文学刊物《原稿》，专门介绍具有新的表现手法的作品。奥地利战后一批青年作家有不少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和这个刊物迈上文坛的。这派作家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中彻底否定传统形式，采用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表现手法，创作所谓“反戏剧”、“反小说”。其重要代表是汉特克（1942—），他的代表作有剧本《骂观众》（1966）、《卡斯帕尔》（1968），小说《大黄蜂》（1966）、《小贩》（1967）。此外，还有沃·鲍尔（1941—）、格·罗特（1942—）、图里尼（1944—）、容克（1946—）、格鲁贝尔（1947—）等一批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作家，特别是他们的戏剧创作是舞台上常演的剧目。

以上两派也称为“试验派”，他们与设在维也纳的以奥地利笔会中心为代表的“传统派”曾形成对立，后者拒不承认前者；直至1968年和1969年岁末，当时的奥地利总理和总统分别邀请了数百名作家去做客，“试验派”青年作家获得了与老作家相同的待遇。超脱于“试验派”和“传统派”之外的著名作家是贝恩哈德（1931—1989），他的作品都以疾病、死亡、孤独、心理变态为主题，以独特的手法开拓了新的领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严寒》（1963）、《精神错乱》（1967）、《修改》（1975），剧本《博里斯的节日》（1970）、《狩猎协会》（1974）、《英雄广场》（1988）等。

七十年代中期，萨尔茨堡的一批年轻作家创作了引起文坛关注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反映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英内霍费尔（1944—）的自传体三部曲《美好的日子》（1974）、《阴暗面》（1975）和《大写的单词》（1977），写他从一个农村妇女的私生子成为大学生的坎坷经历。沃尔夫格鲁贝（1944—）的《逍遥法外》（1975）和《男人的岁月》（1976）回忆了自己的学徒生活。其他还有阿曼斯豪泽尔（1928）、卡帕赫（1938—）、罗塞（1946—）等的作品。这些作家以个人生活经历为题材，表现普通人的命运，探讨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有些评论家称他们为“萨尔茨堡派”。

女作家弗里施穆特（1941—）、内斯特林格（1936—）、施魏格尔（1949—）、耶利内克（1946—）等的创作，以妇女和儿童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等主题，抨击旧的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束缚，谴责儿童在学校受到的古板、僵化的教育，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在当代文坛占有一定的位置。西默尔（1924—）是奥地利最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他既写揭露法西斯罪行的严肃作品，也写间谍、探案、爱情等消遣读物。他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拥有众多读者，并且大部分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二十世纪的奥地利文学人材辈出，丰富多彩，艺术形式流派纷呈，不断创新。七十年代末，维也纳、萨尔茨堡等地的一些年轻的日耳曼语文学家提出“奥地利文学”的口号，要求将奥地利文学与联邦德国文学区分开来，呼吁探索奥地利文学的民族性和艺术特色。

第二节 青年维也纳作家群

施尼茨勒

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医生家庭。他中学毕业后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1885年得医学博士学位。1893年自己开办诊所，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对继承父业当一名医生不感兴趣，后来干脆停止行医，专事写作，成为“青年维也纳”派的核心人物。他曾多次获得奥地利颁发的文学奖，是世纪转折时期奥地利的代表作家之

施尼茨勒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友情甚笃。他把心理分析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被称为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奥匈帝国在世纪转折时期呈现出表面的繁荣，而其背后是社会的没落，这种没落也影响到道德和品性。施尼茨勒的作品大都描写当时没落贵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对待爱情、婚姻、家庭、死亡等问题的态度和变态心理，特别是性心理题材占主要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也纳的社会风貌，暴露

了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荒淫生活、没落意识和腐朽文化。他的重要作品有剧本《阿纳托尔》（1893）、《儿戏恋爱》（1895）、《绿鹦鹉》（1899）、《轮舞》（1900）、《遥远的国度》（1911）、《贝恩哈迪教授》（1912）等，中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1901）、《卡萨诺瓦的归天》（1918）、《埃尔泽小姐》（1924）、《梦的故事》（1926）等，长篇小说《通往自由之路》（1908）。

施尼茨勒当过医生，对人的观察十分细致，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在描写时，往往把现实与幻觉、真实与假象融为一体，给作品蒙上一种朦胧、神秘的色彩。他通过这种手法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苦闷、彷徨、悲观、无聊、没落等情感。他是世界文坛上较早运用意识流——当时主要为内心独白——表现技巧的少数作家之一，1901年发表的《古斯特少尉》是这方面的杰作。施尼茨勒的创作既有印象主义的成分，又开创了意识流的先河，并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他是这个时期奥地利文学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

施尼茨勒的剧本《阿纳托尔》发表于1893年，是他的成名作。它是一出由七个场景构成的组剧，也可以说是七个互相联系的独幕剧。每个场景有二至三个人物，贯串全剧的中心人物是诗人阿纳托尔。剧本反映了阿纳托尔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体现了他所谓的“爱情不需要忠诚”的思想意识。这个作品批判了阿纳托尔对待爱情的轻浮态度，也是施尼茨勒在以后描写一系列类似题材的戏剧的开端。

施尼茨勒的《轮舞》（1900）是十场对话组成的喜剧，这个戏写了从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妓女到身为伯爵的贵族等不同阶层的十个人物，把他们男女之间道德败坏的关系和性欲前后的对话搬上了舞台。十个男女相互关连，类似一种轮舞。施尼茨勒有意不给人物取名，而只标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类型，因为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等级区别的。他要揭示的不是单个人的性格，而是典型的表现和态度。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揭露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和道德，特别是社会各阶层的虚伪、堕落和腐败。

1912年发表的五幕喜剧《贝恩哈迪教授》描写的是一场反犹丑剧。主人公贝恩哈迪教授是犹太人，某医院院长。他出于医学和人道主义等原因，不同意神父与一位垂死的病人进行宗教性谈话。后来病人去世。虚荣心严重、和院长有仇的副院长埃本瓦尔德利用这件事攻击为“伤害宗教感情”、“反天主教立场”，并进而向法院控告，还提出犹太人不得在公社会机构中任职的要求。贝恩哈迪教授被法院以“妨碍宗教罪”判处两个月监禁，还被迫辞去院长职务。但他却赢得了公众舆论的同情。他在监禁期满出狱时，意外地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康斯坦丁王子为了请他治病，只好恢复他的院长职务。贝恩哈迪获得道义上的胜利，一场反犹丑剧以失败而告终。

施尼茨勒是德语文学中第一位采用意识流写作技巧的作家，190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小说描写古斯特少尉去听音乐会，散场时，他去衣帽间取存放的衣服，一个胖胖的面包师抢在他的前面。两人有所争执，面包师握住了少尉的军刀柄，并骂了他一句“傻小子”。少尉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要是消息传开，他在军营里和军官中简直会无地自容、无法生存。于是这一晚他没有回去，漫步于大街上和公园里，脑子里翻来覆去流动着各种意识。最后决定第二天用手枪自杀。翌晨他从公园来到

常去的咖啡馆，忽然听说面包师已在夜里中风暴亡。少尉觉得如释重负，再也不会有人把他的丑闻传开去了，他不再想自杀了；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是一篇心理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在长达三、四万字的描写中几乎都是“内心独白”；大量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件、人物、词句、意象在古斯特少尉心中涌现，展示了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这篇作品对奥匈帝国军队内部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腐败以及贵族军官的虚荣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施尼茨勒也因此被认为有辱奥地利军队的荣誉，而被取消后备军医官的资格。

霍夫曼斯塔尔和其他维也纳作家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在奥地利的主要代表，出生于维也纳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银行家。他自幼天资聪颖，十六岁时即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显示了创作才能，被称为“神童”。1892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和语言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专业作家。他曾作为剧作家随剧团遍游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和希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为后备役军官，1916年随使团去北欧和瑞士执行任务，战后继续从事创作。1929年7月15日逝世。

霍夫曼斯塔尔也是“青年维也纳”派的重要作家，他一生受尼采、马赫（1838—1916）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同时又得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因此在思想和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矛盾。1891年他在维也纳结识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深受其唯美主义思想的感染，不少诗歌都是在格奥尔格主编的《艺术之页》上发表的；他是“格奥尔格派”的重要成员（1905年后和格奥尔格的关系中断）。在1890—1899年的早期诗歌和剧作中，他在艺术上追求优美、典雅，作品富有寓意性和象征性；内容上脱离现实，抽象的生与死、苦与乐的矛盾以及探讨“生命”问题是他作品的主题。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短诗剧《昨天》（1891）、《提香之死》（1892）、《傻子与死神》（1893），以及汇集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诗选》（1903）。1900年后，他逐渐改变唯美主义倾向，同时对社会现实感到恐惧和厌恶；他逃向过去，试图把人道主义传统和基督教学说结合起来。这时他主要创作戏剧，重要剧本有《埃勒克特拉》（1903）、《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1906）、《耶德曼》（1911）。1909年开始，他与德国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1864—1949）合作写了许多歌剧脚本，著名的有《埃勒克特拉》（1909）、《玫瑰骑士》（一译《花花公子》1911）、《没有影子的女人》（1919）和《阿拉贝拉》（1933）。后期的重要剧作有喜剧《困难的人》（1921）、诗剧《萨尔茨堡世界大舞台》（1922）和悲剧《钟楼》（1925）。

他的散文作品——包括小说、信札等也很有价值，短篇《第672夜的童话》（1904）是德语小说的杰作。此外他还编选了《德语小说家》（1912）、《奥地利文库》（26卷，1915—1917）和《德语读物》（1922—1923），这些选集受到人们的称道。

1911年发表的《耶德曼》是一出宗教神秘剧，但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剧本写富翁耶德曼在世为富不仁，上帝十分气愤，命死神去捉拿归案，清算他的罪孽。经过一番曲折，耶德曼终将随死神去上帝处归案。但他仍念念不忘金钱。当他打开钱箱时，金钱从箱中向他扑来，并嘲笑他，说他占有了金钱，却受着金钱的控制，金钱才是耶德曼的主人，将永存于世。这时，他过

去做过的一点儿“好事”告诉他，愿在审判日为他出庭作证。他又从母亲的早祷感到人生要有“信仰”。于是“好事”和“信仰”陪同他向坟墓走去。魔鬼要惩罚他摄走他的灵魂，但“信仰”坚定地拒绝，最后耶德曼以他的死求得了上帝的宽恕。“耶德曼”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每个人”，剧中人物只有象征性的名字，以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象，每个人成了金钱的奴隶，只有“好事”和“信仰”才能拯救人的灵魂。这出戏后来对表现主义戏剧影响很大。

“青年维也纳”派的代言人是赫尔曼·巴尔（1863—1934），他是作家兼文学评论家，早年在维也纳、格拉茨和柏林等地的大学攻读语言学、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889年在柏林任《自由论坛》主编、菲舍尔出版社编辑。1894年起在维也纳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主编《时代》周刊，成为“青年维也纳”派的实际领导人。1906年后他去柏林德意志剧院工作，以后定居在慕尼黑。他曾著有剧本《母亲》（1891）、《维也纳妇人》（1900）、《黄色的夜莺》（1907）和喜剧《音乐会》（1909）等，长篇小说《升天记》（1916）、《一群暴徒》（1919），以及文艺评论多种。不过，巴尔的创作成就不是十分突出。

阿尔腾贝格（1859—1919），“青年维也纳”派的另一位作家，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和医学，但没有读完。后来做过书商，与“青年维也纳”派作家交往，自己也开始文学创作。189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速写集《我之所见》，运用小品文、短论、速写、格言等形式，阐述了世纪转折时期的复杂心绪。后来他发表的作品主要是散文集，重要的有《生活的童话》（1908）、《小生命的画卷》（1909）、《收获》（1915）、《生活本身》（1918）《我的垂暮之年》（1919）等。他的作品主要是描写各阶层人物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天地他观察得更深入细致。他的语言含蓄，不乏嘲讽性的警句；在风格上采用“心灵的电报”体，简明扼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坛上对他的兴趣日增，把他看作有成就的批评家，今天“实验散文”的先驱。

贝尔——霍夫曼（1866—1945）也是“青年维也纳”派作家。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律师家庭。1886—1890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曾在柏林和维也纳担任过导演工作。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他从维也纳逃跑，经瑞士流亡到美国。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支持者。1945年9月26日在纽约去世，从1946年起该地成立有“贝尔——霍夫曼协会”，是美国犹太人的一个重要组织。贝尔——霍夫曼在维也纳时与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巴尔等过从甚密，他们常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他的早期作品、长篇小说《格奥尔格之死》（1900），采用内心独白和联想的散文形式，具有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特征。1904年发表悲剧《封·夏洛莱斯伯爵》，颂扬“忠诚”，以心理描写见长，人物性格鲜明，是一部新浪漫主义戏剧，演出后获得文坛好评。后来的剧本大多取材《圣经·旧约》故事，如《雅各之梦》（1918）、未完成的三部曲《大卫王的历史》（第一部《青年大卫》1933年完成，其余两部《大卫王》和《大卫之死》未完成），后者借用传说中的古希伯来王国第一任国王的故事，鼓吹犹太复国主义。他的其他作品还有诗集《米尔雅姆的催眠曲》（1919），以及关于莫扎特和歌德的演讲或论文等。

第三节 布拉格德语文学

里尔克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1875—1926）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重要诗人，也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铁路高级职员，母亲是皇家顾问的女儿。里尔克十一岁时父母离婚，他被送入军书学校学习。这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抑郁、脆弱、孤僻、敏感的性格。四年后因体弱多病离开军校。1891年入林茨商业学校，他对经商不感兴趣，不到两年又休学。1895年至1896年在拉格大学学习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他从1894年开始进行诗歌创作；早期作品有《生活与诗歌》（1894）、《祭神》（1896）、《梦幻》（1897）等诗集，情调缠绵，富有波希米亚民歌风格。

1896年底，里克在慕尼黑结识出生俄国的女作家萨洛美（1861—1937），深受她的影响，并在1899、1900年与她结伴两次去俄国旅行，开阔了视野，还会见了列夫·托尔斯泰。这时他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完成的诗集有《图象集》（1902）、《祈祷书》（1905）等。诗篇感情炽烈，语言精练，富有音乐性；体现了作者的泛神论思想和世纪转折时期的矛盾心绪。1901年，里尔克和女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第二年旅居巴黎，结识大雕塑家罗丹。1905—1906年，他在罗丹处当了八个月秘书，学习这位艺术大师勤奋持久的工作、耐心细致的观察自然和社会的精神。这时他的诗歌风格又有了变化，从主观抒情、流动的、音乐的诗，变成直觉形象、凝固的、雕塑的诗。这些诗作称为“咏物诗”或“观察诗”，收入《新诗集》（1907）和《新诗续集》（1908）中。

1912年，里尔克应一位女公爵之邀去意大利亚德里亚海滨的杜伊诺作客，开始创作《杜伊诺哀歌》（1923）。这时他漫游西班牙，但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他感到悲观失望。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慕尼黑，1915年被征入伍，在维也纳战事档案馆服役。1919年他迁居瑞士，在一座古堡中完成《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1923）。这两部组诗集（前者10首，后者55首）是里尔克痛苦思索的产物，他在孤独、迷惘中坚持不懈地探索人生的意义。诗集中充满象征性的比喻。

在创作诗歌的同时，里尔克还创作了不少小说。《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1899完成，1906出版），既是一篇传奇小说也是一篇歌谣体散文诗，抒发了对英雄业绩的向往。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1910）带有自传色彩，表现了对人生的恐惧感。他还写有一些诗论。1926年12月29日他在瑞士的蒙特罗逝世。

里尔克一生漂泊。他生活在新旧时代转换的世纪之交，聪颖的资质、敏感的性格和痛苦曲折的经历，都凝聚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的作品充满孤独、感伤、焦虑、惶恐的世纪末情绪，而在艺术上又有不少探索和创新。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艺界和知识界的一位精神代表，对二十世纪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精通多种外语，曾翻译过英、法、意、俄等国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巴雷特·勃朗宁，纪德，瓦雷里等的诗作。

有的学者从编狭的角度探讨布拉格德语文学，把里尔克排除在外，理由是：他虽然出生于布拉格，但不是犹太家庭；他具有浓厚的贵族传统，大部分时间出外旅行，在布拉格呆的时间不多；他政治思想保守，用恩赐观点从

上而下看待捷克人民，并且有反犹太主义思想。这些论点有一定道理。但是里尔克毕竟出生于布拉格，用德语写作。他并不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祖父是北波希米亚一处小庄园的管家，父亲是铁路局高级官员，由于父母很早离异，他从小没有故乡和家庭，因此常外出旅行希望找到一个第二故乡，但并没有如愿以偿。他是一个深沉的孤独的人，政治倾向一直比较淡薄，说不上有什么严重的保守观点和反犹太主义思想，相反的却保持着一种无条件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宽容，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而最主要的是他的作品饱含波希米亚的风味和布拉格的气息，他直接描写布拉格的诗歌至少有十一首之多。诚然，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作家多数是犹太人，但并不能说不是犹太作家就不应归入布拉格德语文学的范围。实际上，里尔克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先驱。

在里尔克众多的诗歌中，1903年发表的《豹》，是他诗歌成熟期的代表作。全诗如下：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象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象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冯至译）

据说，里尔克写这首诗时在巴黎植物园（有些地方的植物园中包括动物园）中的豹栏前观察了三天。诗人对豹的观察、描写可以说是到了绝顶的境界。作为猛兽的豹长期关在栅栏内，已被铁栏所驯服，“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诗人从对豹的描写中探索了人生的一些复杂思绪，特别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包括里尔克自己）在世纪转折时期看不到出路、前途，一种迷惘彷徨苦闷的心情。这是诗人深入发掘自我的结果。本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讲究，形容词的选择搭配煞费苦心。全诗韵律和谐，富于音乐性，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里尔克的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于1904年开始创作，1910年发表。小说的主人公布里格有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因此这部小说具有某种自传色彩。

布里格是一个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原系名门出身，但父母早亡，家道中落。他只身漂泊到巴黎这座大都会里，住在大学生区，过着贫困的生活。他要写诗，渴望接触美好的事物，祈求有一个新别墅以便静心创作。但理想无法实现。他患病在床，回忆往昔美好的日子，回忆童年的生活、母亲的去世、外祖父的农庄和宫殿般的住房。然而，巴黎社会的丑恶现实使他大失所望。作者通过布里格的眼睛，揭露了巴黎的贫穷、病态和精神堕落，表现了对人生的恐惧感（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提出了为后来的存在主义文学所力图阐明的现代人的重大主题：存在的价值以及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讨。在艺术形式上，它没有连续的情节线，而是采用记事的手法，日记、

随感、回忆、描写、叙述融为一体。时空关系颠倒，童年生活的回忆、当前现实的描述和对未来的沉思幻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散结构”整体。所以，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是早期的“现代派”小说。

卡夫卡

布拉格德语文学中，除了里尔克外，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是最重要的作家。他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1882—1941）、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一起，已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一个百货批发商。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教育。1901年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次年10月，进入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服务；1908年，又受职于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直到1922年7月因病离职。由于卡夫卡染上肺结核病，几度疗养不见痊愈，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年仅四十一岁。

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和易卜生的戏剧。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与同学马克斯·布罗德结为知交。他们两人经常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1909到1912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卢加诺、米兰、魏玛等地参观游历。这时，德国作家赫勃尔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对卡夫卡很有吸引力。以后，他对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发生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以上这些作家、思想家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都有相当的影响。

卡夫卡与进步的捷克知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但保持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沙文主义，对战争持消极态度。卡夫卡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性格上充满矛盾，从他在1910到1923年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孤独、苦恼、自怨自艾的种种矛盾之情，他把自己的创作视为“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描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后来并且是和病魔斗争情况下进行的。他的作品并不要求发表。卡夫卡逝世时，他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在遗物中找到要求焚毁遗稿的信。但是，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有焚毁他的手稿，而且把能够搜集得起来的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包括草稿和片断、日记和书信，统统整理出版。1925、1926、1927年分别出版了《诉讼》（一译《审判》）、《城堡》和《美国》三部长篇小说；1935至1937年出了六卷集，1950至1958年又出了九卷全集（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作品只占其中一卷篇幅）。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在研究者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议。

西方世界所以对卡夫卡发生浓厚的兴趣，看作是“新发现”，这与西方社会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恐怖，战后的动荡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所谓“现代人的困惑”；人们也从卡夫卡小说的多解性中，去认识自己和人类社会。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

卡夫卡流传下来的小说，除上面提到的三部长篇外，还有七十八篇短篇（其中生前发表过的四十四篇），著名的有《判决》（1913）、《司炉》（1913）、《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19）、《饥

《饥饿艺术家》（1924）、《中国长城建造时》（1931 发表）等。卡夫卡的长、短篇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揭示了一个无形中折磨着人的“异化”世界；从主题思想上看，可分为四类：（1）揭露社会现实的荒诞、非理性，人的自我存在的痛苦和原罪感。（2）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3）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许多是小人物）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情绪和无能为力的恐惧感。（4）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反对异族侵略，在某些方面还反映了对祖国、对犹太民族的失望情绪。这些作品是通过“卡夫卡式”（一译“卡夫卡风格”）的形象塑造和多层含义的隐喻来表现的，往往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他的许多小说，所写的中心事件是荒谬的，但反映的本质却是真实的。

卡夫卡的小说，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思想内容怪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他摆脱了传统小说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为后来的现代派文学开创了先河。他的小说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独创性、象征性、荒谬性、冷漠性和意识流。此外，卡夫卡小说的结构都比较紧凑，文字简洁流畅。他往往通过富有实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探讨人生哲理，揭示社会矛盾，收到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卡夫卡的作品是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之外展开的，它包容了相当宽广的历史范畴，既具有寓言的色彩，又带有“先知式”预言的内容。现代主义的许多流派都纷纷和卡夫卡攀亲结缘，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荒诞派和新小派遇到了自己的同类，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见到了自己的先辈。

卡夫卡一生中还写了不少书信，有写给家人的，有写给好友布罗德的，也有写给女友费丽丝和米伦娜的，尤其是 1919 年写的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致父亲》更为著名。他还长期写日记。他的书信和日记，既是研究作者思想、生活和创作的文献资料，也是优秀的独特的文学作品。

卡夫卡于 1915 年发表的《变形记》是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感到十分恐慌，担心失去工作，也无法见人。他的父母和妹妹见到这个情景，非常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她也感到厌倦了，格里高尔的饮食就没有保证，房间也越来越肮脏。由于少了格里高尔的工资收入，家里人只得另找工作谋生，并招来三位房客，以增加收益。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出来，暴露在房客面前，全家大乱，房客吵着要退租，妹妹表示无法忍受要把它弄走。格里高尔当晚在孤独中死去，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形记》表面看来似乎荒诞不经，但细节描写十分真实，内涵非常深刻，成为现代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文字简洁，语调冷漠。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超然的语调和简短的句子使平庸显得可怕，又使可怕变得平庸，以激起读者的理性，从而去思考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诉讼》于 1914 年开始创作，1919 年基本完成，但

生前没有发表。他 1924 年去世后，布罗德于 1925 年首先出版的就是这部作品；以此为先导，卡夫卡的作品在西方文坛愈来愈受到重视，卡夫卡的声誉也愈来愈高。

《诉讼》主人公约瑟夫·K 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在三十岁生日的早晨，突然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 K 的被捕仅仅限于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后来法院曾传讯过他一回，但从来没有公布过 K 的罪行和罪名。K 也能依然自由行动，照常上下班，同过去一样生活。K 起先对被捕非常愤慨，曾当面讽刺看守和监督。第一次开庭时，他在法庭上大声谴责司法制度的腐败，揭露官吏的贪赃枉法，并决定根本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事实上他总忘不掉这件事，内心压力和威胁越来越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他自动上法庭去探听，参观设在顶楼上的法院。K 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对银行里的职务感到厌恶，整日为自己案子奔忙。但聘请的律师除了用空话敷衍外，几个月写不出一份抗辩书。K 又向一位为法官画像的画家求教，也没有什么帮助。最后 K 在教堂碰见一位神父，这神父讲了一个“在法的门前”的寓言，告诉 K 说，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在 K 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他被两个穿大礼服的人架到郊外，用屠刀戳死。K 最后说：“象一条狗似的！”

这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展示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但它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揭露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的司法制度。作者运用象征的、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发展变化，别具匠心地达到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诉讼》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最能代表卡夫卡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所谓“卡夫卡式”，表达的是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处境，《诉讼》真是描写这种状况的典型作品。

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成书于 1922 年，同《诉讼》一样，最富有卡夫卡的特色。小说主人公 K 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经过长途跋涉，从家乡赶来城堡，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K 先在附近村子里暂时住下，但城堡就在眼前，却可望而不可即，永远进不去。主管 K 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他通过信差给了 K 两封内容充满矛盾的信。K 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始终达不到目的，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的一切联系。小说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K 将“奋斗至精疲力竭而死”，在弥留之际，城堡传谕，准许 K 在村中居住和工作，但不许进城堡。

如果说，《诉讼》描述的是“法”，那么《城堡》描述的主要是“政”。在《城堡》中，卡夫卡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权的通病，诸如：封建专制压迫，社会等级森严，官僚荒淫腐化，机构庞杂无度，人间世态炎凉，人民苦难深重等等，其中特别是城堡，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它阴森地窥视着广大黎民百姓，给人民构成致命的威胁。“城堡”实际上成了“异化”世界的代表。当然，对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解说得详详细细的，它容许有种种解释，它确实给了读者一个新的天地。

布罗德和韦尔弗

马克斯·布罗德（1884—1968）是卡夫卡的挚友，奥地利作家。1884 年 5 月 27 日出生于布拉格一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

博士学位。后来在布拉格邮政局当律师，又是几家报刊的戏剧和音乐评论家。他是卡夫卡的中学和大学同窗，卡夫卡的作品所以能陆续发表，流传于世，主要是因为布罗德的工作。同时他也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中流砥柱，靠着他不懈的努力和宣传推荐，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作家得以脱颖而出。

布罗德很早就进行文学创作，早期作品有颓废和追求奇特的倾向，如长篇小说《死亡属于死者》（1906）、《妓女之训练》（1909）、《一个捷克女仆》（1909）等。后来他也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作品中具有表现主义的倾向，主人公大多陷于追求肉欲生活和精神反抗的矛盾之中，这时期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弗兰齐，又名二等爱情》（1922）、《被追求的女人》（1927），剧本《雷本尼—犹太人的公侯》（1925）等。他的这些作品都比较怪诞、晦涩。艺术上较成功的是历史小说三部曲《为真理而斗争》：第一部《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1916），第二部《犹太人的君主罗伊贝尼》（1925），第三部《伽利略在囚禁中》（1948）。这三部小说用宗教观点分别阐述了三位著名人物的生活道路，但在内容上并无联系。

1939年捷克为纳粹德国吞并，布罗德逃离布拉格去巴勒斯坦，开始时任特拉维夫一个剧院的戏剧顾问，后来专心创作，作品内容也进一步转向宗教主题。重要的有长篇小说《我主耶稣》（1952）和《可怜的西塞罗》（1955）。1953年他还把卡夫卡的《城堡》改编成话剧上演。他的自传《反叛的心灵》（1957）和《迷雾中的青年时代》（1959），描写了在布拉格度过的青年和成年时期丰富多彩、充满友情的生活。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后，布罗德是搜集、整理卡夫卡著作和遗著的热心人，也是当时唯一的出版人。在他的努力下，三十年代出版了卡夫卡著作六卷集，五十年代出版了九卷全集。与此同时，他对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论著，重要的有《弗兰茨·卡夫卡传》（1937）、《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1948）、《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和解脱》（1959），以上三个专著于1966年合集，书名为《论卡夫卡》。1951年，他又发表论文《作为路标人物的弗兰茨·卡夫卡》。毫无疑问，布罗德的关于卡夫卡的论著，确实提供了关于卡夫卡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但是也应该指出，布罗德的论著更多的是从民族和宗教的角度（犹太主义），以宽恕和严惩两个极端，对卡夫卡的生平和创作进行解释，就卡夫卡作品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则比较少。尤其是在后期，布罗德拒绝接受文学研究中的新趋势，观点上保守、僵化，曾遭到同行的批评。1968年12月20日，布罗德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逝世。

弗兰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布拉格德语文学重要作家。他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与布罗德、卡夫卡友情甚笃。中学毕业后在莱比锡和汉堡大学学习。1911至1914年在莱比锡和慕尼黑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任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军队服役，后来在维也纳战时新闻社工作，继而成为专业作家。二十年代曾去意大利、埃及和巴勒斯坦旅行。1938年奥地利为纳粹德国吞并，他流亡法国；1940年与亨利希·曼一起经西、葡两国去美国。1945年8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韦尔弗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都有建树。他是在表现主义影响下开始创作的，早年出版的诗集有《世界之友》（1911）、《我们是》（1913）、《彼此》（1915）等，这些诗歌大都属于主观表现式的，不是呼喊式的；充

满了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歌颂人的善良本性，渴望人类不分种族、国家和信仰而亲密团结，憧憬美好的未来。《致读者》一诗中有这样的诗行：

人啊，我的理想就是做你的亲人！
任你是谁——是婴孩，黑人还是杂技演员，
是唱歌的女仆，还是从木排上仰望星星的放排人，
是飞行员还是士兵。

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是你的，我是大家的，我们亲如兄弟！
那就别存心跟我作对！
啊，要是有一朝一日我们
彼此张臂拥抱，那该多好！

他的诗歌表达了普遍的人间之爱，语气亲切、平缓，富有音乐性。但在某些诗歌中也担忧人类的厄运。

韦尔弗的剧作多以反战和向往人类大同为主题，重要剧本有《特洛伊妇女》（1915）、《镜中人》（1920）、《尤阿雷茨和马克西米利安》（1924）等。

韦尔弗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他一生写了十部长篇小说，还有两部未完成稿。在《凶手无罪，罪在死者》（1920）、《威尔第，歌剧小说》（1924）、《中学时代》（1928）、《穆萨·达赫的四十天》（1933）、《贝纳德特之歌》（1941）等小说中，他把下级军官、普通的音乐家、低级法官、受压迫的亚美尼亚人、捷克女佣、布拉格小市民、胡斯信徒等作为他作品的主人公，批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谴责野蛮的民族主义。这些小说充满人道主义精神。韦尔弗在流亡后期世界观上有重大变化，他表现出悲观和抑郁情绪，从公开的反战逃避到宗教神秘主义中去，由犹太教皈依天主教。1946年作为遗著发表的长篇小说《未出世者的星座》，描写想象中的遥远的后代那种没有贫困、丰衣足食的生活，充满宗教乌托邦思想，表达了“理想的天主教教义”，是一部“乌托邦旅行小说”。

在以上这些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穆萨·达赫的四十天》。该书通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残酷压迫亚美尼亚人的故事，揭露了1915—1916年土耳其政府的亚美尼亚政策，以此来影射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这部小说既有强烈的战斗性，又有感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猛烈地抨击了种族主义和屠杀人民的罪行。由于小说发表的时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因此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第四节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家

克劳斯和穆齐尔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地利文学，涌现了一批在世界文坛上卓有声誉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探讨了哈布斯堡王朝由盛到衰的缘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存秩序继续持否定态度，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表示出严重的忧虑。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接着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作家纷纷流亡国外，并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也有一些作家对反法西斯的前途消极、悲观，最后以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卡尔·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作家，也是一位社会批评家，生

于波希米亚的吉钦，父亲是造纸厂主。他在三岁时就迁居维也纳，在那儿上小学、中学。后来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但几个学期后他就退学去当演员，并为一些报刊写稿。1899年创办文学杂志《火炬》，这杂志一直办到1936年；开始时合作者有剧作家韦德金德、诗人李利恩克龙、散文家阿尔腾贝格和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等，1911年后主要由他独自撰稿、组稿。他的文章

尖锐泼辣、讽刺性强，在维也纳受到反动势力的憎恨和反对。他毫不犹豫，与他们进行论战。在他的文学政论、杂文、短诗和警句中，抨击资产阶级报刊的堕落和谎言；揭露维也纳社会生活中的奸诈舞弊、伤风败俗、精神空虚；批评“假革命”的表现主义，等等。因此，他当时就以激进的社会批评家著称。克劳斯一方面批评表现主义，但他的剧作颇接近表现主义。他的代表作、巨型戏剧《人类的末日》（1918—1919），长达二百二十场，全部演出要十几个小时。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讽刺和揭露政客、投机商、将军、报刊编辑，乃至德皇威廉二世，指责他们是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人，同时也反映了德、奥两国的腐败及战争中的凄凉景象。这部戏在舞台上只演出过片断，但后来摄制成电影。他的另一剧本《文学或拭目以待》（1921），讥讽韦尔弗等表现主义文学家的假革命面孔（这里有他的偏颇之处）。剧本《不可战胜的人们》（1928），描写维也纳工人阶级1927年7月的起义，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的阴谋诡计。克劳斯还改编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内斯特罗依的戏剧多种。他的诗集《箴言诗》（1927）、《时代的诗篇》（1930）和杂文《中国长城》（1910）、《文学与谎言》（1929）等都很有特色。在著名的评论集《第三个瓦尔普吉斯之夜》（1933年编，后因种种原因1952年才出版）中，他有一篇文章就公开抨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克劳斯在晚年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含恨沉默，1936年6月12日在孤寂中去世。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出生于克拉根富特一教授家庭，祖上是贵族。少年时进军事学校学习，后来在布尔诺大学学习机器制造。1902—1903年任斯图加特工学院助教。1903年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逻辑学和实验心理学，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后任过图书馆员、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在意大利前线当军官。1918年底至1922年，他在政府机构当了几年官员，1922年后成为专业作家。有一个时期他在维也纳和柏林两地从事戏剧评论工作。1938年流亡瑞士，先在苏黎世，后去日内瓦，1942年4月15日逝世。

穆齐尔的文学作品不是很多，重要的有早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1906），描写他青少年时代在军事学校的生活，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揭示了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军校学生身心交困的境遇。192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三个女人》，包括三个传奇性的短篇，通过现实和梦幻相交叉的手法，描述了三个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女人的命运。穆齐尔的大部分创作时间用于恢宏巨著、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第一、二卷1930—1933，第三卷1943）。这部小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的社会面貌，以及各种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已有近一千六百页的篇幅。小说以书信和杂文为基础，作者试图以此开辟小说创作的新途径。

三卷集《没有个性的人》着重描写1913—1914年间奥匈帝国首都维也

纳的情景。这时，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定于 1918 年庆祝他执政三十周年，借此机会以显示帝国的力量；奥地利不甘示弱，也决定这一年庆祝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执政七十周年。这就是两个争权的国家在 1918 年准备采取的“平行行动”。奥地利为了举行这一活动，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专事筹备工作。小说主人公乌尔利希是有名望的法学家的儿子，他曾怀有做一番事业的理想，想当军官、工程师或数学家，但都没有成功。他感到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已无秩序可言，人只是一种物质材料，自己也成了没有个性的人。这时他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秘书。作为秘书他必须与维也纳的上层人物和各个机构进行接触。他发觉各界知名人士（包括政治家、将军、大资本家、大作家等）虽有采取这“平行行动”的愿望，但他们却找不到这一活动的指导思想，提不出一个指导性的口号。他们都想从这一行动中获得各自的利益，因而勾心斗角，根本不可能采取统一的行动。作者所描绘的奥地利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意识能统一的分裂的奥地利，人们都已没有了“个性”，一切观念也失去了是非标准，陷入“相对主义”。乌尔利希最后对事物既定的见解和评价尺度都表示怀疑，惶恐不安。

穆齐尔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目睹奥地利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弊端，他在小说中以嘲讽的笔触描写了这种现象。小说通过主人公乌尔利希这个“没有个性的人”，反映了世纪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剖析了“卡卡尼亚”——即奥匈二元君主国后期的种种问题，揭示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奥两国在 1918 年都没有庆祝王朝的执政，而是敲响了灭亡的丧钟。作者在先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受到文坛的重视，但五十年代后却引起广泛注意，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小说革新家。”

斯·茨威格和赫·布罗赫

斯特凡·茨威格（1881—1942），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大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入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罗曼语文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04 年后他去欧洲各国、北非、印度、北美等地参观游历，在法国结识罗曼·罗兰和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去瑞士从事反战活动，呼吁和平。二十年代曾去苏联访问，结识高尔基。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于 1934 年 2 月流亡英国，1940 年到巴西定居。后来由于对前途悲观绝望，于 1942 年 2 月 23 日同妻子一起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寓所自杀身亡。

斯·茨威格早在大学学习时，就进行文学创作，出版诗集《银弦》（1901）、《早年的花环》（1906）。这些诗歌具有新浪漫主义的倾向。后来他深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在作品中着力描写人的心理活动和表现情欲的力量。1911 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7 年发表取材于《旧约》的反战剧本《耶利米》。他最成熟的作品大都是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完成的，这个时期他出版了中篇小说《恐惧》（1920，1925 改写）和中篇小说集《马来狂人》（1922），《感情的混乱》（1927）。这些作品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感人的人物形象；语言优美，情节动人，并有社会批判精神，深受读者喜爱。短篇小说集《人生的际遇》（1927）原为五篇，1936 和 1943 年两次再版扩充为十二篇，以小说体裁记叙具有历史意义的史实，内容带有传奇色彩，描写十分生动。

斯·茨威格写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富贵梦》，作于 1931—1935 年，生前没有发表，后人根据他的遗稿整理于 1982 年出版，描写出身微寒的

少女克丽丝蒂娜由于偶然机会跻身上层社会，但好景不长，富贵梦破灭又被逐出的故事。另一部是《心的焦躁》（一译《爱与同情》1938），描写一个年轻的军官与瘫痪的富家少女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奥匈帝国灭亡前的社会状况。

斯·茨威格热衷于传记著作，他曾说过：“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也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原故。”他重要的传记文学有：《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也夫斯基》（1920），《罗曼·罗兰》（1921），《同恶魔作斗争》（1925）写三位患有精神病的天才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的生平，《三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28，《精神疗法：梅斯默尔、贝克——艾迪、弗洛伊德》（1931）；还有描述政治家和贵族的传记文学：《约瑟夫·福煦》（1929）、《玛丽·安东内特》（1932）、《玛丽亚·斯图亚特》（1935）等。

斯·茨威格在自杀前的1941年，写下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1943出版）和自传《昨天的世界》（1944出版），沉痛地向世人告别。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重要作品，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一艘从美国开往巴西的客轮上，有位世界象棋冠军，他十分高傲，目中无人。当大家知道他是象棋冠军时，一位百万富翁鼓动一个工程师与他弈。有位名叫B博士的乘客在旁指点工程师，竟打败了象棋冠军。原来B博士是维也纳的著名律师，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关在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偶然的机，他得到一本象棋大师的一百五十盘棋局集锦，便在房间里按棋局与自己弈。这样长年累月脑中装满棋局，竟然“象棋中毒”，患了精神分裂症。为此纳粹释放了他，他就流亡到国外。第二天，B博士应象棋冠军的要求与之弈，讲明只下一盘，结果他胜了。接着对方要求再下一盘，B博士违背医嘱欣然同意，正下棋子时，他变得极度兴奋慌乱起来，他感到马上要犯“象棋中毒症”，病情发作起来无法控制，便中途站起走了。象棋冠军还为此感到可惜。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心理小说，描绘了由于纳粹迫害而引起的精神饥饿，控诉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既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又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曾三次拍成电影。

赫尔曼·布罗赫（1886—1951）出生于维也纳一犹太纺织工厂主家庭。早年在科技工业院校学习工程技术和纺织。1908年继承父业当了工厂主直至1927年企业倒闭。1928—193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数学、哲学和心理学，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三部曲《梦游者》（1931—1932）。这部作品通过帕泽诺夫这个容克军官在婚姻问题上的陈腐观念，莱茵地区的会计埃施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投机商人胡古恩璠不顾一切地追逐利润和感官享受，说明他们都是一些梦游病患者，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世界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奥匈帝国和威廉帝国逐渐衰落的过程。1935年起布罗赫成为专业作家。

1938年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他被捕，后来由于国外朋友的营救才被释放。接着流亡到美国，在一些学术机构工作，研究群众心理学。1950年被耶鲁大学聘为德国文学教授，同年还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1951年5月30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他留下许多未完成的遗稿，现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

《维吉尔之死》（1945）是布罗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描写古罗马诗人

维吉尔在临死前十八个小时，对艺术真实性及其意义产生的怀疑和失望心情，实际探讨的是艺术和艺术家的价值和作用问题。诗人维吉尔已患重病，他随罗马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乘船由雅典返回意大利。他住在行宫，在漫长的黑夜里，回顾自己的一生。维吉尔认为自己既给人类带来了鼓舞和力量，也对人类的精神起了麻醉作用；他创作的美脱离了现实生活，没有达到艺术的伟大目标，更没有为铲除奴隶制度作出贡献。他要求人们焚毁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手稿，因为这时他认为文学艺术只不过是获得虚荣的手段。他的两个朋友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来奥古斯都也指责他出于嫉妒而不愿献出自己的作品。他没有办法只好交出手稿，委托两位朋友予以出版，这部史诗才得以保存。最后，垂死的维吉尔在幻觉中目睹了地球和宇宙的变形，象征世界的没落。

这部作品开始创作于 1937 年，正是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代，几经修改至 1945 年出版。通过大段的内心独白剖析了诗人的思想活动，也表明了布罗赫本人对艺术价值的认识。作者提出了艺术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问题，因为在可怕的法西斯时代，作家是软弱无力的，任何艺术都毫无意义。但小说最后的结尾，可能是暗示纳粹德国必然灭亡的命运。

1950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罪的人们》，实际是由十一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布罗赫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德国自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初的社会状况。小说中的人物均未直接参预任何法西斯暴行，然而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在道德上的堕落，无疑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孽生和泛滥，这些“无罪的人们”恰恰是纳粹产生的根源。布罗赫逝世后根据遗稿出版的长篇小说《诱惑者》（1953），通过发生在偏僻的阿尔卑斯山区村民中的愚昧迷信的故事，又一次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约·罗特和厄·封·霍尔瓦特

约瑟夫·罗特（1894—1939）出生于今波兰东部布罗迪的犹太人家庭。1914 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和日耳曼语文学，1916 年志愿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俄军俘虏。战后在维也纳和柏林当新闻记者；1920 年迁居柏林后曾为多家报刊撰稿，1926 年还被《法兰克福报》派往苏联当采访记者。他在当记者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早期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蜘蛛网》（1923）、《萨伏伊饭店》（1924）等。1930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约伯》是他的成名作，描写一个乡村犹太教师的苦难命运，表达了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接着发表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和《先王墓室》（1938）是他的两部杰作。希特勒上台后罗特被迫流亡巴黎。因对政治局势的发展悲观绝望，再加上酗酒过度而致病，1939 年 5 月 27 日在巴黎一家贫民医院逝世。他去世后出版的重要遗著有长篇小说《沉默的预言家》（1966）、《1911 - 1939 年书信集》（1970）等。

《拉德茨基进行曲》是罗特的代表作。小说的故事发生在 1859 至 1916 年之间。作者通过特罗塔一家三代的变迁反映了奥匈帝国的兴衰。第一代步兵少尉约瑟夫·特罗塔，农民出身，1859 年在前线以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救了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性命，被封为贵族，晋升为上尉。后来他在儿子的教科书里发现对他的这一行动作了过分的夸大与颂扬，他大惑不解，提出抗议并面见皇帝，但未得到满意答复，愤而辞去军职，回到乡间生活。第二代约瑟夫的儿子弗兰茨·特罗塔，他在维也纳上大学，后来依仗父亲的荣耀和皇帝的恩赐，当了地方长官，对哈布斯堡王朝无限忠诚，对捷

克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充满敌意。第三代约瑟夫的孙子卡尔·特罗塔，他在军校毕业后当了骑兵少尉。奥地利军队的腐败现象使他预感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末日将临，但是他本人在这个军队中也成了一个浪荡公子。后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哥萨克交战时被打死。1916年其祖父约瑟夫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先后死去。宣告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拉德茨基是1813年前后反拿破仑的奥军统帅，“拉德茨基进行曲”是对这位统帅和对哈布斯堡王朝往昔的颂歌，罗特以此作为小说的标题，无疑是唱了“一首奥地利的安魂曲”。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一方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奥匈帝国的社会生活，揭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腐败及其必然覆灭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渗透了作者对帝国往昔的怀恋，对理性和人道的社会秩序的向往。

罗特的另一长篇《先王墓室》是前者的续篇，以小说主人公回忆的形式叙述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到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为止这段时间的状况，作品的主题和基调十分类似前一部小说，不过感伤和听天由命的情调显得更加突出。

厄顿·封·霍尔瓦特（1901—1938），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1901年12月9日出生于当时属匈牙利的亚得里亚海滨的阜姆（现里耶卡）。父亲是匈牙利外交官，母亲是德——捷后裔。他是匈牙利公民，但自称“德国作家”，文学史家因其奥匈帝国背景，称他为奥地利作家。他从小随父母迁移，1919年在维也纳中学毕业，接着去慕尼黑大学学习戏剧、哲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23年成为专业作家。1931年获克莱斯特奖。德国纳粹党上台后，他被迫出走去法国，1938年6月1日在巴黎被一株暴风雨刮断的树枝砸死，还不到三十八岁。

霍尔瓦特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十七部剧本，三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些诗歌和未完成的作品片断。剧本中有五部“大众戏剧”最为著名，它们是《登山铁路》（1927，1929改写），《意大利之夜》（1931），《维也纳森林的故事》（1931），《卡西米尔和卡洛琳内》（1932），《信念、爱情、希望》（1932）。这些戏剧大都描写市民阶层，人物语言具有口语色彩，并充满表明其教养水平的辞藻——所谓“教养习惯语”，这大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真实感。霍尔瓦特把奥地利传统的“大众戏剧”推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高峰。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永恒的小市民》（1930）、《没有上帝的青春》（1938）和《我们时代的一个孩子》（1938），其主人公也大多是小市民，他们的缺陷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由于早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霍尔瓦特的名字被淹没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六十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引起广泛注目，批评界对他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现在德、奥舞台上还经常上演他的戏剧作品。

《意大利之夜》是霍尔瓦特的代表性戏剧，1930年酝酿，1931年完成。剧本的情节发生在德国南部一个小城，时间是三十年代初。市议员安梅茨贝格是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老一代社会民主党人，他准备举行一次民间节日晚会，晚会取名“意大利之夜”。年青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马丁坚决反对在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形势下举行这样的晚会。但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意大利之夜”还是举行了。与此同时，该城法西斯分子也在同一地点举行“德意志之日”庆祝活动，他们宣传民族主义，高唱法西斯战歌，十分嚣张。马丁在“意大利之夜”晚会上发表讲话，抨击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涣散无能和缺乏战斗目

标。但是法西斯分子还是乘机袭击，并侮辱市议员。马丁和他的同伴很快救出了他，把法西斯党徒赶走，而这位社会民主党议员并未吸取教训，仍认为魏玛共和国“决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霍尔瓦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用这出政治喜剧向人们发出警告。他批判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面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毫无作为，批评了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漠不关心的态度，同时也嘲讽了纳粹党徒的专横无耻。全剧有七个场景，作品中的“教养习惯语”十分明显，人物身份不同（如市议员、酒馆老板、各种社会民主党人、法西斯分子等），他们所用的语汇也各异。通过他们的对话，准确地揭示了人物的意识，突出了他们的个性。

193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时代的一个孩子》，以第一人称形式叙述一个青年的经历。主人公因失业生活所迫加入军队，成了唯命是从的工具，在保卫祖国安全的欺骗宣传下，参加了对邻国的军事侵略。他所在部队的上尉无法忍受屠杀平民的暴行，在一次战斗中有意丧生；他不了解真相，还前去抢救，结果自己手臂负伤，成了终身残废。他告别部队，去给上尉的遗孀送遗书，然后返回家乡，思考自己的经历。最后他象一个孩子，茫然不知所措，在严冬里冻死在户外。小说反映了1929年后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德国小市民阶层如何寄希望于纳粹，因而成为纳粹德国的社会基础这一历史教训。

第五节 第二次大战后的文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地利文学在战前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开始了新的一页；几十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其中一些作家我们在下面要做专节介绍，如卡内蒂，策兰，巴赫曼，贝恩哈德和汉特克，还有一些人这里也应提及，如诗人兼小说家弗里德（1921—1988），他的重要诗集有《石头之国》（1963）、《大谎言之腿》（1969）、《爱情诗》（1979），长篇小说《士兵与姑娘》（1960）等；作家阿尔特曼（1921--）是现代派诗人的中心人物，重要诗集有《用一瓶黑墨水》（1958）、《关于爱情和荒淫的诗》（1975），短篇小说集《驶向楠塔基特岛》（1969）等；女作家伊·艾兴格（1921--）是“四七社”的成员，著有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1948）、多篇短篇小说，她被认为是战后现代派的早期代表作家之一。

卡内蒂

艾利亚斯·卡内蒂（1905--），英籍德语作家，但他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也有人把他视为奥地利作家。他出生在保加利亚的鲁斯丘克，祖上是西班牙犹太人。童年时随父母去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父亲因受震惊而去世，他和母亲搬到维也纳和苏黎世居住，开始学习德语，以后他一直把德语视为母语，终生用德语写作。他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业，1924年入维也纳大学攻读自然科学，1929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来定居维也纳，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学，并开始写作；其间去柏林做过翻译工作。他结识了当时维也纳的一些著名作家，如克劳斯、穆齐尔、布罗赫，并阅读卡夫卡的作品，这四位作家对他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影响很大。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卡内蒂从维也纳流亡英国，取得英国国籍，至今一直在英国定居。

卡内蒂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长期在动荡的欧洲社会中生活，亲眼目睹人性泯灭、人欲横流的种种丑恶现象，促使他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认为，现在的世界是疯子的世界，计划写八部系列长篇小说，总题为《疯子的人间喜剧》，以八个处于疯狂边缘的人物为主人公，用怪诞、荒谬的手法表现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1935年完成第一部《迷惘》出版。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其他几部没有完成。

他流亡英国后，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对生、死、权力和群众的关系等哲学、人类学问题上，写下了许多文章、随笔、杂感、日记，结集出版的有政论集《群众和权力》（1960）、游记小说《马拉克什的声音》（1968）、《人间，1942—1972年笔记》（1973）、长篇小说《耳闻证人》（1974）、杂文集《文字的良心》（1975）等，还有三部自传体小说：《获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0）、《眉目传情》（1985）。此外，他还创作了剧本《虚荣的喜剧》（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以及描写卡夫卡与女友费丽丽丝爱情的作品《另一起诉讼》（1969）等。

卡内蒂是一位长期流亡、以四海为家的作家，富有国际性，熔欧洲各民族传统于一炉，并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他有着细致的观察力，作品具有内省、深沉、探索人生的特点。过去由于战乱的原因，他的作品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到了六十年代后批评界高度评价他的创作，这位作家又被重新发现。1972年获毕希纳奖。1981年由于他的“作品具有辽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长篇小说《迷惘》是卡内蒂准备写的《疯子的人间喜剧》八部小说的浓缩，于1935年首次在维也纳发表，但当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后来，这部小说在英国、美国、法国出版后，倒流回德语文学领域，逐渐引起重视。现在它已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我国出版了三个译本。

这部作品以怪诞的手法，描述了一个荒谬的故事：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住着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彼得·基恩教授。他是一个书呆子，爱书如命，个人藏书达25000册，整天钻在故纸堆里阅读研究；他笃信孔孟之道，对社会现实十分隔膜。基恩为了保护书而娶了女管家苔莱泽为妻。这个女人贪婪、狠毒，不仅霸占了基恩的财产，还把他赶出住所。基恩流落街头后，遇到骗子驼背侏儒菲舍尔勒，身边带的钱财又被骗光。后来他落入凶残的看门人、苔莱泽的姘夫普法夫之手，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受折磨，甚至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受尽凌辱。最后，基恩依靠弟弟格奥尔格的帮助才赶走这些无赖，夺回了住宅和藏书。但他在精神上已受到极大创伤，对这个世界感到迷惘和恐惧。在幻觉中，他放火焚烧自己的住所，与藏书同归于尽。

《迷惘》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了现实世界道德和人性沦丧，精神同物质至上的信条如何发生冲突，精神如何被贪欲毁灭的深刻寓意。小说以纳粹主义残酷地玩弄权术为背景，蕴含着深远的预见性。全书四十余万言，分三部。第一部《没有世界的头脑》，第二部《没有头脑的世界》，第三部《世界在头脑中》，这几个标题也发人深思。卡内蒂善于塑造畸形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人物外貌和对内心世界进行夸张的、漫画式的刻画，用喜剧式的幽默描写悲剧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策兰和巴赫曼

保尔·策兰（1920—1970），出生于布科维纳的切尔诺维茨，父母都是

讲德语的犹太人。1938年他去法国图尔大学攻读医学，次年因战争返回故乡学习罗曼语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是犹太人受尽迫害，1942—1943年被关在罗马尼亚劳动营；他的双亲于1942年惨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下。战后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任编辑，1947年去维也纳。1948年到巴黎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和语言学，加入法国籍。1959年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德语讲师。他从1947年开始发表诗歌，重要诗集有《罌粟与记忆》（1952）、《从门槛到门槛》（1955）、《语言栅栏》（1959）、《无主的玫瑰》（1963）和《一线阳光》（1968）等。1960年获西德毕希纳文学奖。1970年4月底在巴黎自杀身亡。死后出版遗著《诗集》（1975。）

策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在他的许多诗作中，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描写了法西斯的专制统治和犹太人隔离区的恐怖生活。在诗歌语言和象征手法上有不少创新，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多义性，在当代西方诗坛上颇受重视。

《死亡赋格曲》是策兰最负盛名的诗歌，作于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时，发表于1947年。全诗借用音乐中的赋格曲形式，讲究对位和韵律，寓意深刻，由于典故和隐喻，加上没有标点，人称代词不清楚，所以在理解和翻译上往往不尽相同，但是诗歌的主题：揭露法西斯分子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则是十分明确的。全诗共三十六行可分为四节，现把第一节列举如下：

早晨的黑色牛奶我们晚上喝它

我们中午喝它早上喝它夜里喝它

我们喝啊喝

我们在空中挖一墓穴那儿睡得不太挤

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他玩蛇他写信

天黑的时候他写信到德国你金发的玛格蕾特

他写信走到屋前星星闪烁他吹哨叫他的狗过来

他吹哨叫他的犹太人出来往地下挖一墓穴

他命令我们现在奏乐跳舞

策兰在诗里使用了顿呼手法，即把不在场的人当作在场的人用“你”称呼，把非生物当作生物称呼，并与“你”对话，如“你金发的玛格蕾特”，第二节

第一诗行把牛奶称作“你”。诗中的“我们”都指代犹太人，“他”指代集中营的德国长官。诗的第一句开头“早晨的黑色牛奶”，这是一个逆喻，即把两个矛盾概念组合为一体的修辞手法，两相对照，发人深思。按理说，早晨喝的牛奶是白色的，可是在集中营里“牛奶”是黑色的。黑色象征悲哀、绝望、死亡。在这一逆喻之后，诗人罗列了时间状语早上、中午、晚上、夜里。一般说只有婴儿才一天到晚喝奶。诗人用这样的意象表现了犹太人就象婴儿一样虚弱、孤单；对他们来说，死亡的威胁时刻存在，他们是死神手中的婴儿。全诗中出现的一些意象——黑色的牛奶、蛇、狗、墓穴、金发、灰发、来自德国的大师……零乱反复，断断续续，表现犹太人整日整夜在作恐怖的恶梦。策兰运用赋格曲的回旋形式表现了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犹太人回旋式的恶梦，使本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英格博格·巴赫曼（1926—1973）出生于克拉根富特。1945—1950年在

因斯布鲁克、格拉茨和维也纳等地大学攻读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以论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51—1953年任维也纳广播电台编辑，之后旅居罗马、慕尼黑、苏黎世等地，专事文学创作；其间也曾去美国旅行（1955），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诗学（1959—1960）。她曾获得多种文学奖，包括“四七社”奖（1953）、毕希纳奖（1964）、奥地利国家大奖（1968）。1973年10月17日在罗马的一次火灾事故中去世。

巴赫曼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开始文学创作，194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作品，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她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分期付款的时间》（1953）、《祈求大熊星座》（1956），短篇小说集《三十岁》（1961）、《同时》（1972），广播剧《蝉》（1955）、《曼哈顿的善神》（1958）。197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马利纳》是原计划的长篇三部曲《死的方式》中的一部，描写女主人公叙事者陷入三角恋爱关系而不能自拔，最后走向毁灭的故事。其余两部因作者早逝而没有完成。巴赫曼的作品语言简朴，但内涵深刻，并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在德语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诗歌《分期付款的时间》是巴赫曼的代表作。全诗如下：

更加严酷的日子即将到来。
到期必须偿还分期付款的
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不久你将系紧鞋带，
把狗赶回低洼沼泽地带的院落。

因为鱼的内脏
在风里已经冷却。
羽扇豆在燃烧，发出微弱的光亮。
你的目光在雾中跟踪眺望。
到期必须偿还分期付款的
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那边，你的情人正在沙中沉没
地平线在她那晃动的头发周围升腾，
它打断她的话。
它命令她不得出声。
它发现她并非长生不老
并且很乐意
拥抱之后同她再见。

你别左顾右盼
系紧鞋带。
赶狗回家。
鱼扔大海
吹来羽扇豆的光亮！

更加严酷的日子即将到来 （范大灿译）

诗人善于把具体和抽象融为一体，隐喻了一个生活艰难的世界。时间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看不见它；加上“分期付款”一词后，抽象概念“时间”就具体化了，容易捉摸了。“分期付款”是个金融名词，推迟偿还债务就是“分期付款”，“到期必须偿还”是指债务到某个特定的日期能够而且必须付清。因此，债务对欠债人来说就构成了一种经常不断的威胁，所以诗人开头说“更加严酷的日子即将到来”。如果偿还不了怎么办？就只得出走、逃遁。第二节诗就写了与情人的分离，“拥抱之后同她再见”。第三节全是命令句，以强调在不得不出走的情况下态度要坚决，行动要果断。最后一行，诗人重复开头的句子。至此，人们从全诗中体会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世界的境遇，时时刻刻都有各种各样的威胁，诗人向世人发出了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和警示。这首诗采用的是自由体，语言简洁自然，意象鲜明生动。巴赫曼的诗作都有一种哲学的思考，因此人们说她的诗歌是“诗化哲学”。

贝恩哈德和汉特克

托马斯·贝恩哈德（1931—1989）出生于荷兰的海尔伦修道院。他是私生子，父亲是奥地利木匠，母亲是奥地利一作家的女儿。他从未见过父亲，在外祖父母身边渡过童年，受到艺术熏陶。1947年文科中学毕业后，他去一家商店当学徒，一年后，因肺结核住院。在住院疗养时，他的外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曾几次试图自杀。1952年他入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导演和表演艺术。在此期间，他担任了当地出版的《民主人民报》的记者，并开始在该报上发表文学作品。学业结束后，成为一名专业作家。1965年，他在奥尔斯多夫购得一座破旧的农家大院，他自己把它修缮后就定居在那里，谢绝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坛纷争。

1957至1960年间，贝恩哈德发表了三本诗集和四个短剧，但都没有引起文坛重视。六十年代初他开始创作小说。他总共写了二十多部长、中、短篇小说集和五部自传体小说。著名的有长篇小说《严寒》（1963）、《精神错乱》（1967）、《石灰厂》（1970）和《修改》（1975），中篇《安拉斯》（1964）、《走》（1971）、《是》（1978）等。贝恩哈德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可以说全都溶化在他的这些小说里。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在写小说的同时，又开始戏剧创作，接连发表了近二十个剧本，差不多每年都推出一个新剧本。重要剧作有《博里斯的节日》（1970）、《狩猎协会》（1974）、《总统》（1975）、《康德》（1978）、《剧作人》（1984）和《英雄广场》（1988）等。德国、奥地利的剧场都纷纷上演他的戏剧，贝恩哈德成为德语国家戏剧舞台上演剧目最多的剧作家之一。

贝恩哈德的创作以小说和戏剧为主，但他的诗歌也颇有特色。1991年出版的《诗歌全集》（350页），被德国西南广播电台评为当年三本最佳的文学书之一。

贝恩哈德长期忍受着病痛（肺癌）的折磨，但他笔耕不止。为了褒奖贝恩哈德在文艺事业上做出的贡献，德语国家的文化团体和各种基金会纷纷授予他各种奖赏。然而尽管贝恩哈德获得众多的殊荣，他对这一切却表现得十分淡漠。1979年，他干脆退出设在西德达姆施塔特的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辞去院士头衔。

贝恩哈德的作品具有极大的否定性。在他的作品中，除了疾病、死亡、愚蠢、绝望和心理变态外，几乎看不到别的色彩。他自己也说过：“我的信

息都是黑色”。如果说十九世纪奥地利小说家斯蒂夫特在文学创作中倡导的是“温柔法则”，那末二十世纪的贝恩哈德倡导的却是“死亡和疯狂法则”。他的作品里总有疯狂者和自杀者。他认为正是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更多地造就了疯狂者和死亡者，这是“人类的悲剧”。但死亡和生命是辩证的一对。贝恩哈德写绝望和死亡，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希望和生命。正如他所说：“死亡是我的主题，因为生命是我的主题”。他针砭时弊、反对种族歧视、批评环境污染、忧虑生态失衡、抨击天主教会、蔑视各种政客、甚至指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说：“艺术家每天都在创造世界，政治家却在糟塌这个世界。”为此，他在奥地利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中树立了不少“敌人”，但同时也获得他们以及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尊敬和崇拜。人们从否定之否定中看到了肯定。否定的辩证法把他的艺术作品烙上了“世界文学”的印记。

1963年发表的《严寒》是贝恩哈德的成名作，描写一名医科大学生接受委托，去山区文格村看望退隐画家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展开情节，从第一天写起一直写到第二十七天结束：有大学生的描述和感触，有画家的独白和幻象，有两人肺腑之言的长谈，有写给委托人的信件。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把文格村描写成人类完美的世界末日的舞台，这种完美伴随以残暴和对自然的无法估量的破坏，而生活在这里的人因此也都冷酷、罪恶和与人类为敌。小说给人以病态、绝望的感觉，但它也因此震撼世人，引起批评界的强烈反响。他的另一些小说也都紧扣时代，揭露了现代社会的环境污染、诽谤、虚伪、官僚主义和权力犯罪。他把纯洁原始的自然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称为“痴呆的临死挣扎”。他要用自己科学精神和诗意精神相结合的小说警醒世人，与他一起“寻求原因”。

三幕剧《博里斯的节日》描写了一个封闭的社会：十三位没有腿的难友应邀参加同样没有腿的博里斯的生日宴会。贝恩哈德在剧中展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枯萎，空间范围的局限，身体的残缺和语言的减少。《英雄广场》一剧中，通过人物间的谈话无情的抨击、揭发了奥地利的腐败政治和社会弊端，而观众确在痛骂声中真正领悟到剧作家对祖国无限的爱。

贝恩哈德的创作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和奥地利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在探讨当代人生的危机的同时，依靠修辞学的力量构建作品，充分运用了话语的思辩性和“语言游戏”，以新奇独特的风格著称文坛。

彼得·汉特克（1942—）出生于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职员家庭。童年时随父母住在东柏林，1948年回到格里芬，中学毕业后入格拉茨大学攻读法律，积极参加当地文艺团体“城市公园论坛”的活动，1963年起在电台和杂志《原稿》上发表作品。1965年辍学，专事文学创作。曾多次去美国旅行，也有一段时间住在西德一些城市，1975年起居住在巴黎。1979年迁居萨尔茨堡。

汉特克是以叛逆者和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坛的，自称在创作中“决不与人雷同”。他在1966年应邀参加“四七社”年会，会上公开向传统文学挑战，辱骂“四七社”作家墨守成规，愚蠢可笑。这件轰动的事倒激励他赶快作出成绩来。紧接着他连续以“反戏剧”和“反小说”猛烈冲击了德语文坛，发表了一系列作品，重要的有剧本《骂观众》（1966）、《预言》（1966）、《自咎》（1966）、《卡斯帕尔》（1968），长篇小说《大黄蜂》（1966）

和《小贩》（1967）等。这些作品表现手法新颖，把记录客观世界和描绘心理活动结合起来，情节简单，叙述繁琐；注重个人、自我的存在，强调内心的生活和心理的真实。

1970年后，他的创作有转向现实主义的倾向，并带有自传色彩，重要作品有小说《罚点球时守门员的恐惧》（1970）、《无望的不幸》（1972）、《短信长别》（1972）、《世界的重量》（1977），剧本《驰骋在博登湖上》（1971）、《无理的人死光了》（1974）等。八十年代以来，他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孩子的历史》（1981）、《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复》（1986）、《作家的下午》（1987）等。他1991年发表的诗集《关于成功的日子》被权威性的德国西南广播电台评为当年德语文学三本最佳图书之一。

汉特克的创作受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影响，并有所独创，因此他的作品在西方文坛颇受推崇，曾多次获奖（1973年获毕希纳奖）。

1966年发表的剧本《骂观众》是汉特克的成名作。这是一部刻意违反传统戏剧规则的作品，作者自称这是一出“说话剧”。剧本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戏剧性的人物和对话，只有四名说话者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对着观众谩骂，而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只是谈论戏剧艺术，宣讲作者反幻觉主义的戏剧观，中间伴以强烈节奏的音乐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全剧在说话者对观众的谩骂和嘲讽中结束。

汉特克的这类“说话剧”，旨在对传统的表演与接受方式进行原则性的批判，让观众摆脱被动接受的地位，以彻底否定束缚观众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传统戏剧。这种戏剧实际上是语言的蒙太奇，其源出自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哲学”和“语言游戏说”。

第八章 二十世纪的瑞士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瑞士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凯勒，戈特赫尔夫，费·迈耶尔三位著名的德语作家，这在上一篇里我们已做了介绍。跨入二十世纪，卡尔·施皮特勒是位名重一时的作家，他生于1845年，死于1924年。他的创作活动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1909年他由于创作的史诗式作品《奥林匹亚的春天》（1900—1905）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思想受叔本华、尼采的影响，蔑视群众，相信超人，作品多取材历史、神话，属意创作一个新的英雄时代。他的代表作除史诗《奥林匹亚的春天》和《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外，还写有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意像》（1906），这是一篇心理作品，它描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瑞士式的民主的双重心态。此外还有短篇《康拉德少尉》（1898），这是以父子两代冲突为题材的一篇有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从二十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期间瑞士虽没有出现在世界享有声望的著名作家，但有一些作家在德语文学中却占有一席之地。这其中有罗·瓦尔泽（1878—1956）、M·英格林（1893—1971）、K·古根海姆（1896—）、A·左林格（1895—1941）等人。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在德语文学中得到好评。到马克斯·弗里施和弗·迪伦玛特的出现，瑞士文学不仅在本国，在德语国家，也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光彩。到九十年代初，这两位世界性作家相

继去世。当前活跃在瑞士德语文坛上有阿·穆什克（1934—）、彼·毕克塞尔（1935—）、玛·施里伯尔（1939—）、维·斯米特里（1939—）、以及西·布拉特（1946—）等人。

瑞士自 1814 年维也纳会议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保证其永久性的中立。它虽然位于欧洲中心，与德、奥、法、意毗邻，但对欧洲国家间的军事和政治纷争均不介入，两次世界大战都置身事外。这种独特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使它一直保持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这就必然对它的文学的发展有所影响，影响它的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与周边国家的亲缘性和相通性（瑞士基本上有三个语区：三分之二的人讲德语，说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近三分之一）。瑞士的德语文学自十四世纪以来，就对德语文学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它的发展是融合在德国文学的发展之中的。进入二十世纪，瑞士的德语文学虽然比奥地利文学更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由于传播媒介的进步，丝毫没有减弱，像弗里施、迪伦玛特都是通过德国走向世界的；就是一般的作家，他们更大的读者群是在德国，与德国文学的历史上的渊源，德国文学在瑞士的接受，瑞士德语文学在德国的接受，这都不可避免地都对瑞士文学的发展和走向发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瑞士文学，没有经历过联邦德国文学上的“从零开始”，没有稍后的“废墟文学”，它也没有经历过民主德国初期的清算法西斯主义和随之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方针的时期。它有自身发展的某种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但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受到了削弱。我们只消想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奥地利以及一些其它国家的作家都流亡到瑞士，他们在这里活动，写作和发表作品，这必然是对瑞士文学的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是一种冲击。这种削弱给瑞士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因素。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总体上看，瑞士德语文学还缺乏尖锐的深刻的批判内容，它还难得在德语文坛上激起强烈的反应，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它就有了新的成份，新的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弗里施和迪伦玛特的作品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明。他们的作品引起了不仅在德语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的反响。有人称，战后瑞士德语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狭隘的国土，广阔的世界性思维，”这种概括是有某种道理的，而大体上这也是当代瑞士德语文学的一个特点。

第二节 马克斯·弗里施

马·弗里施（1911—1991）生于苏黎世，出身一个建筑师之家，在大学攻读日尔曼学，从 1933 年开始从事记者工作，1936 年至 1941 年在苏黎世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战后做建筑师，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到 1955 年成为专业作家。他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写有小说、长篇、日记、戏剧多种。在小说创作上他受存在主义影响，作品的基本主题是对人的自身同一性的寻求，对人生价值的探索。著名代表作有《施蒂勒》（1954）、《能干人法贝尔》（1957）、《我的名字可能叫甘顿拜因》（1964）等。《施蒂勒》是一部心理小说，故事是一个叫怀特的美国人偷入瑞士国境被捕，他被怀疑为与一桩间谍案有关的瑞士人施蒂勒。可他说自己不是施蒂勒，最后证明他就是施蒂勒，却与间谍案无关。最后这个自称是怀特的施蒂勒得以在瑞士度过残年。主人公为了寻找被异化了的自身去美洲，但在美洲也找不到自己的同一性，回到瑞士所有的人证明他依然是那

个被异化了的施蒂勒。弗里施不仅在这部作品，在其它的几部小说中，都乐于用自己的作品表达他的人生哲理，他的悲观的历史哲学。

弗里施一生共写有十多部戏剧，在这些剧作中表明了他在方法上所受的布莱希特的影响，在创作上广泛地采用了间离效果，然而仅此而已，在思想上却与布莱希特大相径庭。他给那部代表性作品《毕德曼和纵火犯》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部没有教育作用的教育剧。布莱希特的戏剧用来启蒙，用来教育，用来宣传，而且通过教育去使人行动，去进行改变；弗里施则用戏剧去探究，去展示，而且证明人和世界都是无法改变的，只是一种循环。如同他在他的小说中表明的一样，他对历史持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弗里施的著名戏剧有《他们又唱了》（1945），它有一个副标题：一首安魂曲的习作、《中国长城》（1947）、《毕德曼和纵火犯》（1955）、《安道拉》（1961）、《自传》（1967）、《三张相连的图片》（1978）等。这些作品多是一种寓意剧，有的用来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有的来表达人对历史的无能为力哲学。《毕德曼和纵火犯》由于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和技巧上的娴熟，语言上的成功而成为世界剧坛上的珍品，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并也在中国上演。弗里施有意略去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局，使之更具有普通性和寓意性。它的情是这样的：毕德曼是一个工厂老板，出于同情收容了一个自称是无家可归的人，此人叫施米茨。施米茨进来之后又把他的同党招来，并往家里搬来一桶桶汽油。毕德曼发现不好，想把俩人撵走，但已经晚了。这俩人俨然主人，并公开对毕德曼说，他们要点燃房子，现在就缺少火柴了。毕德曼自欺欺人，但愿他俩不是纵火犯，处处迁就，处处乞求。他们命令毕德曼去拿火柴，直到此时毕德曼还存有幻想，想博得他俩好感，以免发生灾难。毕德曼给了他们火柴，他们点燃汽油，房子化为灰烬，累及全城，毕德曼竟成了两个纵火犯的同谋！作品的寓意性是十分明显的，但作者犹嫌不足，又写了他乐于采用的阴间场面（在《他们又唱了》和《三张相连的图片》中都有这种阴间场景）。毕德曼和妻子被烧死后到了阴间，两个歹徒也到了阴间，可却成了房东。当焚烧的城市复兴后，两个坏家伙又回到阳间做纵火的勾当了。天道往复，历史再次循环。这只是一部没有教育作用的教育剧罢了。

在《毕德曼和纵火犯》中有着荒诞的色彩，虽不太浓，可到了《中国长城》，它的故事则荒诞不经，离奇至极。这是一部没有场、幕、而只由二十四个景组成的闹剧，打破了时空，古今人物同台，有饰演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中的诸多角色出场：秦始皇、菲立普二世，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罗米欧，朱丽叶，堂璜等。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不是去塑造人物，描绘性格，而是藉助这样的闹剧来表达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来探讨知识分子（剧中的“现代人”）对历史中的罪恶应负什么样的道义上责任的问题。

弗里施 1961 年完成的《安道拉》不同于《中国长城》，它不是一部用来表达作者的历史悲剧哲学，不是有着荒诞风格的寓意剧，而是一部基本上按着传统戏剧公式写就的作品，也是他戏剧作品中社会批判意义最尖锐的一部。作者通过一个非犹太的青年人安德列被当做是犹太人而遭受迫害致死的故事，激烈地抨击了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的罪行，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安道拉（一个虚构的国家）的小市民的种种恶德：明哲保身，苟且偷安，媚强凌弱，趋炎附势，播弄是非，甚至为虎作伥，加以鞭挞。

弗里施晚年还写了一些作品，如小说《蒙陶克》（1975）、《人出生在新世纪》（1979）等。

第三节 弗·迪伦玛特

弗·迪伦玛特（1921—1990）生于伯尔尼州一个牧师家庭，大学时攻读神学，哲学和日尔曼学，做过记者，1943年开始写作，他在第一批戏剧获得成功之后，成为职业作家。

虽然迪伦玛特也写有多部小说，但使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是他的戏剧，他一生共写了二十余部作品，早期戏剧有《写在纸上》（1947）、《盲人》（1947）、《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2）、《罗慕洛大帝》（1953）、《一个天使来自巴比伦》（1953）等。但著名的代表作是他1956年创作的《老妇还乡》和1961年完成的《物理学家》。

《老妇还乡》是一部悲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居仑的小城。这个城市面临灾难性的财政危机，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城的居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出生于本地的亿万富翁的遗孀的返乡访问上。她叫克莱尔·察哈纳西安，四十五年前她与居仑的商人伊尔相爱，但怀孕后被遗弃。她流落异乡，成为妓女，后嫁给一个石油大王。这次她返乡复仇，带来一个棺材。她宣布给居仑市十亿巨款，条件是处死伊尔。全城人以市长为首，开始时以人道主义名义拒绝接受，但居仑人最终屈服于金钱，包括市长、律师和教会，都认为伊尔有罪，以正义和人道主义的名义处死伊尔，把尸体装入棺材运走，克莱尔给居仑一张巨额支票。终场时响起了合唱：“灾难很多很多，可贫穷比一切灾难更为可怕。”

迪伦玛特通过这样一个近似荒诞但却可信的故事展示了金钱的力量和道德的沦丧。在物欲的诱惑和压力下，正义、人道主义、伦理、法律、友谊、夫妻之爱、父子之情（伊尔的妻子和儿子最终也主张处死伊尔）都走向了反面。

迪伦玛特称这是一部以悲剧收场的喜剧，道德上犯有过失的伊尔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死激起了同情和怜悯，而那些代表法律、正义、道德的人却成了喜剧人物。作品中真实的细节描绘，漫画式的夸张，滑稽中显示出庄严，荒诞中寓存着真实，这一切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绚丽的彩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物理学家》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它以超级大国争霸为背景，描写了正直的科学家为了使人类得以避免灾难，宁愿牺牲个人，拒绝为大国利益服务的悲剧性的故事：一个名叫默比乌斯的核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万能体系。他唯恐自己的成果被大国利用，导致人类的毁灭，抛妻离子躲进一家精神病院。东西方情报机构获悉此事，分别派了一名物理学家装疯打进这座疯人院。这三个装疯的物理学家为了各自的使命杀了监护他们的三个女护士，被迫各自亮底。默比乌斯说服了两个大国派来的物理学家，指出今天物理学家的唯一出路就是住进疯人院，因为“我们不住疯人院，世界就要变成一座疯人院。”但就在这时，疯人院女院长宣布他们被捕，声称已偷拍了默比乌斯的发明，并交给了一个企图主宰世界的垄断组织。世界落入了一个颠狂的精神病女医生的手里。

这是一部富哲理性的悲喜剧，三个装成疯子的人物，各有各的打算，真真假假的疯言疯语，寓庄于谐，幽默风趣，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喜剧效果；而它的主题和人物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部戏剧上演立即获得巨大

成功，成为六十年代初期德语国家舞台上上演最多的剧目，八十年代我国亦将此剧搬上了舞台。

在六十年代之后，迪伦马特还写了些喜剧，为《流星》（1965）、《参予者》（1973）等，但都没有超过《老妇还乡》和《物理学家》。

迪伦马特的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他写的多是侦探犯罪小说。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悬念，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而且也有着尖锐的批判意义。代表性的作品有《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0）、《嫌疑》（1951）、《抛锚》（1956）等。

第四节 穆什克和毕克塞尔

阿·穆什克（1934—）的父亲是一位文学史家，母亲是一位青少年读物作者，家学的熏陶为他走上文学道路起了不小的作用。1953至1959他去苏黎世和英国剑桥读日尔曼学，英国文学和哲学。毕业后做中学教员，嗣后在德国、日本、美国的一些高等学校教授德文，1970年成为苏黎世技术高等学校的文学教授，先后到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等地旅行。六、七十年代获得过各种文学奖金。

196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兔年之夏》，小说的背景是日本，叙述了瑞士一家公司的广告主任率领六名青年去日本工作，而结果是失败而归的故事。这部作品语言优美，富异国情调。在欧洲六十年代大学生学潮时，穆什克是个积极分子，这段经历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1969年发表的小说《一起玩》中的一个教师的形象就带有这次运动的印记。他的代表性作品是《阿尔比塞尔的理由》（1974），它通过一个心理病人开枪击伤心理病医生的故事探讨了瑞士当代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1980年作表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白云，或友好协会》。一个瑞士来华旅行团在旅行将结束时，团长突然死亡。中国法医查出系服用过量抗忧郁的兴奋剂所致。原来团中一个女人平日服用这种药剂，她嫌团长罗嗦，于是在他的啤酒里放了这种药。小说重要的不是叙述这样一个类似侦探故事，而是藉助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展示各种类人物的心理。此后作者又相继创作了小说《光与钥匙》（1984）、《塔楼风信旗》（1987）等。除了小说，穆什克还写有戏剧《侏儒怪人》（1968）和《凯勒的晚宴》（1975），前者是一部悲剧，描写一个恐癌症者和由此而引起的自我心理折磨，后者是以作家凯勒为主人公的一部作品。凯勒应邀与当时在瑞士流亡的诗人赫尔威格及工运领袖拉萨尔等人共餐。藉助他们对失败了1848年革命的种种议论，作者表达了自己对六十年代学潮后各种人物的看法，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奢谈革命，不沮丧灰心。

彼·毕可塞尔（1935—）生于一个画家家庭，早年在师范学校毕业，做过多年教师，后在美国，柏林做记者。1964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布罗姆太太想结识送奶人》。这个集子共收有二十一个短篇，均取自现实生活。作者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式的手法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愿望和苦恼。1965年他发表了一部非长篇的长篇《四季》。这是一种反长篇作品，作者自称，它可以从后往前读，也可以从中间向后读。全书没有统一的吸引人的情节，它叙述了一幢住宅里的普通人的生活，这幢房子建于1927年，原是红色的，现正漆成白色。此外，穆什克还写有《儿童故事》（1990）以及散文等。

毕克塞尔以写短篇小说见长，他的文笔洗炼，形式简洁，善于用朴素的

语言表现瑞士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